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宗槐回忆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魏巍

中国革命是极其伟大的。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不仅造就出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人物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锻炼出许多身经百战的牧童出身的将军。至于那些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英雄模范人物，就更不计其数了，他们有如灿烂的星河，横亘在我们的上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王宗槐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由“织布伢子”成长为将军的。他幼年父母早丧，寄人篱下，十岁出头就当了“织布伢子”。在唉唉的机杼声中，传来了红军闹革命的消息，他毅然把织梭一扔就去投奔。路途遥远，身无分文，因饥饿难忍，幸遇一祭坟农妇赐以米饼，这才使他找到了救星，从此这个十四岁的“穷小鬼”成了“红小鬼”，献身在中国工农红军光荣的战列中。经过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终于在枪林弹雨的人间少有的艰难困苦中，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我认识王宗槐同志，还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从延安抗大毕业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刚刚才十九岁。当时，聂老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在平山蛟潭庄，政治部驻在李家岸，是两个并不太大的山村。那时政治部主任是舒同，组织部长是王宗槐，宣传部长是潘自力。我在政治部工作了很短的时间，并表示愿到前方做下层工作，就由舒同和王宗槐同志分配我到战斗部队去了，而且去的是有名的大渡河团，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平津战役时，王宗槐同志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即以后的六十三军）的政治委员，我在他领导下任政治部的教育科长。一九五一年，我从团政治委员的岗位上调到总政，王宗槐同志又是总政的秘书长，为工作调动还亲自同我谈了话。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王宗槐同志给我留下了可敬可亲的深刻印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将军。他性格温和，待人亲切热情，谦逊有礼；他作风严谨正派，办事公道，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通情达理，因此，干部都喜欢接近他。我私人认为，这正是我军培养出来的典型的政治工作者的风度，尤其是组织部长（干部部长）的风度，怪不得过去人们把组织（干部）部门看作干部之家。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优良传统所带来的魅力，如果象现在一些大机关，某些干部对人那样冷淡，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魅力了。

人们对宗槐同志还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他那惊人的记忆力。至今他虽已八十高龄，仍能说出许多干部的名字，甚至他们爱人的名字。人们还传说着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因为日军反复扫荡清剿，干部档案很难保存。有一次，军区把干部花名册和档案埋在唐县的山沟里，后来竟被日寇的军犬臭出异味挖出来了，敌人从而判断出我军的实力。聂帅知道了，反扫荡前总要下令焚毁干部花名册一类东西，宗槐同志硬是用脑子记下了全军数千个营以上干部的姓名、籍贯、负过几次伤等。反扫荡一结束，他就伏在膝盖上填好花名册，并把阵亡干部的名单和现有实力呈报八路军总部，这种近似计算机的记忆力简直是神话了，然而这却是他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长期养成的。

今年欣逢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听说宗槐同志的回忆录已经完成并将

要出版，实在可喜可贺。回想当年，平型关战后，聂老总被留在五台山一带，担负着开辟敌后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其麾下不过三千之众，仅凭这三千人，要光复沦陷的大好河山，并屹立在敌人的腹地之中，谈何容易。然而他们终于在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成就了这一伟业，王宗槐同志无疑是最初艰辛的开拓者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四纵队、三纵队的领导工作，差不多晋察冀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他都参加了。如平津战役，解放太原以及解放大西北的兰州战役。他所领导与指挥的部队都立下了累累战功。他作为一个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领导者，对部队优良作风的培养多有建树，因此，他的回忆录，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文风上是不饰不矫，真实生动的。阅读这本书，对领会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前辈的奋斗精神，将会有很大帮助。

1995年5月19日

王宗槐回忆录

一孤苦的童年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民国四年农历七月初四，我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茅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白茅冲，离万载县城四十几里地，是个穷困的山沟沟。这里所住的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客籍。当时，本籍人大多住平坝，客籍人只能居住山沟边坎地带。当地的本籍人大都姓刘，人多势大，所以流传着“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刘不成村”的民谚。我家祖籍在福建省武平县桑子坑。算到我这一辈，祖上迁到江西已经是第十九代了，我们王家祖祖辈辈已在白茅冲住了几百年。

我的祖父叫王洪启，祖母的姓氏记不清楚，她一世生了八男五女，其中五个早年夭亡。到我记事时，只有我父亲、四位叔叔及三位姑姑。我们家是几代贫农，主要靠种地兼织夏布维持生活。我的几位叔叔以织夏布为主兼种田，而我父亲则专干农活，除种自家的几亩地外，还到几里路外的龙田村租种富人家的田地。

父亲王科发，母亲孙氏，生下我们兄弟两人。兄长叫王永初，比我年长三岁。我来到这人世间刚刚一年，母亲孙氏就染病身亡。母亲的遗体安放在门板上，我还以为是睡着了，拉着她的手，吵着要吃奶。姑姑见到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硬是把我抱开了。从七岁开始，我就跟着父辈们下地干些拔草、捉虫、摘豆、放牛等比较轻些的农活。

八岁那年，白茅冲的几户人家联合起来，在一个小厅子里办起了私塾。每家出资几块光洋（银元），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教几个小孩子念书。我也进了这所私塾。教书先生名叫汪先通，年约四十多岁，是我小姑姑的公公。他为人厚道，教书既严格又耐心。我们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幼学寻源》等蒙童课本。那时读书，主要是跟着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人之初，性本善”、“之乎者也”等，一味背诵，并不解其意。好在年幼记性强，有的文章，只要念上一个多时辰，就能够一口气背诵下来。这使汪先生很高兴。汪先生教书规矩严格，稍有违反，就要挨打板子。我就曾被打过两回板子。头一回，是描大字时，不知不觉中脑袋歪了，后脖子根挨了一板子。另一回，是中午放学回家时，到水坑扎猛子（潜水），把先生写在手背上的红字洗掉了。下午上学先生一查问，只得招认是玩水儿去了。先生就让我伸出手来，在手掌上打了十几板子。打学生我不赞成，但老师严格要求是对的，否则，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

八岁那年，年仅四十岁的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我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伢子，私塾也上不成了，总共念了八个月书。

父亲一死，五个叔叔就分了家。分家时，把全部家产（十间土坯房、七担谷子田及几架织布机）分成六份，抓阄。我和我哥算一份，我们兄弟俩分到的财产是一间土坯房、二担谷子田、一小块山地和一些破旧的盆盆罐罐，还有一卷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铺盖、衣服。同时也摊到了哥哥娶嫂子时欠下的三十块钱债款。后来把山上的松树砍下卖了，才还清了这笔债。分家后不久，好心的小姑姑见我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实在太困难，含着眼泪，背起我的铺盖卷，对我说：“跟我走吧，苦伢子！”

小姑家住在离白茅冲四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里，总共只有两户人家，是个

穷乡僻壤。小姑的家境也很穷。我就帮着砍柴、照看姑姑的小女儿，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添了我这张嘴，小姑家的日子更难熬了。十一岁那年，我又回到了白茅冲，跟着我四叔学习织夏布；叔侄关系也随之变成了师徒关系。

和当时普天下的学徒工一样，我也要先尽徒弟的义务，才有学技的权利。婶婶生了一个小女孩，主要管孩子。做饭、打柴、割猪草等家务活，几乎全部由我承担。这样忙乎了一年，四叔才让我练习蹬机、推挡、抛接梭……

我个子小，腿短，踩不到脚踏板，只好在机座前边，架上一块横木板，坐在这块木板上操作。每蹬一下，屁股就在木板上蹭一次。前蹭后磨，不到一天的功夫，屁股就磨破了，痛得吃饭都不愿坐凳子。更难受的是两条臂膀，由于胳膊短，操作时两臂几乎一字形地伸展着，干不了多久，就很疲劳，一天下来，又肿又胀又酸痛。

叔叔家的织布机安在地坑的壁洞里，阳光射不进，风儿吹不进，光线暗淡，空气湿润。为了保持干净，我每天黎明即起，进行清扫。唯一公正的是大地，她给我以“母爱”；地坑壁洞给我提供了冬暖夏凉的生活环境。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听到的只是机行声和婶子对洞里的吆喝声：“二伢子，水缸干啦，快上来挑水呀！”“二伢子，上来劈柴呀，灶门空啦！”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赶快放下织布机，跳上地坑去干活，干完杂活又马上操弄织布机，不敢稍有懈怠。夏布以扣门多少论粗细，扣门少，布粗；扣门多，布细。织夏布从600扣门开始学，经过近一年的学艺，我已能织1000扣门的布了，这种布可用于制做衣服、蚊帐。在这低人一层的世界里，我艰难地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

二灶王爷旁的红五星

一九二九年冬天，一向沉寂的山庄似乎不那么平静了。大人们经常交头接耳地说悄悄话。连我终日生活的昏暗的织布机房也仿佛有了异样的信息，我感到我的三叔公对我更关心了，这使我凄凉的心里得到温暖。

三叔公名叫王洪夏，是我祖父的堂弟弟，也就是我的堂爷爷，比我大三十多岁。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在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白茅冲却有秀才之称。谁人看家书、写地契、解纠纷等，都乐意去求他。他以宽厚、平等待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我印象里，他对村上的孩子都挺和蔼，从未瞪过眼或勒过嗓子。

三叔公家和我四叔家隔沟而住，直线距离不过五十来米，谁家大声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走起来却不那么便当。隆冬的一天，三叔公叫我得空去他那儿一下。我心里很高兴，盼望太阳快点落山，好趁夜晚空闲去见三叔公。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多黑的夜也没把我挡住。出了屋，我就朝西走去。摸到了毛竹桥上。桥下是一条山水冲刷成的大沟。这条大沟把白茅冲分成东西两村，这座竹桥跨沟而立，是连结东西村的纽带。我小心翼翼地摸过竹桥，向西走，拐到了三叔公的家。

三叔公的儿子、我的堂叔在门外站着，见我去了赶忙小声地把我让进屋里，而他仍站在门口。这情景真让人感到有点儿神秘感。屋里只有三叔公一人，端端正正地坐在灶台边。灶头上，一盏豆油灯，几根灯芯草，烧得哧哧地响。尽管火光很微弱，但因我从暗处来，所以觉得很亮堂，一眼就望见了小香炉里刚刚点燃的三支红香。不用问，他在祝愿“大吉大利”。使我不解的是：灶王爷旁边为什么贴了颗巴掌大的红五星？

三叔公见我来了，直接了当地说：“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介绍你加入赤色工会，你是否同意？赤色就是红色，就是这五星的颜色。”接着他把工会的性质、任务，按照他的理解向我宣传了一阵子。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灶王爷旁边的那颗红五星上，说：“这五星，比灶王爷的神灵还要大，它管五大洲呢，亚细亚洲、欧罗巴洲、澳大利亚洲……全世界的人将来都要有工做，有饭吃，不挨打，师傅也不准打徒弟……”听了他这几句话，我的心一阵激动。在我表示愿意加入工会后，他领着我在五星下宣了誓。誓词有好几句，有的忘了，但至今仍记得这么几句：自愿加入工会，遵守本会纪律，严守一切秘密，实现共产社会。末尾是：“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夺。宣誓人——王怀。”

我原名叫王永开，又叫二伢子，都是小名。王怀这个大名，是三叔公这天晚上介绍我加入工会时新取的。

打从加入赤色工会、见到了红五星之后，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眼界开阔多了。不久，离白茅冲二里地的仙公庙门前，开了一个大会，我赶去看热闹。会上，一个称谓丁先生的人讲话，宣布一个叫吴秋生的人的罪行，揭露他是流氓恶霸，尽干坏事，暴露秘密等。接着，就有几个人把吴秋生拉到半里路外的山沟里，用关公刀砍下了他的脑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砍头，当时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相信是穷人起来整坏蛋。一九二九年冬天至一九三

年一、二月份，三叔公他们又拉起了“工农暴动队”，我也参加了“赤色少年先锋队”。发给我一把梭标，我把它磨得锃亮。一天晌午，三叔公他们带着白茅冲的百十号男女老少，拿着鸟铳、梭标，扛着上炮，参加几支暴动队统一组织的攻打大桥镇上民团的行动。我们赶到大桥镇外的山上吆喝，放

鸟铳，为攻打镇子的工农暴动队助威。过了几天，暴动队和赤少队又在晚上集合起来，赶去参加攻打潭埠镇上的民团。在田间小路上转了几个小时，才到潭埠附近。还未响枪声，就传来消息说潭埠不打了，撤回。

参加这些行动，使我这个孤伢子开始看到民众的力量，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感到不平的世道要变了。但在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连串的新鲜事。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懂得，乡村的这些变故，都是共产党和红军发动的，是民众起来闹革命。

原来，万载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斗争历史。它地处湘鄂赣之要冲，是军事割据的战略要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万载县有不少青少年冲破封建军阀的禁锢，追求进步，寻觅真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万载就开始有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冬，湘鄂赣边区党的组织，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有利时机，在红军的配合下，发动并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一个以“要吃饭、要土地、要自由，抗租、抗捐、抗税”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在“年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三〇年二月中旬，湘鄂赣边区特委作出“关于今年‘三·一八’总示威的决定”，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五十九周年，举行武装示威和武装暴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组织之后，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在浏阳、平江、修水、铜鼓、宜春、万载等县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

当我知道了这些后，我才明白我所经历的攻打大桥、潭埠民团等行动，是边区党组织发动的“年关斗争”和“三·一八武装总示威”的革命大潮中的一个浪花；才认识到三叔公王洪夏介绍我加入工会、组织我们参加暴动，是在引导我这个不懂事的穷孩子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革命引路人。

三当红军去

幼年时，我曾从大人嘴里听到过南兵、北兵、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等名词，但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一九二七年前后，又听说红军长三头六臂等等传言，更不明白这是坏人的造谣，是讹传。加入赤色工会和参加暴动后，从三叔公那里逐渐得知：红军是好队伍，不打人、不骂人、不抢夺女人，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有的百姓被红军找去当挑夫后，可以自愿回家，还发给路费，等等。这使我感到很新鲜，逐渐改变了当地普遍存在的“好铁不打钉，好仔不当兵”的旧观念，萌生了当红军去的念头。可是红军在哪儿，怎样去参加，心里头一点数儿也没有。

山上的映山红开了，布谷鸟发出了啼鸣，转眼到了一九三一年春。

一天，山村中又响起了剃头匠手中钢夹晃子发出的阵阵颤音，像沙哑的嗓子在吼叫：“剃头呀！剃头呀！”听到这声音，孩子们象受惊的野兔，撒腿就跑，纷纷钻进房前屋后的竹林里。大人不去搜，他们是不会主动露头的。剃头师傅叫余观幼，是邻近村人。他待人和气，但他的理发工具太简陋，没有推子，没有剪子，只有一把又大又钝的剃头刀，剃一式的和尚头。刀不快，手脚又重，剃起头来使人痛得咬牙闭眼缩脖子，有时还给刮出一道道血口。可他是附近山村唯一的剃头匠。离了他，白茅冲也许早就变成“长毛冲”了，因此，人们并不计较他的手艺高低，反倒常常互相安慰：“剃头嘛，哪能不流点儿血！”而小孩怕痛，一听要剃头，就赶紧躲起来。

我因为没钱，也就不必象其他孩子那样去钻竹林子。一年只剃一次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他这次进村，任他把晃子刮得震天响，我依旧在织布机房内埋头抛梭。

过了一会儿，三叔公把我找去了。他向我公布了一项秘密，说：“人不可貌相啊，这剃头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他跟红军有联系。”

我听了后又惊又喜，真没想到，他这钢夹晃子的颤音里还有这样的佳音：几个月来梦寐以求当红军去的愿望，竟在这一袋烟的工夫内有了实现的希望。三叔公把我带去见余师傅。

余师傅说：红军已经到了小源（现称仙源）了，你想参加红军可以介绍你去。

我满口答应。

他说，那你等讯吧。

过了些日子，三叔公告诉我：红军到槽头了，你明天去余师傅家找他，他介绍你去。我高兴得朝三叔公鞠了个躬，转身就找堂兄王明初商量启程的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向四叔要两个铜板，以备路上买吃的。万万没料到，四叔竟然一个钱也不给，翻着白眼将我瞪走了。什么叔侄关系，什么师徒关系，干了两年多，竟然连个铜板都不给。如此绝情，使我越想越伤心。我勒紧了裤带，砍了根打狗棍，就与明初兄一道，离开了白茅冲。

我们走了四里多路，来到另一个山村，找到了余观幼师傅的家。余师傅交给我一封已经写好的书信，说：“到了槽头，把信交给红军就行了。”

槽头镇离这里有七十里路。我们必须在一天之内赶到，否则，沿途都是山路，狼很多，不敢在荒郊野外过夜。我们告别了余师傅，向白良殿方向走去。过了一座山，走出七里地，到了白良殿。这里有个大庙，附近有不少坟墓。正是清明时节；不少坟上培上了新土，飘起了白纸幡，有的坟前正有人

供奉祭奠。看到那坟前的供品，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再也走不动了。我俩就去向上坟的人乞讨。那些人倒也善良，见我俩是赶路的穷伢子，施舍了一些“鬼吃过的”斋果（米糕、米饼之类）。这可救了急啦，我俩吃了一些，剩下的往怀里一揣，继续往东北方向赶路。

我的裤子本来就破，走着走着，膝盖上的洞儿越来越大。我把裤脚卷起来，不一会儿，一只卷起的裤脚断了，掉了下来，走起路来，一脚轻，一脚重，很是难受。

夜幕降临。我俩走进了一片毛竹林，阴森森的：十分可怕。我们边走边用打狗棍敲打路旁的大毛竹，发出“澎、澎”的声响，以打破沉寂，吓走禽兽，为自己壮胆。这样走着走着，突然传来了问话声：“干什么的？”

我一紧张，脱口而出回答：“找红军的！”

问话人用手电筒打量着我俩。从余光里，我看到了对方帽子上的红五星，心想，他也有“管五大洲的”，又有枪，不用问准是红军。他让我们扒开破上衣，露出胸膛，好让他看清楚，我们身上没有带家伙（武器）。他见我穿的是破衣，裤腿还缺半截子，草绳当裤带，又还是孩子，就带着我俩沿着山坡的一条石子路朝前走。坡上坡下尽是毛竹。坡底是河流还是山溪，看不见，只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又过了一道岗哨，我们来到了一个处所。我把余师傅写的信交给一个背短枪的人。他看过信后，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到了红军部队啦！”他把我留下，把明初带到另一个房间。但万万没想到，我和王明初的这一分离，竟成了永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音讯。那位红军待我胜似兄弟。他给我端来了饭菜，我站在一张饭桌旁吃饭。下筷子前，我很想看看桌子中间的菜盆里装的是什么菜。可是，视线与菜盆口平行，看不见，只得用筷子捞菜吃。这就是我刚到红军部队时的身高，当时，我十四岁。

我狼吞虎咽地吃饱了饭，就在那屋里的柜台上和衣而睡。尽管一天赶了七十多里山路已很累了，但找到红军的喜悦，使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夜深人静，我的眼前浮现出三叔公、余师傅的面容，耳旁仿佛又听到了余师傅那钢夹晃子的颤音，心中对革命的指路人充满感激之情。

第二天一早，那位留下我的红军战士自我介绍说：我叫旷达，是通信班长。他还说，领你去见我们首长。

见到一位首长时，旷达介绍说，这是我们二支队的周子昆支队长。周支队长看上去大约二十多岁，四川口音，身上背一把马号，部队集合休息，他都亲自吹号。他冲我笑了笑说，伢子，批准你加入红军。这时，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红军战士了。

二支队下辖三个连队。我被留在支队部，给一个姓刘的副官当勤务兵，从此开始了一个红军战士的战斗生活。

后来，我从刘副官、旷达班长等人那里，逐渐知道了这个部队的历史。我所在的二支队，是红六军一纵队二支队。红六军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底成立的，是由赣西的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合编而成的。红六军成立时，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任政治委员（不久，陈毅、蔡会文同志先后担任政委）。红六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的纵队长是柯武东，政治委员是李韶九，下辖第二、第三两个支队。他们还告诉我，这几个月，赣西各县农村斗争这样轰轰烈烈，是与红六军各纵队的军事配合密切相关的。知道了这些，使我对这支部队的崇敬和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四岔路口的抉择

参加红军后，我在给刘副官当勤务兵的过程中，渐渐了解红军，学习一些简单的军事知识，刘副官为人和气，但口音很重，说话不大好懂；加上自己刚参军，人小胆子小，不敢多问，要不，真可以更多更快地知道点红军的历史呢。我来到红军部队不久，就赶上了边区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红五月暴动”。我们红六军配合攻打一些县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二支队从槽头镇出发，去参加攻打万载县城。我跟着刘副官，走着走着觉得饿了，就到路旁的一家小店铺，讨了一碗米酒喝。结果，酒兴发作，感到肚子很难受，后来竟然醉了，连尿了裤子都不知道。刘副官连拉带拖把我带到万载城外，二十五日拂晓部队攻城前，我才清醒过来。从这次喝醉后，我一辈子滴酒不沾，与酒无缘了。二十五日清晨，红军队伍和群众相配合，喊声震天，枪声大作，很快攻进万载县城。民团几百人仓忙逃出县城。我们进城刚吃罢早饭，敌人发起一次反击。我们队伍赶紧往后山上撤。过了不久，又组织力量攻城，再次把敌人打跑。

攻克万载县城后，我们在城里住了两天，主要任务是打土豪。记得在一个土豪家里，刘副官命令我脱下裤子。我还以为犯了什么错误要打屁股呢，恐惧地解开草绳裤带，脱下当红军那天穿的那条断了半截腿的破裤子。刘副官指着那一大堆衣物说：“随便挑，换装”。

原来，红六军刚成立不久，部队不仅装备很差，枪很少，有的扛的是大刀、梭镖、鸟枪，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服装，穿的衣服各式各样，所以打了土豪便可以换穿衣服。我想挑条布裤子，翻来翻去，全是绫罗绸缎，一件布的也没有，我只好挑了套黑色缎子服，拣了一根丝织的裤带子。穿戴以后真可谓装备一新呀！特别是那根裤带，宽宽的，软软的，两头都有丝须须，走路来，抖抖晃晃的，精神极了。那天晚上，我们特别兴奋，坐在大财主家的院子里看月亮。有个河南籍的战士说：“真怪，这里的月亮从山上爬起来，我们那儿的月亮是从高粱地里冒出来的，比这儿的要亮得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不信？等打到俺河南，你们就信了。”他比我大几岁，我真的信了他的话，答应将来到了河南，再看从高粱地升起的月亮到底有多亮。

在万载县城关住了两天，部队又出发了。经过潭埠到株潭，赶赴黄茅参加攻打周家大地主的战斗。路过株潭时，我觉得越走离家越远了，忽然有点想家了。但我明白我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要守红军的规矩，跟红军队伍走。

打下黄茅周家大地主的土围子后，部队继续西进，经永和、古港去打浏阳。一路上，我同旷达班长走在一起，每人发了几个桃子充饥。六月七日，浏阳县赤卫队和革命群众数万人在红六军的配合下，攻克浏阳县城，我跟着部队跑步冲进城去，城里的民团跑到浏阳西乡，躲到山上。西乡靠近长沙，反动势力基础雄厚。我们一走，敌人就从西乡山上反扑下来；我们一打，敌人又逃到西门外，这样相持了好几天，最后，我们部队狠狠打了一下，民团才老实了，不再向城里反扑。

攻克浏阳后，红六军部队回师江西，参加打吉安。一路快行军，赶到吉安附近。这里集结了许多农民赤卫队，举着红旗，拿着大刀、梭镖。这是红军第七次打吉安。结果，攻城受挫，部队伤亡不小，撤到永阳镇。

这时，我离开了支队部，分配到二大队（连），给大队政委刘海滨当勤

务兵。

部队在永阳镇的河边住了一段时间后，转到泰和县的马家洲、卢家洲去打土豪、筹措粮款。在马家洲，我们大队住进一土豪家。刘海滨政委带着我住在土豪家的书房里。一进书房，见到的是满屋的书和纸，及摆在桌上的各式笔砚。这使我这个只念过八个月私塾的小学生感到很新奇，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我就利用空闲时间练习写大字，请识字的同志教我认字、练字。过去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住了半个月，写了不少大字，我会写会认的名字，足有两个排啦！这真令人兴奋。在这半个月的休整中，我还犯了一次纪律，下河里洗冷水澡，被司务长打了四十板。这次教训也是我一生没有忘记的。

七月，部队从马家洲回到高安县。在这里，红六军改称红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治委员由蔡会文担任。部队在休整中传来了消息：自一九三一年五月爆发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这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与此同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很大发展。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据此，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四军、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和第十二军，已于六月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上面指示红一军团夺取南昌。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从福建长汀出发，来到了赣西南。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会合后，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听了这些消息，大家都很高兴。从此，我们红三军就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七月下旬，几路红军部队会合，红一军团宣布成立后，向北开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前，红三军在右侧后，沿赣江东侧向南昌推进，7月24日攻占了樟树镇（今清江县城）。在樟树镇休整几天后，部队没有直接去攻打南昌，而是西渡赣江，于30日进到南昌对岸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8月1日，有的部队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后，我们红三军转到奉新地区休整待机。一天，我们在一片树林子露营，部队集合起来，听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大首长，心情特别激动。黄军长个子不高但很精神，他骑在一匹马上，讲话的声音很洪亮。在这次集会上，我还见到了蔡会文政委，看上去很年轻，戴一副眼镜，和蔼可亲。当时我们弄不清为什么不去攻打南昌，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等认为红军力量比较弱小，不宜攻打大城市，不同意错误的立三路线提出的口号：打下南昌，会师武汉，猛烈扩大红军一百万。避免了一次盲动主义的行动。

红一军团在奉新、安义地区宣传发动群众期间，得知湖南敌军何键部从长沙向驻平江、例阳地区的红三军团进击。为了消灭敌人，援助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前委命令部队西进，于八月十八日进抵万载县的黄茅。

八月五日，部队按命令向黄茅前进。经宜丰、分宜，于八月十二日到达万载县境内。我们二大队驻在株潭镇上。这里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喝到家乡水，听到家乡音，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更为高兴的是，我在株潭镇理了一次发，是洋剪子推的，“嚓嚓嚓”，舒舒服服的，留起了鹅状头，再也不是从前的和尚头了，也没有遭受在家时剃头的疼痛。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理发原来是一种享受。

可是，另一件极为痛苦的事，也在这时发生了。不知是行军作战磨破了

皮感染了，还是别的原因，我的右脚上长起了一个大疔疮，肿得鼓鼓的，钻心似地疼，连鞋子也穿不进去。就在这时，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发，去攻打文家市。大队长杨绍清见我行动困难，亟需治疗，而部队没有条件，便劝我先回家休息。

就这样，两条路严肃地摆在我面前：向东，乘老表的独轮车，顺着古老的石板路，很快就可回家；向西，靠长疮的脚行军打仗，艰难又痛苦。在这人生的岔路口上，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不能回家去！一来家中实在没有值得留恋的，加上白匪民团到处捕杀红军，我若离队回乡，岂不自投罗网？更重要的是，过了半年的部队生活，我已对红军有了较深的认识，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舍不得离开红军部队。

因此，当杨大队长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回家，我要跟部队一起走，死也要死在追赶队伍的路上！”

出发时，我找了只大一点的鞋，咬咬牙，穿上了。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上路了。走着走着，掉队了。我不停地命令自己：“快追赶，掉在后头，遇上白匪会掉脑壳的”。有了这种敌情观念，咬紧牙关，忍住了剧烈的疼痛，一个劲地追赶队伍，才没有拉下多大的距离。部队到达黄茅不久，我也赶到了。一天特殊的行军下来，脓包溃破了，也消肿了，后来结成了疤痕。这样，不仅我脚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更重要的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经受了一次考验。

五归途遇险

八月十八日，红一军团前委在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文家市离黄茅只有三十里地，那里驻有一直在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戴斗垣旅。戴斗垣是军阀何键的心腹，充任国民党四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为了消灭这股敌人，红一军团前委命令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分三路向文家市前进。红三军部队于十九日经慈化进到清水塘宿营，二十日由清水塘出发，经斗谷巷、白竹坳、龙潭湾向高陞岭、棺材岭阵地攻击前进。此时，戴斗垣只注意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没有提防悄悄逼近的红一军团。我们部队突然发起冲锋，戴旅顿时慌成一团，虽竭力反击，但都被我军击退。经过三小时激战，我军歼敌三个团另一个营，俘敌一千余名，戴斗垣被击毙。这是红一军团成立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我们一纵队司令柯武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获得文家市战斗胜利后，部队斗志昂扬，士气旺盛。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浏阳东北之永和市，与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一方面军成立后，部队继续西进，向长沙方向运动。我们部队跑步行军三十里，迅速攻占了长沙外围金刚头，进入南山阵地壕沟里。到了后半夜，天下起大雨，战壕里积水深过腰眼。我们只得撤到松树林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周围散发着奇臭，随手可摸到尸体，松毛虫爬到身上，汗毛孔里一阵阵麻、辣、痒、痛，难受极了。大家都不停地抓呀、搔呀。结果，我和不少同志一样，身上长满了疥疮。长沙战斗打得很苦。我们大队政委刘海滨也负了伤。我跟着他到后方医院去治疗。后方医院在浏阳县南乡观音堂的一个宗祠里，打地铺，收治了一批伤员。十多天后，我们都痊愈了。这时，听说大部队已从长沙撤围，我们大队随大部队经株洲、醴陵、萍乡转战到了袁州（今宜春）。

刘海滨政委带着近二百名已痊愈归队的同志去追赶队伍。

浏阳的北乡、西乡靠近长沙，反动势力猖獗；南乡有革命基础；东乡是根据地，条件最好。我们就避开西乡、北乡，从南乡转到东乡直插黄茅，来到卢溪附近。卢溪是个赤白交界的复杂地区，红军和白匪都经常过来过去。当走到卢溪至先锋的一个山坳时，面前出现一条小路，路的一边是小河沟，沟里的水缓缓地流着；另一边是山坡，坡上尽是荒草和灌木。一眼望去，似乎没有什么敌情。

我们这二百来人的队伍来自几个部队，大部分没有带武器，只有两个班护送。因为天气热，路途遥远，走得累了，队伍就散了架子，走得稀稀拉拉的，前后距离足有两三里地。我年少气盛，兴致一来，就一溜快路，走到最前面。当走近一座石拱桥时，突然发现桥那头立着四个手执大刀的人。凭直觉，我一眼看出他们是“挨户团”，转头就向回跑。他们见我孤身一人又是小孩，只派一个人横着刀冲过桥来追赶我。那人个子大，跑得快，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我心里很紧张。俗话说急中生智。我突然想起孩童时遇到狗追，只要扔给吃的，狗就不再追了。因此，当他离我只有十来步时，我把手里的包袱朝空中一抛，噗的一声，包袱落在路旁的树丛里。包内只有几件换洗的

衣物，都是组织上发给我的战利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家伙以为包袱中有财物，就象饿狗似的扑向包袱。我乘机脱了身。又往回跑了一段路，见到了刘政委，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他说：“你这个小鬼真危险呀！”他领着一些战士，由我引路，朝石拱桥走去。那几个挨户团见我们人多势众就赶紧钻树林子，翻过小山头跑了。

这件事给大家敲了警钟，我们再也不敢稀稀拉拉地赶路了。刘政委把二百来人召集起来，规定大家要一起走，形成一个战斗集体。每进入复杂地段，先放几枪，大家吆喝着，冲锋似地涌过去。挨户团听到枪响就躲得远远的，他们只敢欺侮少量散兵和过往百姓，一般情况下是不敢与红军的队伍抗争的。

这天夜里，我们在先锋镇上宿营，次日就赶到袁州，返回了部队。后来谈起这件事，有的同志就风趣地说：“你这是 包子打狗呀！一只包袱换来一条命，值！”

六入团

返回二大队后，我仍给大队政委刘海滨当勤务兵。部队住在袁州、萍乡一带休整，做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工作。九月底，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袁州地区，向吉安、清江开进。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强攻南昌等中心城市，使部队免遭损失，二来可以向赣南发展。

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对赣南重镇吉安发起攻击，一度突入城内，后遭敌反击撤出。到了晚上，敌人弃城出逃，部队乘虚攻占吉安。这是红军第九次打吉安，终于打下来了。打下吉安后我们担负守卫任务。守吉安要占三座山，即：罗梓山、天华山、珍珠山。我们二大队的任务是守罗梓山，监视敌人的行动。

攻克吉安不久，红三军进行整编，原来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不设营一级，团直接指挥连。我们红三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改为红三军七师十九团二连。十九团团团长龙云，政委宋裕和。二连连长杨绍清，政委刘海滨。我继续给连政委刘海滨当勤务兵。部队整编结束后，又移师北上，十月中旬进入新余一带。十九团驻在新余县袁岭下村，我们二连随团部住在一家大地主的宅院内。

一天，团部通信员用拳击墙，听声音不象是实心墙，感到好奇。挖开一个口子一看，只见墙内藏着许多钱财。原来，这是一堵夹墙，地主老财逃跑前，把金银财宝藏进里面。战士们动手从夹墙中起出不少银元、银元宝、金元宝及几只金杯。发现这个秘密后，团政委宋裕和下令部队挖钱，并规定发现一百块银元者可奖励一块银元。结果，从一些老财家挖出不少钱财，补充了部队供给。

就在袁岭下村休整时，连长杨绍清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杨连长是浙江人，长得魁伟、精干。我对他很钦佩。一天，他对我说，你出身贫苦，表现不错，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团？在这之前，刘海滨政委也同我谈过入团的事。他说，共青团叫“CY”，共产党叫“Cp”。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红袖章，并指着它说：这是“CY”的标志。他又说，出身成分好的，有一个介绍人介绍就可以了，连长介绍你加入共青团。听了刘政委的话，我心里很高兴，天天盼着杨连长找我谈话。所以，这天杨连长一说要介绍我入团，我立即表示同意。杨连长接着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共青团员了，今后表现要更好。我连声答应：“一定好好干。”

入团不到一个月，组织上便让我担任团小组长。那时没有团支部，团小组直接归连队党支部领导，党团员都是秘密的。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三军团陆续东渡赣江，向赣南根据地进发。十一月，我们红三军进到宁都县的黄陂、小布一带进行整训。我们七师驻在大桥坝地区。这时，发生了令人可怕而又痛心的事件，就是搞“肃反”、打“AB团”，错杀了一批同志，那时搞肃反、打“AB团”，不仅对敌情估计得很严重，而且做法极其草率。只是把队伍集合起来，把定为“AB团”的三排长反背绑起来，让他到队伍前面来认谁是“AB团”。点到谁，谁就成了“AB团”，一下点了十几个人。再把这些人的衣服脱光，绑起来，甚至吊起来审讯。这些人又“咬”出一些所谓的“AB团”。这样“咬”来“咬”去，“咬”出很多“AB团”，被“咬”成“AB团”的又随便地被杀掉了。几天之内，连队人数减了很多。本来打下吉安后，在吉安、永新、莲花、安福等地发动群众，

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很快，每个团由三个连扩大为五个连，每连多达一百四十余人。经过这场“肃反”运动，将近一半被杀，人头和尸首遍及河滩。当时的气氛很恐怖，搞得人心惶惶。我们这些十五岁左右的小兵，大约因为年纪小才没有被怀疑、被审查。后来，事情才清楚了，这次肃反犯了扩大化错误，是“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很严重，教训十分深刻。

在打“AB团”时，不少人怕误入“AB团”，什么组织也不愿参加，党团组织的发展完全不能正常进行了，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局面不改变已行不通了。所以，在纠正打“AB团”错误的同时，公开了党团组织。

十二月的一天，我们三军七师在部队中公开了党团组织。我们十九团以连队为单位在一个打谷场上集合。我们连的政委刘海滨从挎包里拿出两个红袖章，上面分别写着“Cp”和“CY”。他对全连同志说：“CP代表共产党，CY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都是革命的，大家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接着，他宣布党团员名单，念到谁谁答声：“到”，出列，另排一队。这一队，就是党团员队伍。这时，不少同志才恍然大悟。从此，在我们红三军的历史上，党团组织公开了，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也随之顺利开展起来，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恢复，大家以旺盛的斗志准备对付敌人的“围剿”。

七擎着战旗前进

红军的迅速发展和中央苏区的扩大，引起了敌人的惊惶不安。一九三〇年十月间，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的胜利之后，迅速调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开始布置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采用“并进长追”的战略，于十一月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大举向我进攻。当时红军约四万人，在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正确决策下，采取放开两手、诱敌深入、聚歼敌人于革命根据地之内的战略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这次反“围剿”时，我仍在连队当勤务兵，也没有给我配枪，主要是跟着连政委行动。龙岗战斗打响前，我在龙岗附近的茆布，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挥部设在茆布一座山的半山腰的一个村子里。这里居高临下，便于观察。我们经过指挥部门口，连政委指着一位年岁较大的指挥员对我说，“那就是我们的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正同几个干部说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想到毛政委、朱总司令指挥我们打仗，心情特别高兴。我们连队从大桥坝出发，翻过一座山，埋伏到茆布附近。十二月二十七日拂晓，天下着蒙蒙细雨，龙岗周围的层层迭迭的险峰峻岭，被弥漫的浓雾遮盖得依稀可见。一阵冲锋号划破了清晨的沉寂，漫山遍野的红军向龙岗镇上的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枪声、杀声响成一片。龙岗战斗一举歼灭了敌十八师的两个主力旅和师部，九千人全部被歼，不漏一人一马，连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也被红军活捉了。宣传队押着张辉瓒，站在龙岗至麻田的路上，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倡议开展抓俘虏比赛。各部红军欢呼雀跃，斗志昂扬。龙岗一仗，吓得其他敌人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大战源头，歼灭敌谭道源师一半。这样，五天之内，红军连打了两个胜仗，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连长、我的入团介绍人杨绍清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掩埋他的遗体时，我痛哭了一场。

一九三一年初，我们七师住在杨殷村附近休整。一天，全师集合在杨殷村后面的一个树林里开大会。师长彭雄、政委李湘龄（李涛）先后讲了话，大意是总结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部队的情况。开会过程中，师长突然喊了一声“起立”、“立正！”接着就跑了几十公尺，向一位红军首长敬礼、报告。这位首长身材魁伟，穿着红军衣服，是从吊风去小布的，几公尺外跟着一名警卫员。当时我想这位首长是谁呢，师长都要去报告。后来才知道，师长敬礼的首长是毛泽东政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时的情形，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几十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又调集二十余万兵力，派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

四月一日，敌在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上，采取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压来。这时，我在十九团二连当了传令兵，配备了一支马枪（七九步枪锯去一截枪管做成的马枪），主要任务是传达连首长的命令。我们部队从四月下旬开始，运动埋伏在松柏参天、地势险恶的白云山等丛山峻岭之中，秘密地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埋伏到了五月十五日，敌王金钰部终于离开富田的巩固阵地，向东固逼近，十六日清晨，红军犹如天兵下凡，从乌云滚滚的白云山上杀将下来，冲到敌人前面。步枪、机枪、手榴弹声，象炸雷一样响彻山谷。王金钰所指挥的公秉

藩部队一下子就被打垮了。这一天，红军就吃掉了敌人两个师。歼灭了王金钰部以后，红军冒雨乘胜追击，胜利地进行了白沙战斗、中村战斗、广昌战斗、建宁战斗。这样，我们红军在十五天内日夜兼程，边打边追，走了整整七百里路程。从苍茫的赣水，一直打到碧绿青翠的闽山，消灭敌人三万多，缴获枪支二万余，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宣告了敌人大肆吹嘘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新战术的彻底破产。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利用敌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攻势作战。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扩大苏区，筹措经费和给养，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这时，我从十九团二连调到团部。团长龙云，团政委殷超。我给团政委殷超当交通兵，配备了一支驳壳枪。交通兵的任务，平时主要是到师政委办公厅送机要文件等，行军打仗时，除了传达命令，还担任机动战斗员。做这项工作没几天，就赶上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那样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又很快于一九三一年六月组织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且出动了十万嫡系部队，担任“围剿”主力军，总兵力达三十万人。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尔后再深入“清剿”。

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首长命令我们红三军主力到赣南的于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六月底，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并令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于七月二十二前到达于都地区。各路红军会合后，稍事整顿，就向西北方向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顿和转入反攻的政治动员。

八月初开始，我们部队和红军其他主力部队在高兴圩周围转来转去，伺机歼敌。八月六日晚上，我们红三军部队接到命令，从高兴圩插到莲塘，秘密接近敌人。我们进行夜间秘密急行军，我传达了团首长“不许点火把，不许发出咳嗽声”的命令。部队静悄悄地从田垅小路、敌人设防的缝隙中，插到莲塘。七日拂晓，我军从莲塘山上往莲塘发起猛攻，莲塘守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第二旅全部被歼。打下莲塘后，我们部队不顾疲劳，奉命向良村急进，参加打良村之敌。后来又打到良村东北方向的药溪、青塘。在莲塘、良村战斗中，我们十九团的伤亡不大，但团长龙云在打青塘时牺牲了。二十团在离良村一里多路的山脚下挨了敌人的飞机炸弹，伤亡不小。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首长命令红三军佯攻龙冈，其余主力部队去打黄陂之敌。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红军部队连续在莲塘、良村、黄陂打了三仗，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

九月初，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岗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我们十九团从药溪到茶园岗，休整了几天。

这时，敌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有的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余部队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极度低落。另外，两广军阀正向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威胁。所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

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位于兴国地区的蒋鼎文的独立旅，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方面军首长当即决定吃掉这股敌人，并伺机扩大战果，急令红三军等部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之退路。我们团即从兴国县茶园岗出发，沿着山路向西北方向插过去，断敌退路。

这一天，阴有小雨，天气闷热，行军途中，汗水拌雨水，大家早就浑身上下湿透了，但情绪却很高昂。那面引路的战旗，哗啦啦迎风招展，似在诉说红军在反“围剿”中的辉煌战绩，象在召唤战士们勇往直前、杀敌立功！

敌人经我多次沉重打击，在这次北撤时很狡猾。九月七日，当我们部队赶到兴国县老营盘时，蒋鼎文的部队已经在西北一座S形的山顶上，沿着波浪起伏的山脊展开了。我们爬上东南小坡一看，地形对我们极为不利：我团阵地前是一个山坡，坡下有条小河，河那边是几块稻田，敌人就盘踞在稻田那边的山脊上。敌人凭借这样易守难攻的地形，架着十七挺重机枪，疯狂地向我们阵地射击。这是一场恶战。同志们都做好了光荣牺牲的精神准备。

发起冲锋的时刻到了。我们十九团的突击队冲在最前边，掩护着团部掌旗员老张同志。那时的掌旗员很简单，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因为有明确规定，战旗是不许倒的，无论部队行进还是休息，战旗到那里，部队就到那里。战旗是胜利的象征。老张高举着我团战旗，引导全团奋力向前。大家斗志高昂，喊着杀声冲向敌阵。敌军阵地动摇了，但敌人仍在作垂死挣扎。为阻止我军进攻，敌人的火力密集地射向这面战旗。旗手老张往山坡下冲了十几步：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

这次战斗，我这个机动战斗员的任务是跟在战旗后边，当护旗员。当我看到老张中弹时，就一个箭步蹿上去，接过战旗，右手握着旗杆，左手撑着崖壁，继续向坡下冲去。眼看就要冲到山下的那条小河边了，突然觉得左上臂被猛捶一下，左手就不听使唤了，人也跑不稳了。战旗刚要在我手中低垂，身后的一位战士主动接过去，将战旗高高擎起，继续前进。

我负伤后继续向前冲去，殷超政委追上来，把我摁倒在一丛茶树下，要我到卫生队包扎伤口。我含着眼泪把殷政委的挎包和手电筒交给另一位战士，翻过山坡，到卫生队去了。

到了团卫生队，医生姜齐贤和看护长张杰同志立即替我治伤包扎。后来还每天帮我运动手擘。我痛得忍不住时，他们就耐心开导说：“不运动运动，肌肉萎缩，手就伸不直了”。我照他们的吩咐做了，忍着剧痛坚持活动受伤的手臂。伤好后，手臂上只落了个疤，没有落下后遗症。

在养伤期间，我听到了两个很不幸的消息。一是在我负伤后不久，部队终于攻进敌人的阵地，消灭了敌人，但是许多战友倒下了，团政委殷超同志也牺牲了。殷政委是在带着部队冲向敌人阵地时，在敌阵前的开阔地域，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大腿，流血过多牺牲的。另一件极为痛心的事是，我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方石岭战斗后、指挥部队转移时，在富田县的六度拗，遭到敌机轰炸，腹部中弹，不幸牺牲了。从此，我们再也听不到黄军长给我们讲话的声音了。我们全军都十分悲痛。

挥泪之际，我感慨万分，啊！战旗，光荣的战旗，你指引战士勇往直前，革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你，让你永远高高飘扬。

八出席苏区团代会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各部队进到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打“土围子”，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及群众武装。

这期间，我们七师部队也进行了整理，指挥员作了充实。我们十九团的领导也作了调整，团长是张金友，团政委是吴章成，副团长彭明治，副政委刘海滨。我们团先后打了旱林头、罗子寨、汾坑三处“土围子”。旱林头的民团防御坚固，迫击炮弹太少，打不进去。部队就挖地道，挖到土围子墙脚下面，再把装填了硝、硫磺的棺材放进去炸，也没炸开。最后把上围子围困起来，民团没有吃的，投降了。我们进去后杀了几个土豪。罗子寨居高临下，且设有滚木。红军一接近，民团就从悬崖上往下放滚木，很难对付。结果，机枪连的唐家礼排长和几个机枪手，晚上偷袭成功，打下罗子寨，搞了许多浮财。接着又打掉了汾坑的土围子，拔掉了“白钉子”。我们当时称这些白色土围子为“白钉子”。

在这红军得到加强与扩大，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的好形势下，红军各项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共青团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将在瑞金召开。七师首长委派我和卫生队的看护员李金生（宜丰县人），作为三军七师的代表，去参加这次团代会。去师部开介绍信时，师政委李湘龄（李涛）对我说：打‘AB团’时，杀掉了一个‘AB团’头子，叫王怀（当时他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你也叫王怀，这个重名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我这王怀的名字是加入秘密工会时取的，改不改呢？我想了一下。

李政委是读书出身，肚子里有学问，在我们心目中，他一向有首长兼秀才之美称。他要给我改名字，又说出了改名的道理，我还是答应了。

他又说：“你们王姓的家门上大多有‘三槐堂’三个字，你就叫王宗槐吧！”

他这么一说，更使我折服了，因为我们村里几家姓王的，大门横匾上确有“三槐堂”三个字。虽然我不知其由来，但觉得李政委为我取的这个名字是个好名。

我拿着李政委的亲笔介绍信，背起背包，和李金生一起告别首长，踏上了去瑞金的路。我们经过九保，见到了五军团的队伍。五军团刚成立一个多月，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举行起义后改编的。我们见到五军团的同志每人身上都带着三洋武器——匣子枪、冲锋枪、马刀，威风凛凛，心里真高兴，感到红军增加了这支新力量，对国民党无疑是个有力打击。

经过两天行程，我们来到了瑞金。到了瑞金，心情非常激动，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三个月前，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在瑞金成立。瑞金，是中央苏维埃所在地，是红军战士想往的地方。这次能到瑞金开会，我感到很荣幸。

参加这次中央苏区首届团代会的代表有三百多人，红军各个师都有代表出席。在会上，我认识了红四军的代表萧华同志，还有刘志坚等同志。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我带着少年的稚气，见了高级领导人总是羞得脸红，而

萧华同志却比我成熟老练得多，和领导人交谈显得很大方。更高兴的是，在会上，我首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首长。周恩来同志刚从上海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留着乌黑的大胡子，讲话精辟、流利、生动、亲切，没有重复的话。他从国际青年知识讲到红军青年团的任务，讲到要建立青年工作机构。会议休息及分组讨论时，恩来同志常到代表中来，问这问那。他的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议是一月二十五日开的，记得开了十天左右。会议明确了青年团的工作任务，决定建立各级青年工作机构，选举了高传林同志为青年团中央书记，顾卓林、凯丰同志为副书记。这次会议，为发展和加强红军部队团的组织、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十九团团部。团政委吴章成让我汇报会议精神。我不会记笔记，又没发文件，竟不知汇报什么内容，急了一头汗，还是说不出道道来。吴政委就一一询问：“会上见到谁了？谁讲了话？讲些什么？叫我们怎么干？”好在那时记忆力强，有问有答，要点大致都讲了。吴政委听着听着笑了，说：“你就这样给大家讲”。

过了不久，根据苏区首届团代会的精神，团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红军青年工作的条例》、《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的训令》等，把青年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上。红军各部队都认真贯彻这些精神，很快建立了各级青年工作机构，军设青年部，师有青年科，团有青年干事，连队也有战士兼任的青年委员。青年工作更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这时，十九团首长指定我为团部收发兼青年大队长。青年大队不是建制。凡是共青团员及25岁以下的红军战士都是青年队队员。全团几百名青年大队队员，平时分散在各连的青年队，有统一的青年活动时，则集合起来。我曾带着十九团的青年大队，到于都县的汾坑参加师部召开的大会。师长陈伯钧、政委李涛讲话，然后跳舞演节目。师政委办公厅的秘书易苗和盛治华等跳舞时，敌人的飞机来了，大家赶紧钻到小灌木丛中；飞机过去了，又回到原地继续演节目。当时的青年工作这样活跃，对提高部队的士气大有好处。

九青训班

自从出席苏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后，我就同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三月初，红三军为了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的指示，加强部队青年工作，举办了青年工作骨干训练班，七师首氏让我去青训练班学习。我打起背包，从于都出发，赶到三军政治部所在地——信丰县城。参加青训班学习的有三十来人，编为四个班。青训班的班主任我记得是刘和鸿（湖南宁乡人）。我在第四班，班长是彭家厚（湖南浏阳人）。这个训练班，主要是训练和培养青年工作骨干，为建立各级青年工作机构准备干部。三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组织部长张兴、宣传部长龙中桂、无线电台政委杜平及姓谭的民运部长，都给我们讲过课。军事教员还教“八段锦”。政治部秘书长讲地理课，“珠江、长江、黄河、黑龙江，由西向东流入太平洋”，念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记忆深刻。经过领导干部和教员讲课，大家讨论，我学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眼界开阔多了。

在青训班，刘和鸿、彭家厚同志介绍我成为兼党团员。他们对我说，兼党团员，可以参加团的会议，也可以参加党的一些会议，以便及时了解党组织对青年团工作的意见，有利于做团的工作。兼党团员只缴团费或只缴党费。

青训班除了授课训练外，也随大部队行动，参加战斗。一九三二年三月初，中央苏区红军放弃攻打赣州，主力由赣南转向闽南龙岩，消灭福建军阀张贞部一个团，占领了龙岩城，我们青训班随三军行动，到了龙岩。接着，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于四月二十日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我们青训班于四月下旬从龙岩出发，经河溪、适中到水潮。在水潮乘坐一辆缴获的形似面包的汽车去漳州。车框两旁有两排凳子可坐人，其余的把背包放在车上，坐在背包上软乎乎的，很舒服。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汽车。窗外的青山绿树一个劲地向后跑，实在新奇。水潮距漳州一百二十里路，车子跑了近三个小时就进了漳州城。

进城之后，见到了许多新鲜事。

头一次看停在机场的飞机。这次攻克漳州，缴获了两架飞机。一架能飞，一架已损坏，准备运往后方。我们去参观时，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正在飞机前照像留念呢！那时，我们这些土里滚、地里爬的土佬兵，能在飞机前看个够，这是多大的鼓舞呀！过去，听到敌机的声音，只得钻竹林、卧地沟躲避它；如今，红军缴获了敌人的飞机，终于有了自己的红色飞机，这不是说明我们的胜利和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了吗？看到它，我们的胸脯挺得更高了。“五一”节那天，我们红军和漳州市民们在中山公园开纪念大会。突然听到飞机声，人们赶紧散开荫蔽到桂圆树下。待到飞机飞低了，才看见机身上的“红五星”，知道是我们的那架飞机到厦门撒传单归来。大家又一拥而出，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了。纪念大会成了祝捷会。大家热烈欢呼：“我们也有飞机了！这是第一架红色飞机呀！”

头一次看电影、听留声机。虽然是无声电影，我们也倍觉新鲜，但不明白：帖在幕布上的人，为什么会动呢？尤其那留声机里，打锣敲鼓，有说有唱，以为有人藏在盒子里，有的把留声机拆坏了，还是揭不开其中的奥秘。

不少同志早就听说，城里抽烟可以不用火柴，打火机一点就着，进漳州后，有的则把电灯泡当成打火机了，点烟点不着，打碎灯泡，还是徒劳，闹出了不少笑话。

我们红三军政委葛跃山同志在一次总结会上批评说：“三军土佬，七师最差，电灯炮打坏了不少，留声机搞坏了三架”。为此，葛政委讲了一番学文化、学科学的重要性；号召大家要多学多问，避免将来进了大城市再闹笑话，做蠢事。

这次攻克漳州，我们在人力、物力上得到大量的补充，每人发了两套叫列宁装的军装，外加衬衣、椭圆形的红军胸章，还有胶鞋。整个部队，新簇簇，齐刷刷，威风极了。这是红一方面军服装最齐整的时期。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青训班随大部队从漳州回到赣南信丰县不久，就结业了，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我分到七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科长是黄利顺同志。政治部除了青年科外，另有宣传科及地方工作科，科长是胡月波。这时，七师的首长是：师长陈伯钧、政委蔡书彬、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戴奇。

十在红七师青年科

从青训班分配到七师政治部青年科不久，七师就随一军团去攻打进犯赣南苏区的广东军阀。一九三二年七月初，五军团在攻击水口时，遇到了十个团敌人的顽强抵抗。红军战士打得非常勇猛，用马刀砍、肉搏，把敌人打垮，但部队伤亡很大。随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率一、五军团等大部队赶到战场，组织部队向水口敌人发起总攻，旋即将敌人击溃。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七师伤亡也很大，有的团队伤亡过半。残敌向南雄逃窜，在追击逃敌的路上，我突然感到背后被什么力量推了一下，也顾不上管它。第二天打开包袱一看，包袱中的几件衣服被穿了十六个窟窿，子弹头裹在衣服的窟窿中，这才知道是被一颗流弹打的，幸亏距离较远，子弹的速度不大，否则又玄了。

南雄水口战役后，部队回赣南进行整顿。经整顿，撤销了三军、四军的军部和三军八师、四军的十、十一师。原来的三军只留下七师和九师。我们在七师政治部青年科当干事。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就开始了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准备。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另外，蒋介石还指令驻福建的十九路军等部六个师为左路军，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策应中路军的行动。一九三三年一月底，蒋介石又一次亲自到南昌督战，妄图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二月初，红军准备在敌部署未定之时，以进攻作战击溃敌人。红军部队向南丰地区开进，但攻城没有奏效。我们七师在南丰地区活动了几天后，随大部队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知道为什么要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后来证明，及时退却，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对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十分重要。

撤围南丰后，我们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河口、黄陂以西、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便于部队埋伏，又是敌人由乐安向黄陂开进的必经之路。我们七师的具体任务是：埋伏在金竹、大坪地区，待敌人进至蛟湖、桥头一线时，即突然对敌行进纵队发起攻击，歼灭敌人。那时一打仗，我们机关于部分别跟着连队行动。团队隐蔽在松树林、灌木丛中。那些天细雨蒙蒙，浓雾很大，几米之外人物难辨，有时摸到军事哨跟前，敌人都不知道。加上苏区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敌人真的成了“聋子”和“瞎子”。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非常有利。

二月二十七日，敌人第五十二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一线向黄陂推进，对隐蔽于行进道路南侧高地之我军毫无察觉。晌午，七师一部首先向蛟湖敌人发起攻击。与此同时，七师、九师主力向进到大龙坪之敌第五十二师师部发起猛攻。在一军团其他部队和三军团的攻击下，至二十八日上午，敌第五十二师被全歼，敌师长李明被击毙。接着，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的我右翼队（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组成），先敌占领黄陂、霍源地区，对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的敌五十九师发起猛烈的攻击，歼灭该敌大部。敌残部仓皇逃窜，在登仙桥东北地区，被我一军团部队歼灭，师长陈时骥被活捉。这场以大兵团伏击的战斗，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战斗结束时，我在连队也押了一批俘虏。

黄陂大捷后，红军一部兵力故意和敌人保持接触，引敌向南前进；主力红军则迅速地回到宁都以东地区休整。我们在那里休整约半个月时间，于三

月中旬，秘密地转移到宜黄以南、东陂到宁都间的山地设伏。那时，陈诚将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路突破，将集中于东陂一线的六个师，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令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第十、十四、九十师为前纵队；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辖第十一、五、九师，为后纵队。敌人以前后重迭梯次掩护的办法，取道新丰等地，继续向广昌方向移动，妄图寻歼我红军主力。

当敌人的前纵队跟踪追击与之接触的红军一部到新丰、甘竹一带，后纵队还迟滞在黄陂圩地区，两个纵队之间相距近五十公里，再次出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有利战机。这时我右翼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等部队已抵进草台岗、侯坊南侧地区，左翼红一、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及独立第五师，抵达东陂、草台岗西侧一带山区。敌后纵队之第九、十一师刚抵草台岗、东陂附近，即被我军分割包围。

敌第十一师发现进入伏击圈后，就地转入防御，占领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阵地。

我七师、九师奉命进攻黄柏山之敌。我们沿黄柏山北部向敌十一师师部驻地徐庄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我军左翼、右翼的激战，敌人第十一师大部被歼。敌九师在增援途中遭到我军严重打击。至此，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我从七师调到九师政治部任青年科长。九师的几位首长是；师长李聚奎、政委刘英、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符竹庭。政治部的几位科长是：组织科长谭冠三、宣传科长陈子球、宣传队长萧思明。

刚去九师两天，部队去打虎头街的敌人。师部驻在旱林头，遭到敌机轰炸。敌机先炸村子，周围的房子都被炸毁了。我隐蔽的那个房子幸好没有挨炸弹。敌机不炸了，我赶快跑到山上隐蔽。敌机接着又炸村子周围，空中弹片嗖嗖地掠空而过，落地的弹片在身旁滋滋作响，身旁的一头猪腹部中了弹片，我又幸免了。

不久，中央苏区红军在永丰县腾田改编，取消军的建制，军编为师，师改为团，团编营。一军团所辖三军、四军两个军编成一、二两个师。三军九师编成一师二团，团长李聚奎，政委刘发仁、参谋长耿飏、政治处主任谭冠三、总支书记袁辉先、特派员刘海滨，俱乐部主任陈子球，宣传队长萧思明，我担任青年干事。

一天，总支书记袁辉先和供给处主任刘立才（团部支部书记）同志告诉我，以后你不要参加团组织生活了，过党的组织生活，交党费，担任党总支委员。

腾田改编结束，一九三三年八月，红一方面军开了一次运动会，争“那摩温”（俄文译音，争优胜的意思），以增强广大指战员体质，活跃部队生活。运动会虽没有什么体育器材，但它紧密结合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开得很生气。

十一红军青年“冲锋季”

一九三三年秋冬，组织上调我到二师政治部任青年科长，原二师的青年科长苏光明调任一师青年科科长。不久，青年科编制取消，归到组织科。二团政委刘发任同志调到二师组织科任科长，我在组织科任青年干事。直至长征到达毛儿盖，我一直在二师组织科从事青年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军总部利用战斗间歇和整编的机会，加强了各级青年工作机构，使进一步开展红军青年工作有了组织保证。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固岗村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我们这些师的青年科长、团的青年干事都参加了会议。朱德、王稼祥、博古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会上，给我们讲话。有一天，会议刚开了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就来轰炸。大家忙劝首长们隐蔽。朱总司令刚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到门口炸响了，刚走出门洞的王稼祥同志右腰部中了弹片。后来，会议转移到村子后面的山坎坎里开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把青年工作搞得更活跃。

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同志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些精神，提出了在红军部队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建议。总政治部采纳后立即发动全军，在中央苏区红军首次开展了“青年冲锋季”活动。

这是一次青年竞赛活动。竞赛的内容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即：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每人要识三百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这些口号和内容以《苏武牧羊》的曲调写成了歌子，在各部队教唱。由于通俗易懂，事情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我也年已古稀，但仍能唱个八九不离十。

“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内容看似一般，但都是针对部队当时的实际提出来的，是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的。比如“不生病”、“不掉队”，就是部队战斗力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为了做到这“二不”，我们又补充规定了不喝生水、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这“四不”。为什么要加这几条呢？经过分析，生病和行军掉队与这几个问题密切相关；杜绝这四条，不生病才有可能。例如吃辣椒，吃多了刺激性太强，就易患胃肠炎和肛肠疾病（痔疮等），所以俗话说：“辣椒没补，两头受苦”。肚子痛、肛门亦痛，痛苦难忍，岂能不影响行军。因此，就规定了“不吃辣椒”。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中央苏区红军部队绝大多数是湖南、江西等地人，酷爱吃辣椒。然而，在“青年冲锋季”活动中，青年干部和士兵谁也不甘心落后，纷纷不吃辣椒。特别是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领导同志，本来非常爱吃辣椒，但为了支持“青年冲锋季”活动，他们都主动不吃辣椒了。上级首长如此支持，我们的工作更好做了。

红军战士大多出身穷苦，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谈不上写家信、看作战图了。所以“青年冲锋季”要求每人识三百字。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方法灵活多样。行军，有的把写着字的木牌、纸牌插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途中休息，有的以石子、木棍当笔，大地为纸，边写边念，互帮互学。这样，大家以部队为大课堂，以日常生活（接触的用具用品、连队同志的名字、行军的经过的村名地名、一天一换的夜间口令）为教材，勤学勤记。经过三个

月的突击，大多数战士都达到了规定的识字数，不少同志还学会了写信写日记。这次突击学文化的意义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不少老同志每每谈起此事，都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些大老粗后来能承担起党交给的重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年冲锋季”逼出了学文化的兴趣，为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红军时期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物质待遇菲薄，文化生活贫乏。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要巩固战斗力，必须鼓舞士气，激励斗志，那时活跃部队生活、鼓舞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唱革命歌曲，开文艺晚会。当时做青年工作的不会教歌曲不行，不会演戏不行。不仅青年干事要做，一些部队的首长也带头唱歌、演戏。在福建建宁县开晚会时，师长陈光、师政委刘亚楼都上台演戏。军团的首长聂荣臻政委、罗瑞卿同志也都上台演过戏。在苏区两次演戏，我都男扮女妆。一次，在江西黎川县乡下演《苏区景》这出戏时，我扮苏区姑娘，逼真地做绣花、刺花的动作，还要唱：“苏区好地方，到处是天堂，苏区地方天下都可爱，红军战士坚决来保卫”。另一次晚会演《小放牛》，作战参谋许旭东扮牧童，我扮姑娘。姑娘和牧童一问一答，答不出就不让过路。记得的歌词大意有：“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马克思！”“十月革命谁来领导？”“列宁！”“什么人是中国工人的领袖？”“苏兆征！”“什么人在中国做农运最早？”“彭湃！”……

青年“冲锋季”提出“一个月开晚会最少要两举（两次）”后，各部队的歌咏、文艺活动普遍开展起来，部队生活活跃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

青年“冲锋季”里，各部队对竞赛活动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布置检查大都采用“飞行集合”的方式进行。具体做法是：首长下令，紧急集合，用简短明确的语言，布置一两项工作；限期一到，再度集合起来，当场检查评比。在建宁，我向师政委刘亚楼建议：搞一次“飞行集会”，检查不久前布置的卫生和伪装工作，开展刺杀比赛。刘政委立即表示赞同，并通知了各团。第二天，各团的团长、政委带着部队到了指定的场坪。部队集合完毕后，师长陈光下令脱帽，顿时，每个指战员露出了剃得光光的头。接着，他又下令检查其他卫生项目，检查组同志从不同角度扫视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脸和手，记下了成绩。这时师长又命令：“戴上伪装！”刹那间，一片葱绿的草丛、树枝淹没了人和装具。当然，象这样全师性的“飞行集会”是不常举行的，大量的竞赛活动，是以连、营、团为单位开展的。军事体育呀，花枪表演呀，还有刺杀、投手榴弹等，内容丰富多采，部队情绪高涨。

中央苏区红军开展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后，部队的青年工作热气腾腾。红军中青年占绝大多数，活跃的青年工作对整个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五月，这次历时三个月的青年“冲锋季”活动，以卓著的成绩载入史册。它对巩固部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起了积极作用。它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五一年十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在全军首届青年工作会议上回顾红军“青年冲锋季”时说过：虽然在执行中有些偏激现象，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

十二从中央苏区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调集的兵力达百万之众，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五十万人。敌人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推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并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

在敌人的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面前，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在这种指导方针下，我们红军部队由东打到西，由西打到东，都是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打击敌人。敌人依托坚固的堡垒或阵地，在飞机掩护下同我作战。结果，我们没有打一个歼灭战，有时虽然打败了一股敌人，但部队却遭受很大的伤亡。二师打硝石，多次遭到敌机轰炸，部队伤亡不小。建宁保卫战，打建宁朱马寨，二师五团打了一天多，撤到山上，打得很惨，团政委被宣布撤职。这样打来打去，打了近一年，几乎没有打胜一仗，一批批战友却倒下去了。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严重，弹药物资消耗很大。物力也很缺乏，连盐都吃不上。这时又采取阵地防御作战方针，“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拼消耗。“兴国保卫战”时，天天修工事，甚至把老百姓的门板都争着拆下去修工事。但在敌人飞机炮火的狂轰滥炸下，这些工事顷刻被炸得稀巴烂。白天被炸烂，晚上接着修，部队疲劳不堪。我作为一个师级机关干部，对那时王明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红军内的领导，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路线等情况，不可能直接了解：只是对红军打不了胜仗感到憋气，觉得有些口号脱离实际。口头喊“誓死保卫苏维埃，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实际上我们一个劲地在撤，一撤就是一大片，苏区越来越缩小。那时部队怨气很大，思想工作很不好做。在“保卫兴国”时，四团青年干事王春美同我议论：“不光战士思想不通，干部也想不通嘛！”

到了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已持续了一年之久。中央苏区红军虽竭尽全力，奋力杀敌，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已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红军伤亡严重，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长汀等狭小地区。十月中旬，我们部队接到紧急命令，撤出战斗，从兴国附近阵地赶到于都地区集结待命。当时，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有什么重大行动。

我们二师在于都川心店一带住了几天，作短暂休整。虽然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也不知道要撤离根据地。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笼罩在根据地军民中间，一种共同的预感萦绕在人们的心头。那几天，部队发了米袋，装满了粮食，还发了衣服，做了出发的准备。经常有周围的群众，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来部队驻地，和同志们诉说衷肠，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流着泪哽咽着说：盼你们早回来呀！此情此景，使许多同志止不住哭泣起来。这种依依惜别之情，在群众聚拢到于都河边为红军送行时，达到了高潮。

十月十六日黄昏，我下到特务连，随特务连渡过于都河，向南行军。我与特务连指导员欧阳明（后到六团当青年干事）走在一起议论，以为红军要反攻了呢。过了几天，前头部队在新田、古陂打了个胜仗，打垮了敌广东部队，突破了敌人设在安西的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县境内。当时宣传队编了“胜利渡过于都河，新田、古陂打胜仗”的歌词，鼓动部队。部队进入广东境内后，在乌径搞了很多盐。中央苏区缺盐，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

境中，食盐更是奇缺，现在有了这么多盐，指战士们可高兴啦。

十一月八日，红军部队在湖南汝城至广东城口间突破了敌人又一道封锁线。

敌人在粤汉铁路沿湖南、广东一线，布置了二十万重兵，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于赣江以西、粤汉铁路以东。此时，一军团首长命令我们二师四团占领乐昌以北、粤汉路旁的制高点——九峰山，以对付乐昌方向敌人的袭击和堵截，掩护中央纵队等部队安全通过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红军从良田至宜章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兰山、嘉禾地区西进的途中，要通过一座大王山，在一个三岔路口，我们二师先头营接到命令：先头营继续向南，警戒乐昌之敌，掩护主力过大王山。

打从五次反“围剿”以来，行军、作战、放警戒，我总是随先头分队行动。其中原因有三点：一是红军的青年工作很活跃，青年战士经常开展竞赛活动，为了组织这项活动，作为青年干事理所当然应和先头分队的青年在一起。二是当时部队的吃穿、等款等，要靠打土豪解决，而打土豪的批准权在师政治部，因此，师政治部往往派干部随先头部队行动，可随时批准打土豪，及时解决先头部队可能遇到的困难。第三个原因是我年轻，才19岁，身体壮，具备了随前卫部队行动的体力条件。

我随先头六团三营离开主力，向南沿着石头疙瘩路走了十来里地，发现路旁有个较大的村庄，村里有座漂亮的大瓦房，房顶、山墙上都垒着一道高高的防火墙。一看这房子就知道，这准是土豪。打了土豪，不仅全营同志的供给有了保障，而且可以接济贫苦农民。我们当即决定打这家土豪。

村南有不少土丘和坟包。副营长郭玉探指挥战士把机枪朝这些高地上一架，用以控制乐昌方向的来犯之敌。为了万无一失，又派出了一个连，占领了村南两三里处的制高点。

就在营长曾保堂布置警戒的同时，我和教导员带着部队进了村，走访了几家贫苦农民，证实了这是一家土豪。我们不费吹灰之力，进了土豪家。

这家财主真富，粮食堆积如山不说，光是广东出的银元（每块重五钱）就抬出了两大箩筐。见财主搜刮了这么多钱，更激起我们的仇恨。我们每人只带了几块银元交党费，其余全交给当地老百姓。群众高兴得流出眼泪。

我们一边给群众分粮分钱。一边抓紧时间做饭，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

曾保堂营长是个很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他把电话机引线搭在敌人电话线上，这一来可以清楚地收听到乐昌城里敌人对外联络的对话，听了个把小时，就搞清楚了周围敌人的番号、所在位置和动向。我们是午饭前进村的，不知是我们的行动还是大部队过大王山，引起了乐昌之敌的怀疑。他们常在电话里询问：“北边的情况如何？”曾营长是江西信丰县人，广东话讲得很好，他借机麻痹敌人，常常答话说：“北边情况正常，没有发现共军”。敌人信以为真，一直没有向北派兵。这就给我们警戒部队减少了许多麻烦。

下午五点，预定撤出警戒的时间到了。我们撤出警戒，转身向北，经过一小时的急行军，回到了上午与主力部队分手的三岔路口。这时，大部队早已顺利地进入大王山区的丛林里了。

我们先头营，这下子成了后卫营了。大家一溜小跑，沿着山丘小道，进入林中路，来到了大王山脚下。

夜幕降临了，下起了毛毛雨，我们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赶上了大部队。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脚下路更看不清，只能凭前边的脚步声决定前

进方向。一不小心，就有滚下山崖的危险。大家只好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有时，手拉手地朝前移步；有时弯下身子，用手探探虚实。行动非常缓慢。时间就是军队呀，谁不着急呢！上级考虑到敌人离大王山较远，传下命令：照明行军。

照明器材是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办法解决的。有的用随身带的小马灯，有的用松脂灯，最多的就是篾黄火把。南方人都知道，砍下竹子，剥下蔑皮用于织席编筐做家什，剩下的蔑黄，大都用来烧火做饭和照明。山坡上的小山村里堆着的篾黄，就成了我们取之即来的照明器材。我们把蔑黄扎成束点燃，火势很旺风吹不灭，三、五个人一束火把，就照亮了行程。高高的大王山巅，少有农家，已进入深山的前头部队就没有篾黄可利用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把篾黄一捆捆、一把把地向前传递。渐渐地，火把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了。从下往山上看，火光曲折蜿蜒，似火龙窜天，高处向下看，火光曲曲弯弯，活象一条缠着大王山游动的火龙，足有十里长，十分壮观。偶尔看到它中间断了节，那是被丛林或山崖所遮掩。大家看到这长长的火龙，一下子看到了红军的力量，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说实在的，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们虽然也打过胜仗，但元气仍未恢复，大家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在如此壮观的夜行军中，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火光下映现出一张张笑脸。我们打着火把行进，不知崖底有多深，也不见坡有多陡，只见足下的路亮堂堂的。火把的“劈啪”声犹如唱着欢歌，驱散了人们连续奔波的疲劳。我们豪情满怀地在大王山上走了一夜。翌日黎明，才觉疲乏。下山时，实在没有劲了，常常坐滑梯似的一段一段地朝下滑。天下了雨，山坡的泥巴很滑溜，顺势下滑，省了好多劲。

下山之后，前边的部队已经伸直了腿，躺在路边休息了。我们打听到二师的驻地，咬着牙，又走了一段路，才归了队。

这是长征路上极为平常的一天。这一天，没有打仗，连枪炮声也未听见，但戎马生涯的艰辛和战士的情趣足可窥见一斑了。

在西进的途中，我们经过宜章到了临武。在临武，二师为后卫。我和侦察员刘品章带着侦察班去离县城三、四里路的一个寨子打土豪。等我们回来，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刚出临武城西门，一股敌人就进了东门，朝我们追来。刘品章说：青年干事，我来掩护，你们快走。他留在后面打了一阵子，敌人缩回城去了。我们急忙赶上了西去的部队。

部队西进到兰山后，潇水、湘江两条大江横在红军的前面。两江相隔一百多华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率五师之众追上来，湘敌何键部和桂敌李宗仁、白崇禧部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堵截红军于天堂圩、道县之间，合击我军于潇水之滨。因此，先敌占领道县，确保红军西渡潇水，成了燃眉之急。一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红二师，红一师担负阻击任务。二师首长立即部署，把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四团、五团、师部为右翼攻占道州；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邓富连）为左翼，掩护右翼部队的行动。我随左翼团前卫营行动，直插湘桂边上的蒋家岭。右翼四团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奔袭道州获得成功，控制了红军西进的咽喉要道，保证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潇水继续西进。二师右翼部队占领道州、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也很快到了觉山。

敌人见我军进入广西境内，就在湘江部署了一道封锁线，利用湘江天然屏障，沿江一侧修筑了大量碉堡。敌派重兵前堵后追，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湘

江以东地区。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各路红军渡过湘江，红二师的四团、五团在全州以南的觉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战。六团是预备队。敌人依靠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向我军阵地发起一次次冲锋。我们一次次打退敌人。敌人援兵越来越多。红一师等部队相继赶到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五团政委易荡平负伤了，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伤了。等到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我们撤出战斗，过了湘江，从白峪口进入山区。湘江一仗，打得很残酷，中央红军从八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

十三红旗插上遵义城

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我军边打边走，退到资源县油榨坪宿营。接着占领了通道县城，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和阻截。尔后，我们经贵州省之剑河、台江、施秉，到达黄平县作短暂休整，打了土豪。过了两天，部队到达乌江边。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红四团作为前卫，在江界河地段强渡乌江成功。三日，我们全师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设起来的浮桥，跨过了乌江。

我军冲破乌江天险后，江北的守敌节节败退。红六团和红四团对溃逃之敌一阵猛追，敌人的步枪、烟枪丢得满地皆是。我们从江边一直追到团溪。接着，又追到距遵义四十里路的梅关。

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从梅关出发，奔袭遵义。担任先头团的是二师六团，先头营仍由六团三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加师侦察连担任。我随先头营行动，营长杨尚儒。

遵义守敌系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的部队共七个团的兵力。他们都是“双枪兵”。不论当兵的还是当官的，都有两支枪，一支毛瑟枪（或短枪），一杆烟枪。鸦片瘾一上来，多好的毛瑟枪还不如一根烧火棍。这样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他们闻知乌江被我军突破，看到从江边逃窜来的残兵败将，早就吓破了胆。所以我们一路的任务，就不是消灭抵抗之敌，而只是迫击仓皇逃窜的敌人。他们拼命地逃，我们奋力紧追。天下着小雨，路很滑，我们许多同志跌成了“泥猴子”。

遵义有新城和老城，新城无城墙。上午，我们追到了遵义新城。守敌已经逃跑了，我们一拥而进，把红旗插到一座房子上，大摇大摆地走在遵义城内的街道上。

城里的群众自动站在两边，喜笑颜开，夹道欢迎我们。后排的群众一个劲地朝前挤，都想看一看传说中的“天兵天将”、“刀枪不入”的红军是啥样子。他们亲眼看了之后，总是笑咪咪地说：“跟普通人一样，只是身上有泥巴”。

我们进城不久，红四团到了。师部和其他部队也相继进了城。师司令部和政治部安在新城。连饭都来不及吃，军团首长命令四团继续向北追击敌人，乘机攻占娄山关、桐梓。师首长命令六团也向娄山关方向警戒。部队出发后，师政治部首长令我带着师部警卫排两个班到遵义老城去打土豪。老城的敌人也不敢凭借建筑物顽抗，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我们了解到，敌师长柏辉章一向很坏，这人的腿有点瘸，群众称他“柏拐子”。他在遵义城里有处别墅。我们进了老城，头一件事，就是去他家清算罪行，依靠群众的指点，我们找到了他的住宅。他家隔壁是天主教堂，我让一个班看守教堂，其余的跟着我进“柏拐子”家。

这是一座两层的木楼，有凉台，挺阔气。进门一看，“柏拐子”的其他心腹都跑光了，只有他的一个姨太太没有跑掉。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柏拐子”的一件玩物，不是我们清算的对象，没有杀她，只是把她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没收了他家里的东西。早就听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很希望能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中搜出一批钱财，分给穷苦百姓。遗憾的是，白银都叫“柏拐子”带走了，家里没有搜出什么钱，只搜出许多衣物、布匹，还有不少点心。

见了点心，我们感到饿了，就一边吃点心，一边没收财物。把那些适合

部队穿的衣服挑出来，装在箩筐里，其余的抱到楼上凉台上。凉台下是一条小街。我们在上边往下扔衣服，街上的群众就在下边抢。这儿的群众与别处不一样。我们在别的地方散发土豪浮财，有人怕财主报复不敢要。这儿呢，也许是太穷了吧，谁也不怕“柏拐子”“秋后算帐”，争着来抢。有的抢不到，我们就朝他身上扔，并说，“接好！光脚丫的老伯！”“给你，穿破衫的小孩！”“抱娃子的大嫂，这块布给你！”那时，我们这些穷苦人出身的红军战士，只是想着打胜仗，多缴获些东西，一边武装自己，一边分给百姓，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了。

我们站在凉台上扔完了衣服和布匹，就到了隔壁的天主教堂。教堂养着两条凶猛的看门狗，一见我们去，就咧着嘴，汪汪乱叫，向我们扑上来。我告诉战士用刺刀把它们捅死。搜了教堂，没有搞到更多的东西，挑选了一些衣物，连同“柏拐子”家的，装了三、四担。把这些“军需品”护送到师部。回到政治部，把东西交给地方工作科科长赖际发、干事萧文玖。他们代表师“红星没收委员会”，负责分配没收来的财物。

第二天，我们跟着师部，离开遵义城，往娄关山前进。红四团接连攻下娄山关、桐梓后，二师部队继续北移至松坎地区，在对四川敌人进行警戒的同时，作短暂休整。在松坎，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同志当选为军委副主席。这个消息，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虽不是正式传达，但大家都奔走相告，衷心地欢迎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

十四回师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我们部队在松坎地区接到上级命令：向土城方向开进。与此同时，驻在桐梓、遵义地区的红军部队也在向土城前进，原来，我军占领遵义地区后，敌人从四面调重兵进逼遵义地区。我军遂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寻机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实行总反攻。

我们二师占领土城后，迅速向赤水方向前进。刚到川心坳，就接到军团首长的急电，令二师返土城。原来，四川军阀刘湘见红军伺机北渡长江，慌了手脚，急忙在宜宾、泸州等地加强设防，并派其精锐部队郭勋祺师等部扑向尚在土城的红军中央纵队。我们赶回土城时，我们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已同敌人打上了。四团、五团一赶到就占领了高城地，同敌人接上了火；六团为预备队。敌人先占了高地，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不利。五团政委赵云龙负伤。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各自的增援部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伤亡也越来越多。朱总司令亲临我二师指挥所前沿阵地，观察战斗情况。指挥所设在一个很低的土坎坎下，尽管战斗很激烈，情况紧急，朱总司令非常镇定自若。他一会儿猫着腰注视着前方，一会儿蹲下身看地图。他看到川军阵地一时难以突破，硬打下去，侧背受敌，于我不利，便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向古蔺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我们红军从土城西悄悄地西渡赤水河，向古蔺、永宁（今叙水）地区前进。敌人判断我可能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所以一方面调集川、滇、黔之敌，派重兵加强长江沿岸防御，来防我军渡长江；一方面调兵对我分进合击，妄图把我们消灭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赤水以西地区。这时，我们在永宁打了一仗，没有打进城去。敌人增兵了。在吴村大坝地区，敌人包围了我们二师师部。我们在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指挥下，以师侦察连、特务连为突击队，边打边钻灌木林，爬上了一座小山顶，终于打退了敌人。正在这时，上级发出指示，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各部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部队到了扎西后进行了整编，一军团仍为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军团的师编为团。扎西地区非常贫穷，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加上敌人重兵开始向扎西地区推进；中央军委又决定，立即东渡赤水，向黔北地区进攻。这个决定意义很大，既可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又可在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开展战局。

二月十九日前后，红军分两路回师黔北，一军团为左路军、三军团为右路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

二月二十四日，红一团先敌增援部队赶到桐梓，一举攻占了遵义的北大门桐梓。红军此举，使敌人惊慌失措。王家烈急忙调兵赶往遵义、板桥、娄山关一带堵截我军。蒋介石也派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从贵阳赶往遵义，驰援王家烈。娄山关为黔北第一险隘，是遵义的二大门，也是从贵州入四川的要道。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周围三个山峰象剑一样耸入云霄，十步一弯，八步一拐，只有一路可通。这里地势险要，坚固如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攻占遵义，必先夺此关。二十五日，我红三军团打跨了凭险顽抗的敌人，攻占了娄山关。二十六日，敌人进行反扑。三军团从正面对敌猛攻，我们红一军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插向敌后之板桥地区击溃了进攻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地区。二十七日，红一、三军团又占领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

这时，由贵阳驰援遵义守敌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入遵义以南五公里的忠庄铺地区，企图从红军手中夺回遵义。吴奇伟纵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起，这个敌人一直尾追红军。红军对它恨之入骨。要在这里同它进行决战，指战员们斗志昂扬，个个磨拳擦掌。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多钟，敌人向老鸭山、红花岗阵地反复冲锋。坚守这一带高地和遵义城的红三军团，由北向南，从正面迎击敌军。我们红一军团二师的任务是：坚守遵义东南角的高地，从侧后打击北犯之敌，配合红三军团作战。

这是一场近战、恶战，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在遵义城东南一块小高地上，二师指挥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陈光师长下达战斗任务后，刘亚楼政委指着遵义东北边的湄潭黑山说：“三军团在正面打，我们从侧面打。一定要打赢，万一冲散了，大家就向那个方向集中”。说这话时，他情绪激昂，两脚都蹦了起来。

由于事先考虑得慎密、周到，仗打得很顺利。经过一天的激战，在我军的猛烈反击下，吴奇伟率敌指挥部慌忙南逃。黄昏前，我军开始总反攻。冲锋号、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我们二师从山上往下一个冲锋，插到了贵阳至遵义的公路上，把溃退的敌人拦腰截断，由北向南穷追猛打溃逃之敌。

夜深了，天太黑，看不到任何目标。两天来，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没有合眼休息，大家困得连眼都睁不开了。追击二十多里后，见大家实在困乏，陈光师长下令：原地休息。大家沿着公路右边的斜坡停下了，有的同志屁股一着地就进入了梦乡，打起呼噜来。

忽然，陈光师长听到马路的左边还有匆匆的脚步声和吵杂的说话声，来火了，大声问道：“哪个部队的？怎么还不休息？”

脚步声仍然很乱，这是怎么回事？营长梁兴初伸头一看，与一个人撞了个面对面，当看清了对方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不禁大吃一惊，立即向师长报告：“不好！左边这股是败退下来的敌人”。

陈师长立即悄然传令，“消灭左侧敌人”。

待大家互相推醒之后，师部和先头团（五团）同时行动；扑向公路左侧，拉大网似的围歼溃逃之敌。有的用刀捅，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用绳子勒，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有的敌人临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还在叫喊：“别开玩笑呀！”我们又沿着左边的路坡冲下去，搜索了一遍，把一些顽抗的散兵败将送上了西天。这股敌人怎么也没想到红军会以这么快的速度插到他的退路上。

在这漆黑的深夜，我们顺利地吃掉了这股与我们并行的敌人，精神为之一振。大家的睡意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也不觉得累了，继续向南边追击。敌人溃不成军，兔子似的向南逃。我们呢，灵活机动，不要求按建制单位行动，只要跑得快，可尽速前冲。这样，一夜长追近百里路。

天刚亮，我们就追到了乌江边。一看乌江上的浮桥已被敌人砍断了。原来，敌人为了逃命，没等他们后边的部队过完，就将乌江上的那座浮桥破坏了。

在乌江边，最先集合起来的追击队伍，二师只有九百多人。但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梁兴初营长送给我一只黄色的皮包，刚缴获的，挺精致，能提能背，小巧灵便。因是我们二战遵义的战利品，我爱若珍宝，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回师遵义之战，是党中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五天之

内，我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三城，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它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特别兴奋的是，在毛主席指挥下，红军又打胜仗了。

十五攻占嵩明城

二占遵义获得胜利后，我们从乌江边移师遵义城西休整。我们撤出中央苏区以来，被敌人前堵后追，一直没能得到休整。这次打了胜仗，并得到了较充足的补给和几天的休息，部队真是高兴极了。更为令人振奋的是，这期间，中央军委和军团正式传达了前不久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听了传达，我们心中的疑团顿释，思想豁然开朗。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尔后的被动局面，主要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所造成的。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军事上先搞“左”倾冒险主义，接着是单纯防御，失败后搞逃跑主义，因此，红军指战员虽浴血奋战，但无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统率红军，这真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听了这个大喜讯，大家无比激动，有的同志说：“毛主席一指挥，我们就打了回师遵义的漂亮仗”，“毛主席领导红军，中国革命有了希望”。那几天，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吃饭、睡觉都特别香甜。

正在这时，敌人又调集重兵，北渡乌江，向遵义扑来。三月中旬，我们二师奉命从鸭溪镇出发，攻打鲁班场，但没有打下来。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机动至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

尔后，从茅台附近地区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方向前进。当敌人赶紧改变部署，着重防备我军北渡长江时，我们接到命令，突然掉头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掉头南下，南渡乌江，向贵阳地区前进。四渡赤水这一出色的运动战，不仅把北线的敌人甩得远远的，而且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他一面急令云南的军阀部队赶往贵阳“保驾”，一面令贵阳以东地区敌军严防我东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实际上，红军无意东去。我们在佯攻贵阳后，乘云南防务空虚，向西直插云南而去。

四月八日，我们从贵阳与龙里之间越过湘黔公路，立即向西疾进。几天之内，红军连克长顺、紫云县城，渡过北盘江，攻战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过了黄泥河，进入云南境内，接着，翻过朱街子一座山，到了曲靖地区。四月二十七日，攻占马龙，顺利地进入易龙县城。

在易龙住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师政委刘亚楼就把我们政治部的干部叫去。他对大家紧急动员说：“今天要抢占嵩明城，一师右翼，我们二师左翼，齐头并进，赛一赛，看谁先进嵩明城。你们政治部的干部都下去，随部队行动。我们的速度要快。”最后，刘政委风趣地说了一句：“落后了，后进城的就不许进城”。

听说跟一师开展攻城比赛，大家劲头更足了，简单地吃了点儿早饭，先头营就上路了。

这次开路先锋是五团二营，前卫是这个营的第六连。跟往常一样，我仍然跟先头分队行动。

易龙距嵩明城约七八十里，路上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地方民团。我们能否领先拿下嵩明，除了先头分队必须快速行军外，还要机智灵活，顺利解决沿途民团的纠缠。我们以每小时十八华里的速度急进。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个村庄。遇到一个老乡一打听，知道村里有民团一个排。我和指导员陈坊仁一商量，便分兵包围了村庄。这些民团成员大都是为了谋生而被雇用的穷人，

不愿为他们的上司卖命，加之大军压境，我们一喊话，他们就缴械投降了。

我们穿上了这些民团的衣服，把他们交给后续部队处理，又继续快速前进。

前边又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有几十个民团。因为我们走在队伍前边的三十多人换了装，远处的民团见了以为是自己人，赶到村口来接我们。我们趁其不备，迅速缴了他们的械。一些战士又换上了他们的衣服。这样，六连大都装扮成“中央军”，顺顺当当地过了一村又一村。烧午饭时，就赶到了嵩明城外。

城外的大路旁有家茶水店。站在店门前，我们看到了城头上敌人的哨兵。他们已打开城门，正等候我们进城呐！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敌机。后续部队忘却了先头部队化装进城的方案，仍像往常那样见了敌机就躲避。这一来，敌人起了疑心，顷刻之间，敌机扔下了炸弹。守城之敌也从爆炸声中清醒了过来，赶紧关闭城门，并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幸好，茶水店背后是一坡高高的土坎，我们利用这个有利地形，边还击边组织攻城，突破口就选在土城塌落的豁口。

陈指导员交给我一挺机枪，叫我掩护，他带部队攻城。我推辞不会用机枪，争着要去攻城。他说：“别争啦！进机关，我听你的；在连队，你得听我的！”说完，他就带着两个排向前突进了，我迅速瞄准敌人的机枪手打了几个点射，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吧。接着，我们就对着土城豁口两侧，使劲地扫射，打得土城上尘土如烟，守敌不敢抬头。陈指导员趁机指挥部队搭人梯，迅速攻进了嵩明城，守城敌军一部分被俘，大部分都溃逃了。大部队进城时，先头营已经打了土豪，备好粮草，点火做饭了。

这次先头营的迅猛行动和灵活战术，受到了师首长的好评。进城后，我没收了伪县政府总务科长的一只钢壳怀表，交给师政治部符竹庭主任。符主任高兴地说，奖给你用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用表，虽然还不会看分秒，但觉得十分新鲜，不时地从怀里掏出来，听听那噼噼叭叭的走动声。

正当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突然听说我们一军团政治部破坏部（即敌工部）副部长旷达同志，在这次攻打嵩明城的行军途中，被敌机炸死了。噩耗传来，我泪流满面。五年前，我找到红军，第一个接待我的就是他。那时，我比饭桌高不了多少，还是个小孩子，分在通信班里当勤务兵。他是班长，象大哥哥那样体贴关心我，使我很快熟悉了部队生活。后来，我们在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这样被敌人夺去了生命。我没听到他的最后嘱咐，也未见到他的遗容，向他告别。想起这些，我感到十分悲痛。战友倒下去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事业永存。我们只有用战斗来纪念他们。战友的牺牲，促使我更坚强地在先头分队的行列里前进。

十六“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我们攻占嵩明后，六团进至杨林，四团直逼昆明。正在昆明的蒋介石和龙云十分惊慌，急忙调集部队乃至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造成滇北和金沙江南岸敌人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为我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传来了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命令，要求部队迅速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听说要过金沙江，宣传队及时编了一首歌曲，在全部队教唱，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首歌的歌词我记得是这样的：

金沙江
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它水深河流急，
更不怕山高路又长，
我们真顽强。
战胜了困难，
克服一切疲劳，
下决心，
我们要渡江！

接到命令的当天——四月二十九日，我们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出发了。四团完成佯攻昆明任务后，又智取了禄劝、武定、元谋占领了龙街渡。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又没有多少渡船，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我们便转向绞平渡过江。五月九日前，我们红军全都顺利渡过金沙江。

过了金沙江，我们到了会理县城附近，见到三军团的部队正在围攻会理城，敌人死守不出，就把该城团团围了起来。我们二师从会理城东面绕到城北面十几里外的地方，休整了几天。会理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坝子，人口较多，农产品比较丰富，粮食也比较充足。这次休整是回师遵义后又一次比较大的休整。部队利用这几天时间，美美地睡了好觉，改善了伙食，指战士的体力得到了恢复。部队的粮食、衣物等也得到了补充。

在会理，我和罗荣桓同志相识了。罗荣桓同志的名字，我在苏区就知道，也见过他，但真正相识是在会理。他戴着一副眼镜，和蔼可亲地和我打招呼，问我的情况。那时，他受“左”倾错误排挤的处境还未改变，只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巡视员，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受不公正的待遇。过了金沙江，他随二师行动。二师的首长对他的遭遇甚为同情，劝他留在二师。刘亚楼政委对他说：“您不要回去了，就跟我们二师走吧！跟我们走比跟机关走还要安全一些”。还说：“您回去，他们连骡子都会给您收了！”罗荣桓同志笑呵呵地说：“不会吧！即使收了，我还有两条腿嘛，有么子要紧！”我在一旁听着他们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深为感动。离开会理，罗荣桓同志就从二师回总政治部去了。

在这期间，党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正加紧赶渡金沙江，企图继续追击我军。川敌加紧调兵，加强大渡河北岸防御。因此，中央军委命令红军迅速北上，强渡大渡河，直奔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五月十六日，我们从会理出发，向德昌前进。在德昌城里，我得病发烧了。第二天出发时，一出德昌城就要过一条安宁河，河上架着一座铁索桥。政治部主任符竹庭让我骑他的骡子过铁索桥。随后，我们到了西昌。城内有

敌人。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没有攻城，只是把城包围起来，从城西面绕了过去。又赶了一段路，就到了泸沽。此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必然会遇到敌人阻击；一条是小路，但要通过复杂的彝族区。为了早日赶到大渡河，中央决定走彝族区，并决定红一团为先遣支队，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由他们带领先遣队，为全军开道。

我们二师随先遣队到了冕宁。在这里扩大红军，师政治部要求每个干部吸收六名红军战士。我去扩红，在一个山岗上见到一批青年，有几十个人，他们一丝不挂，仅用树枝遮体。心想，这些穷人是扩红的对象。上前一问，方知他们是红一团前卫连——工兵连的。他们遇到了彝人，要他们把衣服、枪支一切物品都交出去；因强调民族政策，他们没有开枪，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

长期以来，这里的彝族群众饱受反动统治者严重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他们对外来人、汉人不了解，对红军同样有戒心，所以他们阻止红军过彝族区。但他们只要东西，不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红军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不进民房，不扰村民，露宿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后来，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一起斩雄鸡喝血酒，结为“金兰之盟”。这样一来，彝族群众对红军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他们马上改变了态度，同意红军通过。我们经过大凉山的时候，每个村子路两旁的山坡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彝族百姓。他们面带微笑和惊异的神情，看着我们的队伍前进。

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之后，我们师直机关跟着陈光师长，经大渡河边的天堂圩向安顺场进发。

就在我们向大渡河前进之际，追敌薛岳等部已北渡金沙江，从德昌赶来了。川敌主力也离大渡河北岸不远了。

红军到了大渡河畔，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认为：“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复灭之地，现在共军入此彝汉杂处，……必步石达开的复辙”。他令国民党军“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他扬言“要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一八六三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两万西进，在这里苦战一个多月，终于陷入绝境，遭至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惨遭清政府杀害。七十二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同样是河水暴涨的五月，中央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尽管形势十分严峻，但我们红军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坚信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在英勇的战士面前，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昔日翼工悲剧地，今为红军胜利场。

果然，我红一团奇袭安顺场获得成功，抢占了渡口，并于五月二十五日，成功地强渡了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第一条通路。

但是，安顺场地形险峻，南北两岸悬崖陡峭，河水流急浪高，河面宽达三百多米，仅靠三只小船，全军无法在敌人赶到前渡过河去。必须打开第二条通路。

中央军委决定，除一师三个团和军委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外，红军主力沿大渡河西岸上行，抢夺泸定桥。

担负夺桥任务的前卫团是二师红四团，师直和六团、五团跟进。师首长令我随四团行动。

我下到四团后，见到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正在紧张地做动员工作，

要求部队迅速地做好出发准备。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疾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二百四十里行程，道路崎岖，要翻越几座山，途中还有盘踞的敌人纠缠。但红四团的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战胜了艰难险阻，消灭了纠缠之敌，于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赶到了泸定桥。

经过精心的研究和仔细的准备，下午四时，在王团长和杨政委的指挥下，全团火力掩护突击队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激流奔腾的江面上，攀着铁索，冲过桥去，冲进泸定城西门。团首长指挥三连战士紧跟在突击队后面，一边铺设桥板，一边向桥东头扑去。突击队的勇士和三连的同志们，在桥东阵地及泸定城内，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消灭了敌人，占领了泸定城。

打下泸定桥后三四天，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也来到了，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我们师部在泸定城刚住下不久，敌人的飞机就来轰炸。我随陈光师长等跑到一座山上躲飞机，结果沾了一身蝎子草，皮肤刺得火辣辣的，又痒又痛。三十日上午，师首长命令六团为先头团，继续北进。六团攻克了龙巴铺，占领了化林坪。接着，四团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攻占了泸定县与汉源县交界的飞越岭的垭口——飞越关。这就扫清了敌人在大渡河东岸的残敌，控制了北去的通道。

过了飞越关，部队向天全方向前进。走到雅安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我病倒了。全身酸痛、难受，一点力气也没有，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我正犯愁时，负责收容的二师卫生部长叶青山，带着几个同志走来了。叶部长见我病得不轻，就从一个帆布药箱内取出一种药，往我胳膊上扎了一针，又让一位同志扶着我走了一段。说来也真灵，走了一会儿，我感到浑身轻松多了，越走越有精神了。到了雅安旁边，就赶上队伍了。回到师部，就参加了调查土豪，打了几家土豪。雅安附近比较富一点，越往北越穷了。部队在这里靠打土豪补充了些吃的、穿的，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十七过雪山草地

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一线防御后，继续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主要障碍，是横在面前的大雪山。

一过宝兴，就进入一条很窄的山沟，两边都是悬崖陡壁。走在沟里看天空，只能见到一隙光亮。走尽这条狭沟，一溜上坡路，走到了雪山脚下。

我们眼前的雪山叫夹金山。它属于邛崃山脉，海拔四千多米。它横亘于宝兴与懋功交界处，是宝兴去懋功的唯一通道。这里山岭逶迤，连绵不断，主峰高耸，终年积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压很低。

为了顺利翻过这座雪山，各级领导对部队作了动员，详细地交代了注意事项。

六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二师以红四团为前卫团，登上了翻越夹金山的征途。开始登山时，我们走得比较慢，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顶着呼啸的山风，盘山而上，朝山顶走去，只见山上白雪皑皑，一望无边。这时感到呼吸急促，胸闷难受。但大家互相鼓励着，踩着白雪，攀登崎岖的山峰。大约距山顶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使体力有所恢复。快到山顶时，大家一溜快步冲了过去。因为山顶空气稀薄，停留时间一长，就要因缺氧而倒下。由于节奏掌握得比较好，我们顺利地越过了第一座雪山，几乎没有一个掉队的。

翻过夹金山，到了达维，我们意外地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见到兄弟部队的战友，大家无比兴奋。四方面军的同志很热情，忙着给我们腾房子、做饭，照顾我们宿营。第二天，刘亚楼政委带着我和汤光恢等几个同志，到了懋功（小金）红三十军军部。三十军的李政委（李先念同志）、程副军长（程世才同志）、政治部李主任（李天焕同志）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那几天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开了联欢会，庆祝会师。干部战士心情激动，大家举起了臂膀，举起了枪，热烈地欢呼。笑声、欢呼声、口号声回荡在上空。几个月来，我们跋山涉水，转战万里，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盼的就是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重新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如今，这两支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部队终于会师了，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啊！

六月下旬，我们溯抚边河北上，经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沟，到达木城，开始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梦笔山不是一个山坡直上主峰，而是一道山梁接一道山梁的梯次上升。它看上去比夹金山低，实际上很高。它海拔四千五百多米，上下约八十华里。为了抵御山上的寒冷，我们把所有衣服都穿上了（实际上多数同志只有一身单衣，更无衣服可加）。上了梦笔山，一会儿是雨雪，一会儿冒出太阳，气候变化剧烈，日温差变化很大，空气很稀薄，使人透不过气，感到心慌、胸口发紧。我们尽量掌握好爬山的节奏，在山势比较平缓、气候稍好的地方，就休息一下；在气候恶劣、山势陡峭的地方则快速通过。即使如此，越往上越感到体力不支，没有劲了。这时，大家靠互相鼓励，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咬着牙翻过了这座大雪山。

前卫团二师六团进入山下的纳足沟，向卓克基前进时，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率领的士兵的阻击，经劝说无效后被迫还击。士兵退到了卓克基。

卓克基因地形似矮脚台桌而得名（当地藏民称桌子为卓克基）。卓克基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南部，梦笔山的北麓，地处纳足沟与梭磨河的交汇处，是嘉戎藏区。这里东去汶川、灌县可进入川西内地；北经草地可达甘肃、青海

两省；南经懋功可通雅安、西昌；西经金川、丹巴可到康北（今甘孜地区）、西藏。卓克基是扼控川西北高原山地交通的咽喉要地。当时的卓克基包括纳足、西索、查米三个村、约二百户人家，近一千人。沙尔乡，大藏乡、龙尔甲乡都属于卓克基土司的势力范围。土司没有正规武装，他们威迫利诱一些藏民，拼凑起士兵队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我们的队伍刚到卓克基，土司指挥士兵队伍凭借着土司宫寨，封锁要道，不让我们进寨。

为了坚决执行红军的民族政策，保护藏民，保护藏族建筑，我前卫六团没有急于攻寨，只是用机枪，迫击炮吓唬他们，但他们仍不撤退。这样相持到了夜晚，六团的团长朱水秋和政委邓富连商量了一个办法：用信号枪吓唬他们。漆黑的夜晚，两颗信号弹在天空划出了两道明亮的弧线，放出异样的光彩，土司宫寨内突然一阵骚动，士兵们四处逃窜。他们以为红军用妖术请来了天火，怕被烧死，弃宫溃逃了。我们占领了这座宫寨。

第二天，我们仔细看了这座宫寨。这座宫寨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前后左右四幢楼房组成，中间是庭院。楼房内雕金镂玉，富丽堂皇。它的主体建筑是后楼，共六层，高二十米左右，它的外面有五六层高的碉楼，雄伟、坚固。

我们在卓克基没收了土司的不少粮食，但没有搞到盐。在那里住了几天，经短暂休整后，又继续前进了。

我随红四团行进到卓克基以北十余里处的马塘村，刚安排好住宿，团政委杨成武送给我一包咸盐，沉甸甸的，约有五斤。

我问杨政委：“哪儿来的？部队都有了么？”

他指着山脚下那座寺院说：“那儿，缴获的，都有了。”

我很感激，迫不急待地朝嘴里扔了块四四方方的盐粒子，咸滋滋的，真够味。咸水咽下肚，因缺盐而乏力的身子一下子来劲了。

手捧盐巴，我不住地叹息：盐呀盐，你是艰难历程的见证呀！在苏区根据地时，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对我们进行军事围剿，一面进行经济封锁；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我们断盐。为了搞到盐，牺牲了多少战友、多少群众呀！有段时期，我们只能靠竹笋充饥，这东西，没有盐实在不好吃。长期缺盐，全身没劲，连路都走不动。为了胜利，为了生存，我们只得将墙上析出的白色的芒硝刮下来，溶解、过滤、熬煎后食用。这种硝盐，又苦又涩，虽不好吃，可总比尝不到一点咸味好呀。

经历了那段缺盐的生活，我们深深地懂得了盐的真正价值，它是生命和力量的要素呀！因此，行军、打仗、打土豪、“拔白钉”，遇有铜钱、白银，有时是不屑一顾的；然而，遇上盐，非抓它一把，装在小口袋里不可。我们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广东鸟径搞到了一批盐，后来在滇、黔、川转战，到处有村镇也不缺盐，这样就渐渐扔掉了带在身上的盐巴。眼下我们又进入人烟稀少的地区，一连几天见不到群众，偶尔经过一些藏民村落，也因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藏民一听红军来了都躲得远远的，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援，食盐又奇缺了。

杨成武政委在这样的时刻送我一包盐，其深情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我找了块油布把盐包好，揣在梁兴初同志在乌江边上送给我的那只小皮包里，继续上路。

为了得到藏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进入藏汉杂居区前，领导上就反复强

调要搞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逐渐得到藏民的了解和支持。

经过刷经寺、康貌寺之后，我们又开始翻越第三座大雪山——长板山。长板山又称马塘梁子、亚克夏山，海拔也是四千多米。在翻越这座山时，我同二师卫生部长叶青山、政委王奇才和敌工科干事王学清等，担任收容队。对掉队的同志，我们帮他背东西，挽扶着他前进，鼓励他咬牙坚持住。这些同志在收容队的帮助下，也终于翻过了这座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大雪山。

翻过长板山，我们进入黑水县境的芦花镇。在芦花镇稍事休整后，就开始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打鼓山海拔约五千米，既陡又高。我们忍着饥饿和寒冷，以顽强的毅力，才翻过了这座山。

此后又过了一座雪山，才走上了通向毛儿盖的道路。

从卓克基出发，红军克服种种困难，七天内连续翻越长板山、打鼓山，跨过黑水芦花地区，行程五百余里，胜利地到达毛儿盖地区。

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是毛儿盖土官属下十八寨地域之总称，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这里是松潘县的重镇，是藏胞聚居地，它北连荒凉的大草地，南通懋功，西通甘孜，是交通咽喉。为了堵住红军北上之路，胡宗南调集二十个团兵力在松潘一带布防。在毛儿盖，敌人放了一个营的兵力。

六月中旬，我先头部队红四团到达这里后，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一阵冲打，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占领了毛儿盖。随后，中央军委和军团部进驻毛儿盖。

在我们二师师部到达毛儿盖的前一天，刘亚楼政委对我说：“军团调你到军团政治部去当青年干事，师直属队青年干事王凤鸣接任师青年干事”。想到要离开生活战斗了一年多的二师，要离开熟悉的首长和同志，我内心很激动，眼眶湿润了。也就在这天傍晚，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师参谋长李棠萼同志，在去毛儿盖汇报工作回来的路上，被士兵的冷枪打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中都很悲痛。第二天，路过李参谋长牺牲的地方，刘亚楼政委带着我们向他的遗体告别，掩埋完后，我们忍着悲痛上路了。

到了毛儿盖后，我就到一军团政治部的住地去报到了。当时军团政治部主任是朱瑞，组织部部长是萧华、副部长刘道生，地方工作部部长刘炎，干事罗亦经；破坏部部长萧向荣，直属队俱乐部主任潘振武，宣传队队长梁必业等。我们组织部，除了部长、副部长，还有几个干事，组织干事李子芳，我是青年干事。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他是我们军团部移到离毛儿盖几十里外的波罗子时调来的。他到政治部来的那天没有骑骡子，身背一个小背包，后面跟着一个勤务兵，挑着一副行李，扁担上挂着一盏马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印象特别深刻。

毛儿盖到波罗子要过一条河。这条河的河面并不宽，只有十几米，也不深，但流速很急，有漩涡，工兵连架桥都架不起来。我们只好涉水过河。宣传队的小同志，个子小，好些人还是孩子，他们一个个拉着朱瑞主任的骡子尾巴过河。我拿着一根竹竿，撑着过去，走到河中央被急流一冲，脚站不稳了，险些倒下去，幸好竹竿撑住了河底，才没有被冲入漩涡。后来，大家有了经验，手拉手地过了这条河。

我们在波罗子住了些日子，又返回毛儿盖，说是要攻打松潘。这时，一

军团成立了“前指”，七月中旬，军团长林彪和左权参谋长带着司令部一些同志及政治部的萧华部长和我等“前指”人员，向毛儿盖东北方向前进。红四团首先拿下了胡宗南驻哈垌的兵站。“前指”就设在哈垌河西的山脚下。松潘地势较高，敌人在附近都修了工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天夜晚，部队摸到敌人阵地前，打得很激烈，但未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前指”带领部队撤出战斗。当晚，我们在哈垌到毛儿盖之间的一座高山的松林里露营。虽是七月天气，但高山上寒风凛冽。我身上只盖了一件薄薄的被单，彻骨的寒风袭来，冷得浑身发抖，虽然连日行军打仗身体十分疲倦，但仍难以入睡。正在困寒交加非常难受的时候，萧华同志把他的棉被盖到了我身上。他把温暖给了我，而自己却被冻了一夜，这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毛儿盖地区，我们经历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筹措粮食。

部队翻越雪山前就进入了穷困地区，过了两座雪山，到了卓克基，粮食就开始紧张了。部队除了吃青棵麦子，还经常吃豌豆苗充饥。翻过长板山，部队已严重缺粮了。到毛儿盖前，见到有的战士在搜集路旁的麦粒。其实，这不是新鲜的麦粒，而是走在前面的部队屙出来的没有消化的青棵麦粒。后面的部队把这些麦粒集中起来，用水冲洗一下，又接着煮着吃。粮食困难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部队一到毛儿盖，就发动大家想方设法筹措粮食，这不仅是维持眼前生活的必需，更重要的是为了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

过草地前，领导上对部队作了思想动员，介绍了草地的情况，说那里没有老百姓，天气变化无常，困难很多，还可能受敌人骑兵的袭击。

为了对付敌人的骑兵，有位同志编了一首打骑兵歌，在部队中教唱。这首歌的歌词是：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
近着面前来打它，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一齐杀！
我们瞄准它，
我们打垮它，
我们消灭它！
无敌的红军是我们，
打败了敌人百万兵，
努力再学打骑兵，
我们百战又百胜！

就要过草地了，领导上最关心的还是粮食。上级把仅有的粮食（青棵炒面）分发给每个人携带，并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日三餐，每餐只准吃两牛眼杯（每杯合旧秤约一两），违者按军法处置。

用粮纪律如此严格，大家都不敢随意多吃一口。快过草地了，我见到六团青年干事钟生益（江西兴国人），已经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起初，我以为他犯了纪律，没按规定吃粮，造成断粮危及生命。细一了解才知道，他们团在《松潘战役计划》中担任探路任务，在龙日坝遭到敌人骑兵两千余人的突然袭击，全团被打散了，渡河（壤口尔曲）归队时，河水冲走了他的干粮袋。一时又实在无法给他补充粮食，这些日子，他是靠同志们的友爱互助糊口度日的。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将自己的炒面匀出了一碗，又将杨成武送给我的咸盐给了他一把，他含着泪水收下了。这件事，钟生益同志一直记在

心里。一九六四年，他在河南省军区任政委，偕同爱人到北京来看我，深怀感激之情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八月中旬，我们一军团、三军团作为右路军之左翼，由毛儿盖入草地，向班佑方向前进；三军团为后卫，循一军团所经之路北进。

八月二十一日，我们左翼部队出发了。红四团为先头部队，我们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从毛儿盖出发，第一天走了约四十里大路，到了草地的边缘。

八月二十二日，我们开始了穿越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的艰难进程。

踏上草地一看，这里荒无人烟，水流淤滞，杂草丛生，大片大片的沼泽地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道路。先头部队在向导带领下摸索前进，并在岔路口插上路标；后面的部队照着路标所指方向，踏着松软的草丛根一步一步地行进。有的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和骡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茫茫草原海拔高达三千五百米以上，气候恶劣，忽而风雨冰雹，忽而浓雾弥漫。

第一天，我们走到了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过夜。第二天，走到了一个叫后河的地方宿营。天下起了雨，大家只好找块地势稍高的地方，铺上油布、斗篷，放上背包，撑开雨伞，遮着脑袋和半个身子，坐了一宿。

住、行如此艰难，吃的更是苦不堪言。那几天，我们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炒麦子充饥。饿得实在不行了，就采些野菜、揪些野草、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法子，就煮牛皮带充饥，有的甚至把屙出来的麦粒子洗一洗再煮着吃。

生活这样艰苦，部队的鼓动工作仍很活跃。在草地，聂荣臻政委就对我说：“现在这样艰苦，要让部队多唱歌，提高士气，鼓舞斗志”。每天早晨出发前，各部队都要唱一首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噼咧啪歌》：“手牵手，向前杀，……建立苏维埃，我们的红旗遍天下！”走在沼泽地上，歌声也不绝于耳。大家就是靠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靠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

经过四天艰难的行程，我们经过色既坝，终于穿过了水草地，八月二十五日到达了班佑。

十八到陕北

到达班佑后，部队一面休整，一面筹措粮食。

九月十日凌晨，我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出发，向甘肃省迭部方向前进。这样紧急、仓促的行动，大家都感到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

后来，就听到消息：张国焘坚持西进或南下的错误主张，反对中央确定的北上的战略方针。为避免发生冲突，脱离险境，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开了会，决定率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悄然出发，昼夜兼程北上。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达俄界。

九月中旬，军团首长命令红四团为先头团，攻占腊子口。

打下腊子口，事关全局。当时我们在军团听首长说，腊子口是最后一道关口，只有拿下腊子口才能到达甘肃，打不下就要被迫掉头南下再过草地，回到大小金川，红军的前途就十分险恶。所以，腊子口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在英勇的红军面前，没有什么攻不破的难关。九月十七日，红四团攻下了天险腊子口。

我们过了这个险要的峪谷后，到了大草潭，见到了老百姓，象似到了另一个世界，心情特别高兴。我们沿白龙江北上，接着向东到了哈达铺。

哈达铺是甘肃的一个镇子，是回民聚居地区。部队进行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的教育。

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的寺院，党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毛主席首先讲了红军离开瑞金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今天到了哈达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又讲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蒋介石仍在甘肃、陕西追堵我们，我们北上抗日的道路仍很艰难。

毛主席还讲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他闹分裂，不愿北上，要回四川吃大米饭，但回到四川没有前途，要成为“瓮中之鳖”。

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可以落脚。听到这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讲了部队要整编，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辖一、二、三三个纵队，原来的一军团为一纵队，三军团为二纵队，中央和军委直属队为三纵队，团改为大队，属纵队指挥。

毛主席风趣地说，现在我们只有八千多人，看上去少了一点，但万把人不多不少，打游击正好。

哈达铺整编后，我仍在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任青年干事。

在哈达铺期间，我们还广泛地宣传抗日的主张和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同时，红军也改善了生活。因在藏民区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在这里吃得好一点，大家都特别高兴。经过几天改善生活和休息，体力得到了恢复。

休息了几天，我们就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经过几天行程，陕甘支队在鸳鸯镇附近过了渭河，于九月二十七日，到了通渭县。军团政治部首长派我到方面军政治部去汇报青年工作情况。到了方面军政治部，受到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热情接待。我汇报了军团开展青年工作的情况，杨尚昆、陆定一同志听了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工作，留我吃了一顿饭。我告

别了杨主任，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军团政治部。

离开通渭后，我们穿过西（安）兰（州）公路，突破敌人设在静宁、会宁的封锁线，向宁夏固原进发。在青石嘴，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击溃了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缴获了二百多匹马，由纵队组建了骑兵侦察连。这是我们红军第一次有了骑兵连。纵队司令部的通信排都配了马。但是，红军大多是南方人，许多人没有见过马，更不要说骑马了，通信排配了马后，许多人不敢骑。有的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开心地说：“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平路牵着走，永世无马骑”。我们就到通信排和骑兵连去做动员工作，鼓励战士们尽早学会骑马。我们的战士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经过一段刻苦锻炼，很快就能熟练地驾驭战马，驰骋疆场了。

我们离开青石嘴，翻过了六盘山，经环县，过陕甘交界的老爷山，于十月十八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

吴起镇地处甘肃、陕西两省交界，北与当时的定边县苏区接壤，东南和保安县苏区相连，是陕北根据地的边缘地区，是一个区苏维埃所在地。见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苏维埃，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啊！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后，历经千山万水，不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建立苏维埃么！今天，我们终于又到苏区了，又见到了望眼欲穿的苏维埃，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

到了吴起镇后，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对长征作了精辟的总结。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短期休整后，十月底经保安东进，于十一月初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十一月三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并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节。一军团在驻地套塘口召开运动会，检查部队的军政素质。比赛项目有刺杀、投弹、射击、跳高、跳远。本来有水重机枪射击比赛，因天气已冷，水要结冰，这个项目只好取消了。这次运动会开得很成功，部队情绪很高，比赛结束时，聂荣臻政委作了讲评。

此时，敌人感到中央红军主力同陕北红军会合，对他们构成很大的威胁，遂派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逼近，妄图把我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首歼敌第一〇九师于直罗镇地区。

十一月二十日夜，我军将该敌包围于直罗镇。次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进攻。

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红军部队的攻击受阻。这时候，我们见到毛主席穿着大褂，脖子上围条白毛巾，带着两个警卫排，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一军团指挥部。二师政委萧华见主席到来，激情满怀，立即用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这件事，对即将发起冲锋的四团、五团进行生动有力的战场鼓动，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指战员们勇猛冲向敌阵，战斗进行到下午，大部分敌人被歼，夺取了阵地。随后又打垮援敌。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

直罗镇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到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直罗镇战斗后，红军总政治部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指战员们引吭高歌，赞颂长征的伟大胜利。我记得歌词是这样的：

中央红军，
胜利反攻，
出发自江西，
十二月长征，
历经险山和恶水，
战胜白军与团匪；
冲破了重围，
踏遍了十一省，
行程二万五千里，
大小五百余仗，
都打垮了敌人；
计算起来，
溃敌四百十一个团，
英勇的、红色的英雄，
无坚不摧，
终于到陕北苏区，
会合红十五军团，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胜利向前进！

十九在一军团教导营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直罗镇战役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我们通过学习这个重要文件，明确了一个思想，就是红军应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陕北根据地的巩固。这时，我一军团在临镇、秋林一带，紧张地开展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把我找了去，对我说：“现在军团决定恢复教导营，任务是保留培养骨干，派你去当政委，熊招来（熊奎）任营长，四师的青年干事谢立全任总支书记，调王紫峰任政治教员，李梓斌任军事教员，你们马上开展工作”。

朱主任还问我：“有什么想法？”

“听从组织分配！”我回答。

军团教导营实际是一所随营学校，担负着训练基层干部的职责。原先教导营的营长是陈士榘，政委是蔡书彬。过了雪山草地，到达班佑，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陈奇涵接任教导营营长，二师六团政委邓富连接任政委。哈达铺整编，教导营撤销了。这次是重新组建教导营。

我和熊招来、谢立全同志一合计，决定向军团通信科科长刘鹏要两个电话员（池大昌、邱子水）当青年干事，张庆喻任俱乐部主任，萧鸣任管理员，文书是陈昌亨（陈力）。

教导营的班子一搭起来，各连的人员很快调齐了。营辖三个连。政治连，连长罗元忻，指导员萧文玖，主要培养连级政治干部；军事一连，连长张士忠，指导员匡根山，培养连级军事干部；军事二连，连长杜则生，指导员李呈瑞，培养排级干部。

教导营的学员，是从一军团各部队调来的，全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骨干。每个连一百多人，全营近四百人。

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孙毅同志经常到教导营来指导工作。

教导营组建起来后，立即投入了打过黄河去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参加了一军团在临镇举行的东征誓师大会。

整个东征军称谓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主席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东征的任务，主要是打击阎锡山，扩大红军的影响，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和准备，抗日先锋军就要渡河作战了。

二月中旬，虽然是初春时节，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寒气袭人。渡河前夕，我们教导营随军团隐蔽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站在白雪皑皑的河岸上，望着滔滔的黄河水，我们心情激荡，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过河去。二月二十日晚十时，先遣队用小木船展开了敌前偷渡，很快突破敌人河防，第二天拂晓就攻占了三交镇，全歼敌一个营。随后，红军的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地渡向河东。黄河岸上响起嘹亮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磨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二十二日，一军团的部队全部渡过黄河，并乘胜占领了留誉镇。军团司令部住在上高堡，我们教导营住下高堡。宿营不久，我到军团司令部去。聂荣臻政委见了，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要把教导营带好！”。后来，军团长林彪还到下高堡，对教导营排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提了训练要求。二十六日，一军团部队在关上村截住了向我占领地区进行反扑的逃敌独立第二旅，消灭了敌独二旅旅部、第四团全部和一个炮兵连。这为红军在河东站住脚跟奠定了基础。

三月初，我一军团越过吕梁山，东进至孝义县兑九峪地区，逼近了同蒲路。这时，阎锡山调动驻守介休、孝义的兵力向兑九峪扑来。原先估计敌人不过四、五个团，便决定把敌人放进兑九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围而歼之。

三月十日，我军发起了攻击，遇到了敌人的激烈抵抗，敌人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我军主力部队经过一场激战，打垮敌人多次反冲锋，毙伤俘虏一批敌人。我们教导营的任务是占领郭家掌前的一个山头，正面警戒、阻挡敌人。后来在战斗中查明，敌人投进来的兵力不是四、五个团，而是步兵三个师、炮兵一个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比原侦察的兵力多了好几倍。毛主席了解这一敌情后，立即下令撤出战斗。

随后，毛主席在大麦郊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这天，毛主席身穿长袍，头戴一顶皮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毛主席首先说：我们这支队伍叫抗日先锋军，到山西的目的就是准备上前线抗日，现在东北有抗日联军，华北有抗日自卫军，抗日形势发展很快。

接着，毛主席又讲了下一步行动部署，左路军（十五军团）北上，佯攻太原；右路军（一军团）南下，进攻临汾。除了打仗，还要筹款，扩大队伍。

此后，一军团在二十余天时间内，突破了敌汾河一带的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两侧，先后围攻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等地。打赵城时天下雪，教导营二连的同志把棉衣翻过来穿，露出白色，以缩小目标。打了一阵，军团首长指示我们，教导营不要轻易去打，保存骨干要紧，主要是训练任务。打洪洞县城，我们只担负了佯攻任务，配合四师从东北角攻城。打洪洞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些日子，主要是开展“扩红”运动，宣传抗日主张，筹措粮款。

这时，发生了打错土豪的错误，我作了检讨。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我们住在洪洞县西面的南段村。一天夜里，政治连指导员外出打土豪，事先没有报告我。他们进村后没有详细调查，偏听偏信，把三户人家当作“土豪”，没收了人家的财产，连骡子也牵了回来。第二天，群众告到军团政治部，经查实，确实是打错了。军团政治部责令我们立即退赔。政治部主任朱瑞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严肃地批评了这件事，并指出我要负“督促不严，检查不周”之责。我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并马上当众作了检讨，向被错打的庄户退赔、道歉，免回了红军的声誉。

这件看来平常的事，为什么要这样严肃对待呢？因为我们这次东渡黄河，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作准备，中央、军团部都非常强调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对违反政策的事必须坚决纠正，不能有任何马虎。

就在我们胜利开展斗争的时候，蒋介石派重兵进入山西，配合阎锡山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一军团便奉命经稷山、新绛、乡宁后撤，四月中旬打下了吉县，随后从关临镇西渡黄河，回到陕西延长地区。

东征胜利结束了。在七十五天中，我军歼敌万余人，扩大红军三千余人，筹款近五十万元。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和政治影响，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种子，点燃了抗日烽火。

返回陕北以后，我们教导营随军团驻在延川县城西休整。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了在大相寺召开的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我记得这次干部会是在一个大席棚里开的，主要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在会上，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肯定了东征的成绩，指出了缺点，强调要反对本位主义。彭德怀司令员也讲了话。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红军东征归来，也参加了会议。因在西安工作需要，他剃去了胡子，显得更加年轻、英俊。他讲了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抗日问题，指出有希望联合抗日。听了他的讲话，大家很受鼓舞，群情振奋。这次会议还宣布组织援西军，西征甘肃、宁夏，打击马鸿奎、马鸿宾的反动势力，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促成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大相寺会议后，从一军团调走不少领导干部到保安红军大学去学习。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政委仍是聂荣臻同志。从教导营也抽走了二百人去庆阳红军学校学习。我们随即又从各部队补充了二百多人，使教导营齐装满员地参加西征。

五月下旬，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教导营随军团指挥部行动。十五军团为右路军。

西征的第一仗，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在曲子镇，一军团消灭了马鸿奎的一〇五骑兵团，活捉旅长冶成章（绰号野骡子），缴获了许多马匹骡子。我们见到聂荣臻政委换了一匹好骡子，都特别高兴。接着，又击溃了敌驰援曲子镇的两个骑兵团。这两仗，打出了红军的军威，马匪闻风丧胆，我军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等地。

六月下旬，我军继续向北挺进，一军团进入陇东的靖远、海原县境。这一带十分荒凉，头顶烈日行军，也实在艰苦。七月底，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集结在陇东的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整训。一军团司令部住预旺堡东南七营川的白嘴子，我们教导营也住在附近。

在这里，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我犯了本位主义错误。我们刚到预旺堡时，离我们营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土围子，军团首长指示我们教导营去把它解决了。我当即带着部队把土围子包围起来。结果，土豪跑了，我们缴获了一些棉布。我和营长熊招来没有请示上级，就决定用这些布给全营每人做了两套衣服。当军团直属队召开大会时，我们穿着崭新的深蓝色衣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了会场，心里美滋滋的。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他来到会场的后边，把我叫了出去，批评说：“你这样做是犯了本位主义”。经小平同志这一批评，我立即意识到是错了。东征归来大相寺会议上刚批评过本位主义，时隔不久，我怎么遇事只想到本单位的利益呢。我内心感到羞愧和懊悔，当即向小平同志认了错。这件事情，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后的工作中我始终记得这个教训，没有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件事，是一军团、十五军团连以上干部在吊咀子开联欢会。吃晚饭时，一军团有的同志一高兴就闹抢菜吃、抢饭吃。吃完饭后在河滩草坪上开晚会。先由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讲话，他首先对十五军团表示欢迎，

同时批评了一军团干部吃饭时哄闹不象话。接着，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讲话（第一次见王首道同志），表示向一军团学习，说一军团干部学习抓得好，已经学世界知识了，我们十五军团干部才学政治常识。王首道主任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军团政治部确实组织干部学习了世界知识。什么“托拉斯”、“辛迪加”、“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新名词特多，也不太好懂。但政治部领导对学习抓得很紧，还进行了考试，由朱瑞主任、邓小平副主任亲自评分。全军团得分最高的是陈赓和李子芳同志，他们得了110分（100分加10分奖励分），我得了77分，也有不及格的。王首道主任讲话后，演出文艺节目，潘振武同志上台演了节目。这次联欢，使两个军团的同志增进了了解，交流感情，进一步密切了关系。

在预旺堡期间，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聂荣臻政委的夫人张瑞华同志。那天，我去军团直属队开会，见到了一位干练的女同志。一听说他是聂政委的夫人，刚从白区来，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预旺堡整训期间，朱瑞主任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回军团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兼巡视团主任。黄历接任教导营政委。我交接完工作，就回到了政治部，这时，组织部部长是李子芳同志，组织部还有统计科科长邓逸凡及几位干事。

八月底，我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陇东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聂荣臻率领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直插静宁、隆德地区，占领了静宁县的界石铺。友邻部队先攻克会宁城，我军和友邻部队一起在城外击溃驰援之敌。军团派我和侦察科长刘忠，跟骑兵团进会宁城，去联系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事宜。九日，朱德总司令带着司令部来到会宁。过了几天，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二方面军也相继到达。这样，一、二、四方面军的部队在会宁胜利会师，大家心情很高兴。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海原、打拉池地区扑来，妄图趁我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时，围歼我军。

我军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逐次转移运动之中，寻机歼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我军利用山城堡一带的有利地形，发起了山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跟着二师五团行动。五团团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我们在山沟里钻来钻去（当地所谓山沟并没有多少石头，主要是土沟），到了待机地域。夜晚，战斗开始，五团政委陈雄亲自带领一排人冲入敌阵，炸毁敌人十多个临时堡垒，打垮了敌人，但陈雄政委英勇地牺牲了。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经过一夜激烈战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获得重大胜利，受到中央通令嘉奖。

二十抗大生活

山城堡战斗后，我们由陇东回到陕北。一军团军团部住在安边一个靠沙漠的村子休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大家在酣睡中突然惊醒过来，边穿衣下炕边问发生了什么大事儿。组织部长李子芳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刚才，军团首长接总部来电，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李部长还说，大家赶紧作好出发准备。

一听这个喜讯，大家真是激动不已，欣喜若狂。我们打起火把，边打点行装，边烧水做饭。天刚蒙蒙亮，已吃罢早饭出发了。

红军主力这次急行军南下，是开赴西安一线，准备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对付亲日派何应钦扩大内战的阴谋。

行军中，我们大家想的谈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罪大恶极的蒋介石？有的说：“蒋介石罪恶滔天，必杀无疑！”有人说：“我们当红军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这次不毙他才怪呢！”是呀！我们是被蒋介石逼着起来革命的。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行军、打仗想的做的，不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记得我们红军东征山西前，在临镇、秋林子一带休整时，为了活跃部队生活，朱瑞主任创造了一种名曰“打蒋介石”的体育游戏项目，即用五根三寸长的小木棍，摆成一个方块，中间的一根小木棍代表蒋介石，再用二根一二尺长的木棍，站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打小木棍，先打掉四根四边的小木棍，再打中间的“蒋介石”。这种游戏简单方便，寓意深刻，一时间部队开展得很普遍，连军团首长聂荣臻政委、罗荣桓、罗瑞卿等，都跟大家一起玩“打蒋介石”。我心想，我们搞体育文娱活动，都记着打蒋介石，眼下蒋介石被捉住了，岂能便宜了他！

经过连续几天急行军，大家都非常疲劳了。过了庆阳休息时，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汤平操着浏阳方言很风趣地说：“这回行军，累得嚼茶都嚼不烂啦！”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们赶到西安北面的三原县时，听到已经把蒋介石放了，这又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不少同志尽管想不通，但相信中央避免内战，联合抗日的决策是正确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当时，我们就驻在三原县东里堡村，部队在附近乡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

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告诉我（当时任组织科科长兼巡团主任），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抗大学习。临走前，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也找我谈话，除了勉励我努力学习，还叮嘱：到抗大去学习，不带牲口，不带勤务兵。我连声答，按首长指示办。

能到抗大去学习，我的心情很高兴。抗大，在我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抗大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创办“红大”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大批红军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中央军委于一九三七年春，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其任务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还培养大批来启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过了几天，一军团去抗大学习的同志集合在一起，由一师师长陈赓和二师师长杨得志带队赴延安。所有同志都不带牲口，简单的行装集中起来，由几匹骡马驮着。同行的有李兆炳、萧忠渭（萧锋）、刘忠、梁兴初、李祥、魏洪亮、罗文坊、张震、曾国华、萧望东、陈正相、肖新槐、王克功等五六十位同志。我们从三原出发，傍晚到了中部县（即今黄陵），借老百姓的房子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顺便到黄陵桥山看了看黄帝衣冠冢，又出发到洛川住了一晚上。后来，又到甘泉县的稻草铺住一晚上。当时卫生差，臭虫特别多。刚睡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点上油灯一看，炕沿上爬满了臭虫，得用笤帚扫到地上，用脚踩死。这样一夜间，扫了几回臭虫，实在没有睡多少觉。我们一行了十天，就到了延安“抗大”。

我们一到抗大受到热烈欢迎。

这期抗大，学员的数量和学校的规模都比“红大”有了扩大，学校的组织机构也较为健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当时校长是林彪，刘伯承同志任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傅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长刘亚楼同志，校务部长杨立三同志。这一期抗大仍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大部分，大学部在延安，附属步校在庆阳。大学部共有十四个队，学员一千三百六十多人，其中第一至八队大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先后成立的第九队至第十四队，大都是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

编队前，林彪找我谈话，让我到一队学习。我说，一队都是师以上干部，好些都是我的老首长，我程度低，怕跟不上，还是到别的队学习好些。结果，把我分配到了二队。二队也都是红军的师、团干部。二队的队长是倪志亮同志，支部书记是由学员选的，谢富治担任过红九军的政治部主任，大家就选他为党支部书记。我们同队同学有张震、萧望东、曹广化、王克功、陈正湘、谢振潘（谢振华）、马文波、钱江、彭富九、胡立教、李东朝、李兆炳、余秋里、刘转连、贺庆积等，康克清、贺子珍、蹇先佛、孙湘、廖似光等几位大姐，也是二队的同学。二队共分十二个组，分住两排平房，一至六组住在前排，七至十二组住在后排。分组时，倪志亮同志宣布我担任第一组组长。我们一组的同学有詹才芳，黄罗斌、袁耐冬、韩先楚、吴克华、曾国华、朱仰兴、高士辅等。

到了抗大，我心想，一个穷伢子，没有文化，参军后一直随军打仗，没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现在有了这样集中学习的好条件。一定要多学点东西。但又觉得文化程度太低，基础太差，怕跟不上，心里对学习有点胆怯。

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另外，还有每周一次的会操或军事课。当时专职教员很少，很多课都是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同志讲授。党的建设由朱总司令亲自任教，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由总书记张闻天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均由住队教员罗世文讲授。军事课主要讲工兵知识，由二方面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一个姓张的师长当教员。学习方法，一般都是在领导同志或教员讲课的基础上，进行自学、讨论发言。这种启发式的方法，很适合干部学习。通过系统学习，无论是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

在抗大期间，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二是聆听毛主席讲哲学。

一九三七年四月，抗大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我们首先听了中央政治局抗大会议（“延安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从而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根源及其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紧密联系实际，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揭发、批判、分析张国焘的错误。朱总司令几次带着张国焘到我们二队来，听大家的讨论。张国焘坐在我们的对面，听大家的发言。四方面军的同志以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揭发张国焘的军阀残余，假手肃反、排除异己、乱捕乱杀许多优秀同志，分裂红军、逃跑主义等严重错误和罪行。西路军幸存归来的同志，诉说大批党和红军的骨干和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所断送的悲惨情景时，真是悲愤交集，声泪俱下。张国焘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表情极不自然。通过揭发和批判分析，大家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逃跑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出了重大代价；而且给整个革命事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同志们还以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领导下所遭受的损失，对比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北上抗日，取得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安到陕甘宁根据地的伟大胜利的现实，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中，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领导上一再强调，大家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歧视，不要因为红四方面军出了张国焘，就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好。所以，在我们小组，我们对詹才芳、韩先楚、朱仰兴等同志始终是尊重的。通过学习，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与张国焘划清界线，更

加信赖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全党全军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原第四方面军与原第一、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步调一致，并肩战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教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毛主席多次到抗大讲授哲学。他讲哲学的总题目叫《辩证唯物论》，每周二、四上午来讲课，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毛主席来讲课时，我们都集合在训练部门口的场坪上，专心致志地听讲。他讲的哲学道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有一次，他针对有的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心存疑虑，就讲了个“驴钩子”的例子。他说，陕北老乡让毛驴子上山的办法是前拉后推。毛驴子不走就用驴钩子拉，再不走就在后面推，还不走就用鞭子抽，赶着它走。蒋介石是不愿抗日的，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潮流势不可挡，他不抗战，全国人民就拉着他抗战，再不抗战就推着走，还不抗战就逼着他走。“西安事变”就是逼着他走的例子。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起决定作用。蒋介石不肯合作，就逼着他合作，国共合作是一定能实现的。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不要让他伤着我们，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毛主席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思想，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毛主席讲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但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思想根源。听了毛主席的哲学课，我们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认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而且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对于我们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而物质生活却很艰苦。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粮食也十分紧张，一天吃两顿小米稀饭；稀饭太稀，静止时可当镜子，照见人影。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吃饭照镜子。当时延安街上有两家小饭馆，也只是烙饼之类的，有的同学想去吃，但不敢去，因为我们当时一分钱也没有。即便如此，大家的思想是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充实的。那时，我们抗大同学有个晚饭后散步的好习惯。每当夕阳接近宝塔山头塔影的时候，大家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映照的延水河畔，或研讨切磋、互相鼓励，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抒发为拯救中华而奋斗的革命情怀；处处充满战友的情谊，到处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在抗大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简称西青代表会”）。

党中央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团结各界青年抗日，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此后，全国各地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青年团体，中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西青代表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城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约有三百多名代表。红军青年代表团有二十来人。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指定我为代表团团长，刘西元（抗大俱乐部主任）为副团长。红军代表团住在延安南门外石窑洞内，抗大的代表仍住在抗大，但开会时，我们代表团都是集合整队去的。

大家感到最高兴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会讲了话。毛主席作了关于党的团结抗敌政策的讲演。他指出，中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这些主张而奋斗。他号召西北青年和全国青年，与各界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鼓舞。大会通过了《关于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案》，拟定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和《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确定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为青救会的中心任务；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可以加入青救会。最后，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西青救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次大会，为抗日战争中青年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西青代表会结束后，罗荣桓同志把红军代表团的同志找到位于延安城东南角的红军后方政治部，开了个会，请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讲话。周副主席首先讲青年工作很重要，红军青年工作很重要，在过去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要发扬这个好传统，在抗日高潮到来的新时期，要更好地发挥青年工作的作用。周副主席还讲了青年要爱护身体，锻炼身体，要利用青春年华、黄金时代好好为党工作。周副主席还讲到青年人要正确对待婚恋，要处理好婚恋爱。他讲他跟小超（邓颖超同志）三十岁才结婚。周副主席站着讲了个把小时，我们听得入了神。会后，罗荣桓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在二队学习不到半年，组织上调我到训练部政治教育科工作。这个科刚成立，科长是从一队调来的张际春同志。同时调去的干事有黄志勇、钟仁方、谭政文等同志。这个科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学员队去了解政治教育情况。开展

工作不久，我跟着周子昆同志到八队去检查工作。没过几天，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去了，抗大生活就此结束了。抗大毕业证，是罗瑞卿同志后来寄给我的。

二十一 奔赴抗日前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完成入侵中国腹地的军事部署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之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各部队厉兵秣马，待命开赴抗日前线；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赶赴各部队……

八月中旬的一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处（延安后山一个窑洞），对我说：“全面抗战开始了，部队就要开赴前线，有广泛的青年工作要做。除了部队本身的青年工作，还有统一战线中的青年工作。要联合‘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救会’等青年抗日组织，动员各界青年抗日救国”。他接着说：“准备调你到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当科长”。正谈着话，来了两个同志。弼时同志指着他们说：“这是党校的蒋克诚同志，他们也调到青年科，你们一道做青年工作”。

那时分配干部，干脆利索，说走就走。整个谈话不到三十分钟，我就以一个军礼，一个“是”字，回答了组织上的分配。我们告别了弼时同志，跑回宿舍，以紧急集合的速度打点行装，告别战友，飞奔到宝塔山南边的河滩上，搭乘中央机关开往洛川的车辆。

河滩上停了六、七辆卡车，随行人员大都上了车。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等领导同志已经分别坐在几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周恩来副主席站在一辆红头卡车前说：“又是这辆红头车呀！”经周副主席这么幽默地一说，我想起了我们在抗大就听说的周副主席劳山遇险一事。

五月的一天，周副主席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抗日，带着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和参谋孔石泉等同志，坐着一辆卡车又一次去西安。车辆行驶到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伏兵袭击。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当机立断，指挥警卫战士就地抗击敌人。警卫战士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反击敌人，掩护周副主席转移。我军的救援部队赶到出事地点时，周副主席、张云逸、孔石泉和一位译电员同志已返回三十里堡兵站，警卫人员大都牺牲了。后来，周副主席每当谈及“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的经过时，对于壮烈牺牲的警卫人员，一再表示万分哀痛和深切怀念之情。

边想着这辆红头车的事，我们边爬上了车。周副主席见我们后来的几个都上了车，就进了驾驶室，关上车门，车子开动了。一路上很顺利，当天上午，车子就进了洛川城。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到洛川城东边里把路的冯家村去开会了。我们这几个人住在城东南角的一个单位里等待。我们当时不知道开什么会，但感到那么多高级首长开会，一定是有关抗战大计的重要会议。想到这里，迫切希望早日赶到前方去的焦急心情，也就平静多了。

到了第五天，冯家村的中央会议一结束，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就坐车返回延安去了。来了一位干部通知我们，要我们随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车队上前方。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内心一阵激动。

洛川去云阳的道路凹凸不平，车子只能缓慢地开进。快到中部县时，车子陷在泥坑里动不了啦。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任弼时同志、聂荣臻政委等首长都下了车，和我们一起搬石头填坑。有块大石头，我们这些年轻的谁也搬不动，几个人推着它朝前滚。朱总司令把袖子一持说：“我来！”他竟然将这块大石头稳稳当当地搬过去，扔进坑里。我们都敬佩朱总司令力气大。在搬石头填坑时，我向聂荣臻政委提过“回一军团”的要求，觉得到了军团可以上前线。聂政委对我说，“组织上定了，弼时同志和你谈了，你就去做青年工作吧”。待大家填平坑坑后，朱总司令挥了挥手说：“上车吧！”车子继续行驶在坑坑凹凹的道路上。快到宜君县时，有一段上坡路，突然，一阵泥泞打滑，车上不去，填石头也无济于事。车子陷在那里，总部首长们又一次下来同大家一起推车，但还是上不了坡。停了个把小时，从云阳来了几匹马，首长们骑着马赶赴云阳。司机们留下看车。我和蒋克诚等四人，步行前往云阳。

在途中，碰到了我们军团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他说到延安抗大去学习。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别。他抗大毕业后到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组织部部长。皖南事变中遭敌逮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他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电影《上饶集中营》中的钱部长，就是以李子芳同志为原型塑造的。

从宜君出发走了一个下午，到铜川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住到耀县，第三天就赶到了总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总政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向我介绍了情况，布置了工作。组织科科长王平将青年干事王功贵介绍给我，我和王功贵都笑了，因为我们在四个月前出席西北青年代表会时就相识，他是红军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这下子走到一块儿工作了，各自都会心地笑了。

我们赶到云阳时，红军部队已进行改编。这次改编，是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结束时，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开始实行的。根据改编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一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不久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随营学校。组织部编了组织科，科长是王平，组织干事谢振潘（谢振华）、统计干事谢友法；总务处，处长是邢正卿；青年科，科长是我，干事有王功贵、蒋克诚等三人。

在改编中，最费事的思想工作是让同志们摘掉红星帽徽，换戴“青天白日”帽徽。不要说战士思想不通，我们干部的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打了多少年仗，不就是和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作战吗？我们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了性命啊！现在我们也要戴缀着国民党帽徽的帽子，心里真是别扭。但想到总部领导对我们的教育，想到为了联合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我们终于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坚决而迅速地执行党的决定。

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在改编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保持了。通过改编，我们广大指战员普遍接受了一次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思想上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

二十二定襄扩军

红军胜利完成改编后，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抗日誓师大会，旋即分批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九月六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距西安六十公里的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向关中东进。途径瓦窑头、陶池，涉水过了洛河，于九月十三日到达澄城县。在这里，总部直属队开了一个干部会，二百多人坐在一个场坪上，听任弼时主任讲话。弼时同志传达了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弼时同志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弼时同志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既要搞统一战线，更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弼时同志最后强调指出：洛川会议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它为我党我军确定了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方针，我们要坚定地执行这次会议的精神，去夺取抗战的胜利。听着弼时同志的传达讲话，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眼睛都变得明亮了。九月十四日，我们离开澄城，当天就到了合阳，接着到了韩城县芝川镇。这里是黄河岸边，盛产黄河大鲤鱼。吃着鲜美的鱼餐，更激起我们对祖国河山的酷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盼望早日挺进到敌后，打击侵略者。

九月十五日，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下，由芝川镇坐船渡过黄河，到达山西万荣县荣河镇。

接着，我们经新绛到达曲沃县侯马镇，在这里塔上了北去的小火车。

阎锡山为了盘踞山西，苦心经营，山西修的铁路都是窄轨，外省的火车进不去，而山西的火车却能出去，因为车轮的间距可以自由调节。我们坐的小火车是闷罐车，车厢里没有设施，拉屎撒尿都在车厢连结处，不方便的程度可想而知。

知。

我们这节车厢里，有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还有组织部长黄克诚、民运部长傅钟、军法处长吴溉之、保卫部副部长杨奇清、宣传部副部长黄镇，以及各部的科长、干事，总共几十个人。大家都席地而坐，肩挨着肩，背靠着背，交谈着到前线怎么开展工作等。二十一日，小火车进抵太原车站，邓小平同志下了车，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去了。我们继续北去。小火车以马车似的速度，慢腾腾地前进，真使人着急。又过了两天，我们才到了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

在河边村下车后，我们就背着背包，向东北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八路军总司令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我们总政治部住东茹村。二十五日，总部在这里指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板垣师团一千余人，毁敌汽车二百多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捷报传到总部，首长们很开心，我们更是欣喜若狂，以高昂的斗志，受领分兵发动群众，控制农村，组织人民武装的新任务。

二十六日，组织科长王平根据邓小平副主任传达的北方局的指示，与刘秀峰、李葆华同志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奔赴冀西阜平山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接着，黄克诚部长让我随总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和其他几个干部一起，

组成工作团，到定襄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舒同秘书长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饲养员，我带了一个饲养员，驮着同行人员（民运部的张成台、张广才、林接标、姚国民及总部特务团政治处宣传股长赖伟雄）的行装，从东茹村出发去定襄。

我们走了两天，到了蒋村、神山之间的公路上，同等在那里的推着自行车、穿着长袍的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接上了关系。他当时是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去晋察冀临时省委前），于九月二十二日到定襄执行改组县委的任务。经他介绍，我们又先后认识了张连奎、丰隆德（定襄县委书记）、智生元、张兰英、康瑞华、韩纯德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公开身份是各级牺盟会的领导人。接上关系后，张连奎、丰隆德等同志带着我们奔赴定襄县城。

在途中，我们遇见了从繁峙溃退下来的阎锡山部队。日军于九月二十九日突破内长城铁甲岭隘口，大举南犯，侵占繁峙县城。守城的阎锡山部队狼狈南逃，军纪极坏。沿途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定襄城外，我就亲眼看到他们野兽般地追逐着年轻妇女，有些女人吓得提着裤子逃跑，有的被奸后，含恨自杀。许多百姓的耕牛被牵走，就连鸡窝里的鸡和蛋也尽被掏去。多少人家嚎陶大哭，多少群众骂他们是土匪、强盗。目睹惨状，我感慨万千。勤劳的人民呀，多少年来，他们交粮纳税，为的是富国强兵，过个安稳的日子。如今倒好，鬼子还没到，国民党的军队发起了国难财，成了名副其实的“遭殃军”，搞得民不聊生。为了与这帮白军区别开来，我们戴上“八路军”臂章，把写着“八路”二字的斗笠背在背上，并以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向百姓宣布：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救国救民的队伍。山西一些地方有我党长期工作基础，一是晋北定襄、五台等县，大革命时期就有我党组织，“七七”事变后，党组织通过统战团体“牺盟会”等进行宣传活动和组织武装；二是红军东征在人民中留下良好影响；三是平型关大捷使老百姓受到很大鼓舞，群众对八路军热忱拥护。

我们到了定襄县城后，研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方法，并分了工。舒同、张连奎、张兰英、智生元坐镇定襄县城；林接标和我到蒋村区；张成台、张广才、姚国民、赖伟雄到南王、寿禄等区开展工作。我们在蒋村住在一个大地主的房子里，这里成了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的工作，第一步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新政权。舒同等同志在县城发动群众，赶走了一个姓王的反动的国民党县长，成立了定襄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张连奎担任主任，张兰英负责妇女工作。我们在蒋村发动群众，到区公所提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国民党区长张建安辩论。此人坑害百姓，不抗日，很坏，群众一起来，他就逃跑了。摧毁了旧政权，成立了区动委会。“动委会”，是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这是阎锡山接受我党建议，允许在山西省各地成立的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我们通过合法组织，公开发动群众，号召参军，支援前线，筹粮筹款，局面就很快打开了。在建立新政权的同时，我们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为了扩大武装，我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在横山群众大会上，舒同同志讲话因江西口音太浓，群众听不懂。我当上了“翻译”，百姓称我“王秘书”。我们宣传全民抗日思想，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很多青年积极参军。我们还利用舒同同志的书法特长，吸引青年参加八路军。舒同同志书法很好，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在湖南开过一次晚会，他写了会标：“决战在今朝”。那刚劲

有力，别成一体的大字，轰动了当地的一些知识阶层，名家们都赞扬说：“红军里真有人才呐！”这次扩兵，我们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让他多写字，为八路军露露脸。这一着很管用，不少青年吸引过来了，头一个要求参军的是定襄县南王中学的张际功，他仰慕舒同的才华，又有强烈的抗日愿望。我们就吸收这个有文化的热血青年，后来，他当了舒同的秘书。我们经过形式多样的群众工作，青年中很快掀起了参军热潮，“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口号，逐渐成为群众自觉的要求和行动。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吸收了一千多人参加八路军。又从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程子华主任那里，要来了三百支仿日造的“三八式”步枪，发给新兵团。

十月底，总部通知舒同回五台一趟。舒同叫我到县城去住，同张连奎同志一起负责全县工作。过了五、六天，舒同同志回到定襄，向我传达了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决定总部南下，同时成立晋察冀军区。舒同还说我们尽快交接工作，返回五台。我们即按上级指示，把地方工作交给张连奎同志，扩充的队伍交给了林接标、姚国民、赖伟雄同志。后来，他们带着这支队伍和枪支，编成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六团，归赵尔陆同志领导。这一段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工作，为尔后在晋察冀西部地区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二十三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我和舒同同志在定襄交代完工作，星夜赶回五台县河东村，见到了聂荣臻政委。

聂政委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八路军总部已于十月下旬南下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我们留下的同志以五台山脉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现在要立即着手开展工作。

十一月七日，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同志受命出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同志任参谋长，舒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任命查国桢同志为供给部长，叶青山同志为卫生部长。接着，聂司令员兼政委任命了机关干部，让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当时，军区机关人数很少，司令部仅有作战科科长李延赞、机要科科长黄鹏、通信科科长刘彬、副官处长刘显宜、教育科科长路霞。政治部人数更少，除了舒同主任和我，只有舒主任的秘书张际功、警卫员，和我们两人的两个马夫。我们六个人住在老乡家，吃的是一盆饭菜，睡的是一铺上炕。

军区机关成立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军侵占了太原，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形势更加恶化。军区机关由河东村向五台山转移。聂司令员让我先走一步，到耿镇一一五师野战医院去一趟，找叶青山同志，要几个养好伤的干部。

去耿镇前，我先到离河东村不远的地方，见了一一五师政治部罗荣桓主任。一是老首长要南下了，去送别，听听首长的嘱咐；二是向罗主任要点干部。罗主任对我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并且爽快地答应给我一个干部。当时干部奇缺，调出个把干部也是很不易的。告别罗主任后，我就奔向耿镇。过了两天，罗主任支援给我们的干部来报到了，他就是吴志远同志，后来担任了军区政治部的总务处长。

我到了耿镇松岩口附近的野战医院。这原先是一一五师的野战医院，现在留下来成为晋察冀军区医院。一到医院，就找到了卫生部长叶青山同志，请叶部长帮助从休养员中找几个干部。结果找到了杨克武、黄华清两位同志，

他们都是刚可以出院的同志，我带着他们赶到军区机关。

军区机关一组建，军区首长就运筹创建根据地的大计。聂司令员反复给我们机关的同志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把我们这批人留在敌后，在靠近敌人心脏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聂司令员精辟地分析了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听了聂司令员的谈话，结合学习中央的有关指示，我们对怎么创建根据地，怎么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怎么克服摆在面前的严重困难，都有了明确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勇气，树立了必胜的信心。聂司令员在五台山写下的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共存亡！”道出了我们誓在敌后抗战到底的心声。

我们在沿途住了几天后，聂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首长决定把军区机关放到河北阜平去，便于对各部队实施指挥。阜平，地处正太线北、冀西山区的腹心，距铁路线较远，是个不大的山城，地形条件比较好。八路军刚到山西时，一一五师政治部就住在阜平。平型关战斗刚结束，由王平、刘秀峰和李葆华同志组成的晋察冀临时省委在阜平山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打开了局面，群众条件比较好。十一月十八日，我们随聂司令员来到了阜平县城。从此，这个贫穷落后的冀西小山城，成了晋察冀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从这里发出的号令，推动着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展开。

军区成立不久，相继成立了一、二、三、四四个军分区，但部队人数不足三千。在军区聂司令员的正确指挥下，部队利用敌人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部队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地的创立，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新建单位的成立，都急需人，干部奇缺。那时没有干部部，干部工作、党务工作等都由组织部门承办。我们组织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找干部，尽量满足部队发展的需要。

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政治部调来了锄奸部部长潘自力，政治部才

他部门要晚些，直到

科科长杜文达、青年科

视团主任萧锋；干部科是

由我兼着，配了叶显锐、惠奋、魏部工作。

聂司令员和舒同主任对干部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关心干部的配备和培训工作，以解决干部奇缺问题。军区决定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随营学校）改成一所军政干校，由孙毅同志任校长。这所军政干校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阜平东、西庄开学，学员大都是青年学生，还有部分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聂司令员等军区首长及机关负责同志都去讲过课。军政干校开办三期，共培养了一千多名干部。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军区教导团，下辖三个营九个连，负责把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培养成初级干部。教导团由唐延杰参谋长兼团长，郑维山同志任政委。

除了开办学校培训干部外，军区各部门还举办各种专业训练班，如政治部办了敌工训练班、锄奸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等，培训骨干；各分区开办教导队，训练骨干。参训的同志都以饱满的抗战热情，刻苦学习，努力提高军政水平。这种培训，使大批干部迅速成长起来，走上战斗岗位；军区的干部队伍从小到大，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我们一方面自己培养干部，同时得到中央的有力支援。为发展晋察冀根据地，增强斗争力量，中央向晋察冀输送了大批干部。贺龙、关向应同志曾奉命率领一二〇师主力开赴晋察冀，帮助巩固冀中根据地，并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干部。后来，罗瑞卿同志带领抗大总校经晋察冀到晋东南，也给了一些干部。接着，由抗大总校、陕北公学抽干部组成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从延安迁到晋察冀。二分校的校长是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训练部长徐德操、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副主任张平凯。编制三个大队，共二千五百多人。同时，延安的几所文艺院校，由成仿吾率领，到晋察冀组建了华北联合大学。还有由江一真同志从延安率领来的卫生学校。这几所学校，为军区，也为整个晋察冀根据地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卫生干部。

随着开辟根据地工作和对敌斗争的开展，军区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军区成立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区部队发展到二万多人。为了加强部队新成员、新部队的作风纪律建设，军区在反敌围攻的同时，开始整编部队和进行教育训练。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主持下，召开了军区第一次政工会议。这一次会议，着重研究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强调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区成立了党务委员会，聂荣臻同志、舒同同志和各分区的司令员、政委，都是党务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委员。聂荣臻同志、舒同同志和我担任党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队也相继建立了党务委员会，所有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党务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处理一些违纪党员。在当时那种斗争特别残酷的条件下，发展党员是极为严格的。出身好、政治历史清楚的同志，由一名正式党员介绍，经三个月后补期就可以了。但对担任过伪职连长以上人员，或地主出身的同志入党，需三名正式党员介绍，经军区党务委员会批准，后补期需要一年。这在当时，对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是必要的。同时，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各种传统制度。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各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明显增强，战斗力得到了提高。

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的基础上，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阜平县城隆重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我出席了这次大会。到会的一百四十九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八路军部队的干部、其他抗日军队军官，还有各抗日阶层的人士及晋察冀三省边界四十余个县县政府的代表；有蒙、回、满等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宗教界代表。各方代表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会议于一月十五日圆满结束，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案，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刘奠基、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先、李杰庸九人为委员，并推选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根据地初创阶段的大事。它不仅使各党派、各阶层、各少数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使全边区的政权系统得到了统一，开始制定并实行统一的财政、工农业生产建设等项政策法规，对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八年初，敌人开始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下，企图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战场，夺取徐州，攻占武汉。为配合国民党在徐州地区打击由津浦线南犯之敌，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二月九日夜开始，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敌占城镇出击，以牵制边区周围日军

向徐州战场调集，并趁势发展抗日根据地。敌人遭到打击后，大为震惊。为保护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调集了万余兵力，于三月四日开始进行报复进攻。敌人进攻阜平的一路有骑兵一千多人、步兵五千多人，他们沿途大肆烧杀抢掠。我军一方面连续在曲阳、阜平间的贾口、党城设伏、杀伤敌人；一方面保护军区机关、边区政府等首脑部门，安全转移到五台县台怀地区。军区司令部住金刚库，政治部住大甘河，边区政府住石嘴子，军政干校校部住一个庙里，几个学员队分住在附近一些寺庙里。这时，我去各队讲课（有关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等）上了五台山的寺庙。五台山山势险要，风景秀丽，寺庙规模十分可观。它的主寺，叫宣统寺，寺中有座四十多丈的高塔，另外还有南山寺、玉皇庙、罗候寺及正海寺。军政干校三队就住在正海寺内，这里风景相当好。这些寺庙中的“活佛”，许多是爱国僧侣，但也有一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恶霸”。听三队的同志介绍，正海寺的一个张家活佛，就是一个大恶霸，他有一支土匪武装，配有三百多支步枪、七十多支匣子枪，横行五台山岳，鱼肉百姓。人民群众对他极为仇恨。我们部队到了这里，这个张家活佛逃之夭夭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五台县的金刚库召开了。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根据地地方党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彭真同志。我们听取了彭真同志《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聂荣臻同志《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同时听取了黄敬同志、舒同同志分别作的关于几个月来地方党的工作和部队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些报告，都总结了边区创建几个月内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晋察冀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边区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建党、建军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和方针，对于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二十四协助人民自卫军整训

军区机关成立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司令员和舒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正规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了路西（京汉铁路以西）的王快镇上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建党建政（指政治机关）。军区首长还向我扼要介绍了人民自卫军的情况。

吕正操同志带领的人民自卫军，原先属东北军五十三军的六九一团，官兵大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蒙受屈辱，挥泪告别故乡，退居华北。日军进攻华北后，蒋介石又命令南撤，造成了华北战场的大溃退。南撤途中，我地下党员、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同志毅然决定回师北上。途经蒿城梅花镇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日军七百余人。十月十四日，该团在晋县小樵镇举行誓师大会，在“保卫华北，保卫家乡”的口号声中，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号，吕正操任司令员。接着，人民自卫军同地方党取得联系，并进行了初步整顿，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这支由党领导的武装，成了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骨干。但这支队伍毕竟刚脱离旧军队，在部分成员中存在着军阀主义习气，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有一些问题，也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这支部队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实行人民军队化，学习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为此，经吕正操同志提出，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人民自卫军主力于十二月中旬来到平汉路西整训。

受领帮助人民自卫军整训的任务后，我们就着手作准备。所带的慰问品，是平型关大战的战利品日本饼干、罐头，还有当地土产大枣、核桃及猪肉等，用十三匹骡子驮着。刚诞生的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黄日生、杨晋涛、顾力高、栗茂章、刘如州、袁英鹤、陈守仁等二十几位同志（有的是十几岁的小宣传队员），赶排了一些文艺节目，以便慰问演出。准备停当，我带着一个警卫排（排长程兴广），外加侦察员出身的保卫干事蓝兴、黄西满、张华（张华春）等和剧社宣传队，一行八十余人，人人背着八路军的斗笠，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我们来到了人民自卫军的驻地——王快镇，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等的热情接待。吕司令员向我们介绍了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一团团长赵承金、二团团团长于权申、特种团团长沙克等人民自卫军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他们陪着我们一起慰问团的全体同志吃了一顿饭，给予盛情款待。

我被安排在王快镇上一座宽敞的民房里歇宿。桌上放着许多香烟，大都是名牌货，有英国南洋烟草公司的“红炮台”、“白金龙”，五十支铁盒精装；最次的是国产中上等的“大婴孩”。这些本是吕司令员特意送来招待我的，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我用它招待来客。

我的一举一动引起了自卫军官兵们的注意和议论。一天，一位地下党员对我说：“弟兄们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太多，连烟都不准抽，原以为谣传，这下子见你这个组织部长都不抽，信以为真了。他们有顾虑，担心将来改编过来受约束，吃不消”。

这件事看来极为平常的小事，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长期以来，我军青年战士的确是不许抽烟的。记得一九三四年春季，全军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时，就有不抽烟这项要求。那时，团以下干部，几乎都是青年，上有号召下执行一点折扣也不打，相互监督，养成了不吸烟的好习惯。长征途中，打下贵州桐梓城，缴获白金龙香烟堆积如山，抽烟可以随便拿，但除了几个

年纪大的干部带了一些外，大部不感兴趣。就在原地分给老百姓了。改编为八路军后，我军青年仍然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相互监督，一般不抽烟。所以，我一直不会抽烟。眼下，为了打消一些官兵的顾虑，增强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我立即学着抽起烟来。刚吸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我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强忍着吸进去，吹出来，来人越多，我抽得越凶。这样，人来人往，你递给我一支烟，我给你点个火，烟一冒，话就来，近乎了，方便了。聊天之际，我向他们宣传说：“抽烟劳命伤财，在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戒烟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他们不必要的顾虑，大家同我一下子亲近了。

整训工作开始后，吕正操、孙志远同志首先向我介绍了人民自卫军的党员情况。这支队伍有六、七个党员。除了吕司令员和孙志远主任外，还有特种团团长沙克（原名沙星澜）、一团政治处主任许涛、二团政治处主任戈亚民、特务营营长胡乃超等同志。随后，我以晋察冀军区党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帮助他们建立了人民自卫军党务委员会和各团党总支委员会，公开发展党员工作。接着，又进一步健全了政治机关，配备了政工干部，并明确了军政干部的分工和各自的职责。

健全组织机构之后，就展开了紧张的训练工作。课堂上，吕司令员讲军事，讲游击战，讲部队管理。我则按照吕司令员出的题目，重点讲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讲红军的光荣传统，连队政治工作等。这样一天政治课，一天军事课，军政结合，边讲课边讨论，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除了授课训练外，还组织营团干部到军政干校和军区直属队参观见学，从中学习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整训期间，我们还开了联欢会，抗敌剧社的宣传队员在台上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节目，台下东北籍的官兵纷纷落泪，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强烈愤慨，激发了抗战热情。

经过整训学习，人民自卫军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建立起来了，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部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军阀主义习气有所克服，内部的团结增强了。大家初步懂得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以及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等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吕司令员、孙志远主任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军区的政工会议，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冀中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工作任务，提高了政策水平。一九三八年一月，人民抗日自卫军在路西整训胜利结束，立即返回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冀中的抗日斗争出现了高潮。

慰问团返回阜平城后，我向聂司令员汇报了整训情况。聂司令员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我们政治部的青年同志却批评我说：“你这个部长呀！怎么抽起烟来了？”我既不作详细解释，又不能给他们的工作泼冷水，当即答应说：“我改，我戒！”

我在机关确实不吸烟了，但一时无法彻底戒掉。一个多月后，新的任务又来了。河北张仲翰同志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叫河北民军，两千多人，主要成员是青年学生，穿灰色服装。这支队伍向我八路军积极靠拢。当队伍驻扎在阜平东边二十里外的东庄时，张仲翰亲自到阜平见了聂司令员，请求派人帮助整训。聂司令员就派我和晋察冀区党委的张达同志一块去。我们去后，见到了民军的副司令员张文奎和政治部主任边冠三同志。他们对我们很客气，招待很周到，我呢，无拘无束，递烟就抽，非常融洽。副司令员张文奎

爱交朋友，跟我们处得很好。他在我引荐下，去三里路外的西庄，会见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孙毅同志。对河北民军，我们也帮助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进行了统一战线政策、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作风和游击战术等教育，使之向人民军队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后来，军区又把他们放到实战中去锻炼。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日寇进攻阜平时，聂司令员指示河北民军在阜平和王快镇之间的五凤岭阻击进攻之敌。打了几仗后，战斗力明显提高了。后来，这支队伍编入贺龙师长领导的一二 师三五九旅的一个团。

由于不断执行这种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的任务，还要经常接触地方各界人士，使我的抽烟由假成真，甚至成了习惯；直到年过花甲，这种嗜好才彻底戒掉。

二十五病中深情

处在华北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从创建之时起就被日寇视为心腹大患。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春，敌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围攻。遭到失败后又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实行全面围攻。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区党委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和保卫家乡的号召，动员边区军民做好充分准备，采取正确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围攻。反围攻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毙伤日军五千余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我军各部队和地方群众武装，都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和建设，晋察冀边区已经成为华北敌后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敌后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四位同志为委员，彭真任书记。紧接着，在平山县蛟潭庄藏云沟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我参加了这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听取了彭真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聂荣臻同志关于《十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总结》的报告。会议中间，我病了，发起高烧，只得中途离开会场，被抬了一里多路，回到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李家岸，吃药治病。其实，我去参加会议前已经发烧了，卫生部长叶青山给我看过病，诊断是“肠胃感冒”，给服了药；想不到开着会又发作了。

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一结束，聂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就带着我和司令部、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去一分区检查、布置工作。我们走了好几个县，到了一分区所在地易县。一分区司令部住在楼山，我和聂司令员住在离楼山不远的岭东村。

这时，聂司令员对我亲切地说：“宗槐，我看你脸色不好，精神也不好，大概是你的病没有全好，你快休息治病吧！”接着他又说：“你到后方治病去吧！我这儿还有几盒‘维他司保命’，你把它带上，医生知道怎么用。”聂司令员边说边从铁皮箱中取出七盒针药，递到我的手中。尽管我当时很激动，但已经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

警卫员把我扶上马背，送到了完县神南镇骑兵团的卫生队。卫生队队长邓启修、医生范伯儒一测体温，我高烧四十一度，我已经迷迷糊糊的了。他们怕出意外，把我压在枕头下的手枪取走了。我清醒过来后，看到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亲自为我打针。他打得痛，我就劝他让医生打，他跟我开玩笑说：“好啊！当组织部长了，嫌疼了，长征路上，你那次病倒了，要不是我那针下去，你能追上队伍？！”与此同时，卫生部的游胜华副部长、林金亮医务主任也都多次来看望我。他们还请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顾正均带着医术高明的殷希澎、陈其援大夫给我会诊。

经过一段紧张的治疗，我的病情开始减轻了。这时，叶青山部长才对我说：“实话对你说了吧，你这次患的是重症伤寒，一度高烧昏迷不醒，很危险。聂司令员有指示，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救活。他还叫骑兵团派人去北平，通过北平地下党买来一些药，你用的‘虎白龙’就是刚买来的。用了这种药，你的高烧才退下来。”叶部长接着告诉我：“司令员还吩咐说：倘若你过不来，就把遗体拉到阜平城南庄入殓；要是活了，就借养病这机会，在我的部属中，给你介绍个对象。聂司令员说你不小了，该帮你解决婚姻问题了。”叶部长还对我说：“聂司令员还特地给你捎来几个高丽苹果呢。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也给你送来了凤尾鱼和一套服装。”

听了这些话，我热泪盈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场大病，使我的头发都脱光了，一度成了秃子，终日戴着帽子。我的身体受到了生与死的考验，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锤炼和升华。首长的关怀，组织的温暖，战友的深情，都注入了我的心灵，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病情稳定后，我从骑兵团卫生队转到神北村卫生部医院，治疗休养了几个月。这期间，我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疾病反反复复，有几个月鼻子天天流血，非用止血药不可。由于体虚，医生和领导都不让我参与什么工作。但有两件事，我参加了。一是参加了军区政治部在唐县上围子召开的政工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开展政治整军问题，舒同主任讲了话。会议确定在全区部队开展政治整军，建立健全党的各种生活制度、会议制度，开展争当模范党员、模范干部活动。会议当中，我还参与了抗大二分校一批学员的分配工作。这些学员有二百来人，要分到各个分区去工作。但有的同志只愿意到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而不愿到条件艰苦的分区。我和政治部的其他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份参加了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军区在唐县军城南关召开了纪念大会，贺龙、关向应、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和聂司令员等，出席了大会，和军民一起共庆军区成立两年来的胜利。一九三九年底，我基本恢复了健康，带着首长和医务人员的一片深情返回战斗岗位。

二十六百团六战前后

我治好了病回到军区组织部不久，就参加了一九四〇年七月中旬在唐县娘子神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各军分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军区机关的部长们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们听取了彭真同志作的《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聂荣臻同志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朱良才同志作的《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几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军区三年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部队、开展军事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方针。这次会议，还根据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号召，结合军区部队的实际，提出了“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要求与计划，动员开展革命竞赛。这次会议对提高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部队建设，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有着重要作用。

娘子神高干会议刚结束，我们就投入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击战，即后来所称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始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是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由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齐动手进行的。

根据总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平定段，以娘子关到井陘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为重点；同时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军区调集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及其他分队，组成三路纵队，开展广泛的攻坚战。

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聂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带着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赶到前线。“前指”设在井陘附近叫洪河漕的小山村里。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留守后方，让我带着宣传部的干事刘秉真、巡视员王思众、记者、诗人田间和敌工部的几个同志，组成野战政治部，随聂司令员的“前指”行动。我们在“前指”起草签发了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电报，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必须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切实保证战前一切准备工作（如筹划粮食、预备各种器材）按时完成；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不许泄露战役意图；在集结前的行军中，应确定军政工作计划，做好卫生防病工作，保证部队不生病、不掉队，保持战斗情绪；到达集结地点后，立即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提出有力的政治口号，如“实行打胜仗比赛”、“夺取敌人据点”、“彻底破坏交通”、“争取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优胜”，并告诉每个战士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各作战部队要随时研究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特别要做好新战士的思想教育；要加强后方勤务部门（供给、卫生、兵站等）的政治工作领导，以保证前后方密切配合；各级政治部门要密切同地方的联系，适时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战，保证人力满足战役需要；正确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以团结广大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等；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积极认真地进行深入有力的战前动员和战斗准备，在接敌、进攻、冲锋等阶段，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工作，鼓舞部队的政治情绪，有力地保障每个战斗的胜利进行，等等。

这次战役，从八月二十日夜间全线出击正太路开始，至九月十日，为战役第一阶段。这二十天的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作战，从八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七日，主要作战地点在正太路东段，作战成果为攻克了正太路上许多重要据点，包括贾庄（井陘煤矿所在地）、蔡庄、乏驴岭、南峪、北峪、地都

车站、娘子关、磨河滩等，摧毁了敌人控制的铁路、车站、桥梁，歼灭了各据点的大部分守敌，彻底破坏了井陘煤矿，敌寇损失在三千万元以上。第一期作战后，部队作了休整和转移。从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开展了第二期作战。这次作战，主要是巩固正太路上所获得的胜利，扩大战果，出击位于军区西南部之敌，摧毁敌之据点，连续攻克会里、上社、下社、宏道关等重要据点，包围了孟县城，大量破坏孟县周围之公路。

在这两期作战中，我们野战政治部的同志，分头到战斗部队，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参加战斗。八月二十日总攻发起前，我奉聂司令员的命令，赶到十六团，帮助他们开展山地攻坚战。十六团一直战斗在冀中平原，有丰富的平原作战经验。这次到正大路西执行作战任务，存在着不熟悉地形，缺乏山地作战经验等实际问题。我带着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赶到十六团时，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团长盛治华、政委邓东哲、政治处主任赵君一等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十六团的作战地点在娘子关以东、正太路以北的乏驴岭一线，这里都是山地，山上布满了敌人的据点。十六团的兵力形成了对敌据点的包围。八月二十日夜晚十时，十六团按时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摧毁了敌在乏驴岭的各个据点，掩护其他部队破击正太路交通。

十六团完成作战任务后，撤到平山古月村待命。聂司令员令我再去这个团，对他们撤回冀中表示欢送。我对部队讲了一番鼓励的话，肯定他们乏驴岭战斗打得好，伤亡小，取得了山地战的经验，欢送他们回冀中迎接新的战斗。部队情绪很高涨。送走了十六团，我转到二分区。这时，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已进入第二期作战。二分区的部队打下了上社、下社，取得了胜利。之后，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带领部队回到平山县蛟潭庄司令部。赵尔陆同志兴奋地端着日本三八枪，穿着呢子大衣，照了一个相。他还请我吃了咖喱鸡。开始，我不明白咖喱鸡是什么菜，后来才晓得是缴获的一种黄色的咖喱粉烹调的鸡。我从蛟潭庄回到了唐县和家庄军区司令部，汇报了情况。随即回到了曲阳县武家湾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虽属两个县，但相距只有几里地。

回到政治部后，我们野战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讨论研究了一个政治工作总结。我在《抗敌月刊》上写了《百团大战中正太战役的政治工作》一文，谈了这次战役的政治工作体会。

第一阶段的作战结束之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接着，发起了战役的第二阶段——涞（源）灵（丘）战役，摧毁敌人的许多重要据点。军区首长让我到雁北地区第五军分区。我翻山越岭赶到广灵县，见到了邓华、李天焕、易耀彩等分区领导同志；赶上二团打了个胜仗。涞灵战役打掉了敌人一些据点，歼灭日伪军一千多名。我军一个多月接连不断的破击战，引起了华北敌人的极度震惊和恐慌。敌人为挽救局势，急忙调集兵力，在晋东南、平西、北岳和冀中等地，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这次“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便构成了战役的第三阶段。这时，我从五分区回到军区汇报情况，聂司令员对我说：三分区政委王平同志生病了，躺在担架上；你赶到三分区去，协助司令员黄永胜工作。我从娘子神翻山过去，走了一夜，到了唐县米城，参加了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主要是在完县的大山中和敌人打转转。在这次反“扫荡”中，游击军司令部受到敌人袭击，司令员王薄被打死。军区命令三分区参谋长唐子安同志帮助整顿游击军，后兼任游击军司令员。王平同志病愈后，我又回到了军区政治部。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多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

此后不久，日寇将屠杀我东北同胞的刽子手——冈村宁次派到华北，任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到华北，就调集七万余日伪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他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敌人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阴谋聚歼我军区领导机关。军区机关、边区政府及直属单位在聂司令员率领下，在敌人包围的缝隙中穿插转移。后来，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军区首长决定，除边区、军区首脑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直属单位人员分散多路行动，这样比较轻便灵活。军区机关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时，也是分成几股行动的。聂司令员和分局的领导带着精干的指挥机关，在一分区一团的掩护下转移。朱良才主任随聂司令员行动，让我和吴志远同志带政治部的部分同志转移；一个警卫连跟着我们行动。我们采取摸清情况，避开敌人，穿插迂回，确保安全的方法，在山沟里转来转去，见机向安全地带转移。我们由龙泉关南出到达灵寿县漫山，再向西进入大山。在一次夜行军时，我们组织部统计科科长舒仁同志失足跌到山下，牺牲了。他是河北大城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他的牺牲，我很悲痛。再往西走了一段，就到了滹沱河边上，我们穿插在李家沟和平山卸甲河之间的大山中。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旷伏兆、周彪、帅荣、吴西、马泽迎等几位冀中军区的分区干部。他们是奉调到延安去学习的，碰上敌人扫荡，过不了封锁线。他们原打算随二分区机关行动的，但未如愿，就转移到卸甲河的山上来了。旷伏兆等几位同志对我说：王部长，我们在一起行动吧。我说：可以，要死咱们一块死。我们在山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隐蔽了几天。转移到了李家沟后，聂司令员、军区机关来了。这次反“扫荡”斗争结束后，旷伏兆等几位同志按照他们的计划单独行动了。

这时，聂司令员同我说，一团掩护军区行动时，团的干部有不团结现象，要我找他们谈谈，解决问题，搞好团结。我照聂司令员的指示，把一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两天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促进了团结。

从解决一团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我想到百团大战和这次反“扫荡”中，部队都暴露出一些不团结现象，这些问题对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妨碍很大，应很好解决。为此，我为《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写了一篇题为《巩固部队的团结成为当前政治工作上一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主要宣传：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团结的本身就是力量的表现，反之不团结，就等如一盘散沙，亦就无法抵挡敌人的攻击，易受敌人各个击破。为了巩固部队的团结，要在部队内部、党内外干部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和如何巩固团结；要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检讨的精神，虚心检查与纠正自己的缺点，接受别人的意见，学习他人的优良作风；要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坚决反对军阀主义、本位主义、损人利己、骄傲自大、轻视同志和友军等有碍团结的坏风气；政治机关及党员负责干部，要经常督促检查，对巩固团结负起责任；在部队中建立密切关系、增强团结的制度，无论在工作中、战斗中都注意巩固部队的团结。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全面，只是针对当时部队团结方面的一些问题而发表的个人看法，其目的是对增进团结有所裨益。

这次大规模的秋季反“扫荡”过后，军区机关从李家沟回到平山县陈家村。一天，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立即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项目不多，只要写上姓名、部别、职务这三项就行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使我们忙活了一阵子。

那时，我们组织部编有五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团，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科长缺位，一直由我兼任。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还不熟悉。更难办的是我们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老花名册也没有。这种状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一九三八年秋季，晋察冀军区进行第一次反“扫荡”时，我们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田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挖了去，暴露了我们一些实力。此事报告了聂司令员后，聂司令员指示：“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结束，打完仗后再填表、整理”。后来几次反扫荡时，对文件的处理我们都是这么办的。这次秋季反“扫荡”后，填表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八路军总部就催着要花名册了。若制表发下去填、再汇拢上来，显然等不得。我手拿电报，自言自语他说：“这是一场考试呀！”

我把两名干部干事叫到我的房间，对他俩说：“我来写，你们誊清，考考看，能得多少分”。

我拿出笔来，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以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一一列出了名单，然后，又把第一至第五军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我在前边“开路”，他俩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仅用了约五个小时，一份营以上干部花名册造成了。合计总数近两千人（因分散，萧克同志领导的平西挺进军和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算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同志等，都表扬我“记忆力好”，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许多同志问我，为什么对干部情况这样熟悉？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奥妙，是军区首长教诲和严格要求下，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聂司令员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他总爱问：“哪儿人呀？哪年参加革命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等等。我知道他爱问，起初身边总有个小本本，尽记这些情况。有一回，我现翻现答，忙作一团，他呢，平静的目光望着我，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悦，随后轻声慢语他说：“基本情况尽量记在脑子里”。

这平平常常的小事，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语，使我找到了工作上的差距。之后，我就在熟悉干部上下功夫。

干部开会，我尽量参加，尤其是学习讨论会。从他们的发言，可知籍贯、性格；他们的音容笑貌，可以帮我加深记忆；就连他们的就坐顺序也可引起我事后的回忆。偶尔把某人名字忘了，同志们就会提醒我：“呶，就是坐在墙角的那个……”

多跟干部交谈，这是熟悉和了解干部的有效方法。经常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个单位转上半月一月，回到机关呆上三五天，搞搞总结、汇报之类的事，再下到部队去，找干部谈心，那时干部谈心，都是以诚相待，推心置腹，有什么想法看法意见都愿意谈，从中可以了解各种情况。了解干部情况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填表（那时不可能建立完整的档案），掌握基本情况。这当然

不如直接见面了解得深入，但也是一条途径。搞干部工作，就是搞五湖四海，不管是兄弟部队调来的老同志，还是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冲破敌人封锁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分配工作之前，我大都跟他们谈过话，了解他们的家庭、爱好、个人经历、特长、对分配工作有什么要求等。每次谈完话，自己总要闭目回想一下他们谈的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对干部的使用，强调公道正派。不管哪个方面军，哪个根据地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一视同仁，择贤任用。同时，注意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团结，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们组织部比较老一点的同志，过去都没有念多少书，而后来补充进来的新干部，大都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但大家相互尊重处得很好，在一起愿意说心里话，关系融洽、和谐，工作起来积极性很高。干部问题中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心爱护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肃批评所犯的 error，处理和分配工作时又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使干部心悦诚服，轻装前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对有的干部的处理，也受了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响。当时曾怀疑几个干部有叛变行为，对有的干部处分太重。这几件事，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批判和处理，但作为组织部长是有责任的，后来汲取了教训，更注意正确掌握党的干部政策。

军区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军区军政学校和抗大二分校的毕业生。毕业分配来的，大都是连、营级干部。有的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来的，如魏巍、姚远方、徐逸人、张迺更等，都是延安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了熟悉二分校

的学员，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才能分配工作，我经常去二分校了解情况。我也常去军区军政学校，给学员们上课，讲怎样做支部工作，怎样把青年工作搞活等。跟这些学员熟悉了，对他们的使用、调配就心中有数了。

因为我在工作中作了些努力，受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好评。一九四四年，在河北省曲阳县武家湾，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会评选先进个人，舒同主任宣布评选结果，我被评为“模范干部”、“模范党员”。这对我既是鼓励，更是鞭策。

二十七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一九四一年底，晋察冀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

我军“百团大战”的胜利，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为使华北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方针，而集中64%的日军和90%的伪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进攻。从此，敌后战场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

华北日军首先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号称“百万大战”的空前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继而进行“蚕食”、“封锁”，发动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力量的“总力战”，对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疯狂摧残。这使我根据地军民的斗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就在这时，我从军区组织部调到了第三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从一九四一年冬天王平同志生病、我到三分区帮助工作之后，王平政委就向聂司令员和朱良才主任提过，要我到三分区去工作。我也曾向军区首长要求到过战斗部队去工作。这次军区首长终于答应了。

当时，三分区的几位领导干部是：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副司令员詹才芳，参谋长唐子安。分区部队有二团、四十二团、骑兵团和六区队、七区队（相当于团）。我们政治部共有五十多人，组织科科长萧平，宣传科科长余毅、锄奸科科长方国、敌工科科长王文、副科长穆振武、干教科科长王龙文、总务科科长殷化戈；直属队总支书记陈一鸣，冲锋剧社有陈龙、孙福田等几十位同志。

三分区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望都、定县等地。在敌人的多次扫荡、蚕食下，除了阜平县，其他县城都被日军和伪军占领了，不少村庄也都成了游击区。天上，有敌人的飞机盘旋；地上，碉堡林立，铁丝网纵横交错，封锁沟交织成网；敌人妄图将我们困死、拖垮。我们只能活动在乡村山野，有时只能在山头上风餐露宿。这一带本来就穷，敌人一搞封锁、分割，我们军民经常吃不上饭，靠挖野菜充饥。日子真难熬呀！在敌占区，我们白天不行动，只能夜间出击。我们的作息时间表正好与敌人相颠倒，太阳落山，我们出动，平封锁沟，破交通线，寻机袭击敌人。

那个时期，中央确定的总方针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目前一年内，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咬紧牙关，度过困难。这期间，我们遵照八路军政治部和军区政治部的指示，把猛烈地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作为斗争的重点。对敌政治攻势，由分区政治部具体组织实施。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挑选了一批机智、勇敢、富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战士，外加政治部的一些同志，组成精悍的武装宣传队，既能开展宣传攻势，又能同小股敌人作战。正在这时，根据军区政治部的统一安排，华北联大的沙可夫、岳慎、崔鬼等同志带着十余名师生，从唐河北岸的南洪城、北洪城赶来报到了；分区冲锋剧社的陈龙社长和孙福田指导员，也带着十多名主要演员前来参战并体验生活。他们也编入了武装宣传队。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宝贝疙瘩”。把他们放到敌后去，面对面地向敌人哨兵喊话，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他们本着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争先恐后地要求上阵。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安全。政委王平、参谋长唐子安

等领导同志，多次与我研究安全保护措施，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武装宣传队组织起来后，认真学习了上级有关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研究了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并作了其他准备工作。我们派长期在敌后工作的敌工科副科长穆振武带领武工队，干掉敌人据点周围的汉奸，挖掉敌人的耳目，并动员沿途群众杀狗，以便队伍悄然近敌。动员河北老百姓杀狗可不容易。他们认为狗可看家，打死作孽，不忍心下手。但为了配合打鬼子，他们都忍心请武工队同志帮助打。狗被打死后，主人不但不要狗肉、狗皮，还花钱买两条纸烟酬谢。烟

不收是不行的，因为主人深信，这样做就把打狗的“罪过”送出去了。

就在穆副科长领着武工队从事近敌准备工作的同时，沙可夫、岳慎等同志印好了宣传品，缝制了许多慰问袋。慰问袋里装有大红枣、核桃、花生、柿饼、瓜子等土特产品和宣传品。宣传品上不带刺激性太强的口号，只是写上：“在日本人民欢度樱花节的时候，中国人民表示慰问”，并写明：“家乡亲人正在盼望你们早日结束战争，合家团聚”等，以激发日本士兵的望乡厌战情绪。大量的宣传对象是伪军，宣传内容与对日士兵宣传有别，对他们主要说明爱国的道理……

一切准备就绪，武装宣传队就出发了。沙可夫头上扎条羊肚巾，装束挺像中年农民；就是那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子摘不下来，没办法，我们只得嘱咐武工队员多加留意保护，防患于未然。我们把武装宣传队编成十来个小组，每个小组围着一个据点，用土制的喊话筒向碉堡里的敌伪人员宣传目前的形势，宣传日本国内的萧条景象，宣传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最后，给他们唱支《樱花歌》，把慰问袋放在明显的地方，告诉他们自己去取。我们的队伍则连夜撤回，这便于“两面政权”的村长、乡长把宣传慰问信送进据点去。

这样的政治攻势，连续进行了好幾次，收到了好的效果，敌伪军和伪组织人员的思想有起变化的，有些人不愿与八路军作对了。我们进一步在宣传中向他们提出要求：八路军队伍从碉堡下通过不要开枪，不得妨碍我们的行动等。政治攻势果然起了作用，不少据点的敌人在电话被我切断的前提下，遇到我们路过，就乖乖地躲在碉堡里不出来。有些伪军还趁鬼子不备给我们送信呢。这对我们开展斗争无疑是有利的。

在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我们还组织小部队深入敌后，带领民兵和群众破坏敌人的分割封锁，打击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和“蚕食”进攻。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我们趁敌在完县城外增建据点、城内防务空虚之机，组织七区队袭击了完县城。我和区队长成少甫、政委曾海亭带领部队，于黄昏出击，晚十时许攻进了完县城北门。毙伤日伪军二十多人，俘虏伪军、伪组织人员四十多人，缴获步枪几十支，并烧毁了敌人的油库。拂晓，我们撤出战斗，返回驻地。这样，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起到了瓦解分化敌人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抢运粮食的斗争。三分区所在的地区，粮食非常缺乏，军民吃粮十分困难。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接济老百姓，经常靠吃黑豆、麦麸充饥。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组织军民从冀中运粮。但是，敌人在铁路两旁挖了深沟，其他路面也挖了许多封锁沟。这种封锁沟都有二、三公尺深，三、四公尺宽，手推车根本不能通过，就是单人爬越也很费劲；而且敌人的巡逻车、探照灯不断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经常派小部队到敌后袭扰敌人，掩护群众背运粮食。解决了缺粮问题，为军民坚持斗争，度过难

关，创

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根据地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即各地区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一元化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全面展开对敌斗争，粉碎敌人的“总力战”，克服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巩固和恢复根据地。

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我离开了三分区，调到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

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邓华同志，他还兼任地委书记。易耀彩同志任参谋长，王紫峰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叶长庚同志任武装部长。后来，郑维山同志任副司令员兼教导团团长。四分区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包括平山、正定、灵寿、行唐、新乐、井陘、获鹿等地区。分区所属部队是五团、三十四团和八区队、九区队。

当时的斗争，主要是反“蚕食”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的“扫荡”、“封锁”、“蚕食”，特别是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对根据地的威胁极大，把我们逼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组织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开始对付敌人“蚕食”的办法是：“敌进我顶”。每大部派小部队、民兵打击敌人，拆毁堡垒，破坏封锁沟。可是，我们毁了，敌人又抓夫修起来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一九四二年九月，聂司令员在平山县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对敌斗争方针，使反“蚕食”的斗争由“敌进我顶”、单一的正面斗争，发展为“敌进我进”、到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结合。根据军区确定的这一方针，我们分区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小分队，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封锁墙”，深入到敌人后面，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袭扰敌人，捕捉汉奸，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教育团结人民群众。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扭转困难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起了重要作用。

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和英勇的战士，团长罗化明同志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一九四三年春，敌寇向我四分区“蚕食”、“扫荡”，大肆掠夺人力、物资，企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罗化明团长奉命率领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亲临前线，与敌搏斗。五月九日晚上，他带领侦察员去侦察地形时，不幸光荣牺牲。罗化明同志是江西省吉安人，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经过十三年的战争考验，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优秀的团级指挥员，为保卫根据地，粉碎日寇的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罗化明同志牺牲后，我们分区领导都很悲痛，号召部队学习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勇敢杀敌的模范精神，为罗化明同志报仇，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抗战的胜利。

四分区所辖地区，都在滹沱河边上。这里盛产粮食，是比较富饶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乌克兰”之称。一九四三年五月麦收季节，遍地都是黄灿灿的麦子，眼看是个好收成。为了对付敌人抢粮食，分区组织军民展开了保卫麦收的斗争。

当时，我们分区司令部在平山县寨北西北面的滚龙沟。部署了保卫麦收斗争后，分区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头下去，领导军民保卫麦收。邓华司令员、易耀彩参谋长到平山县的南庄、北庄、黄泥、郭苏、西柏坡一带，这里主要

由三十四团对

付敌人。我先赶到灵寿县，和八区队的队长彭龙飞、政委邓可运，商量了对付敌人抢粮的方案。尔后又赶到平山县的南甸地区，和活动于这个地区的五团的同志（团长王耀南、政委萧锋）研究对策。敌人从南北古贤、东西会社等据点出来，经慈峪、叉头，向灵寿、南甸地区扑来。我们五团、八区队的部队避其锋芒，主动撤到李山北沟。待敌人一分散，我们立即出击，一阵猛打，打退了敌人。老百姓在部队的守护和帮助下，用了三天多时间，就把全部麦子收到了家。收成很好，百姓喜上眉梢。

我在四分区工作了一年，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参加边区参议会。这次边区参议会，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阜平温塘召开的。参议员来自边区各地，二百八十多名参议员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部队代表等各界人士。邓华同志和我是四分区选举的部队参议员。边区参议会开了七天。聂荣臻、宋助文、刘澜涛同志分别作了报告。大家就施政纲领、大政方针等广泛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接着，选举成仿吾为参议会议长，于力教授为副议长；宋 劭文为边区政府主席，胡仁奎为副主席。这次参议会的召开，表明晋察冀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巩固和恢复，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十八出席党的“七大”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第四军分区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通知我调任第一军分区副政委。到职途中，经过大台，来到军区卫生部，见到江一真部长和姜齐贤政委，互相交谈了工作情况。晚上，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来电话，告诉我有要事，明天赶回军区政治部。

第二天，我就急匆匆来到陈南庄花山沟军区政治部。吕正操同志也在这里，正兴致勃勃地面朝大地跟人玩“顶牛”牌呢。朱良才主任见我回来了，立即对我说：“七大”要开了，你跟聂司令员一块去，两天后上路，快作准备吧，但一定要严格保密。

党的“七大”，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筹备了。晋察冀根据地选举“七大”代表，是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初的事。那时，我在军区组织部工作，是军区党务委员会常委，分到第三军分区选为“七大”代表的。代表去延安是分批走的。舒同、袁升平、陈泊钧等同志早在一九四一年就走了；后来，又去了一批。这次随聂司令员去的，已经是第三批了。

要说准备，倒也简单，全部家当都在马背上，学习材料，揣在口袋里。朱主任让供给部的同志发给我三十元中国银行发行的法币，作零花钱，还给我赶制了一套新军装，草绿色的，大反领上衣，大宽腿马裤，既合身，又精神。后来，我在延安杨家岭礼堂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还称赞说：晋察冀的军装好啊，样子好，颜色也好。

在做准备的两天里，组织部长李志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刚从一分区副政委的岗位上调到组织部的。我们畅谈了工作学习等情况。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路了。从阜平到延安，要经过好几个县的沦陷区，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以东需要武装护送。刚好，军委决定将晋察冀的17团、22团、26团调归晋绥军区。我们趁他们归编之机一同西行。蔡长元同志率领的晋察冀青年支队、曾美同志率领的河北（滹沱河北岸）区队，也奉命担任了护送任务。聂司令员一行在吕正操同志率领的17团、22团护送下行动。我和王凤斋、王兆汉、刘杰、刘慎之、郑天翔、黄庆熙、张逢时等七位地方干部，跟随26团行动。团长彭龙飞和政委孙鸿志很有作战经验，有他们护送，我们是很放心的。

当时，敌情很严重，连我们原先的老根据地五台县城都被鬼子占领了。我们大都是夜间赶路，尽量走山野小道。我们经过了五台、崞县、代县、宁武，在宁武县城以北越过同蒲铁路，翻过摩天岭等几座大山，终于冲出了鬼子的封锁线，来到了崞县。这里是一二师的根据地，安全了。完成了护送任务的河北区队和青年支队回到了河北根据地。其余

三个团留驻崞县、兴县一带，编归一二师建制。我们赴延安人员在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个晚上。接着，跟随聂司令员、张瑞华大姐、吕正操同志等从崞县出发，继续往西前进。渡过黄河，经佳县、米脂、清涧、绥德，到了延安。先后跋涉了近两个月。

到了延安后，聂司令员住到杨家岭，我们进入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的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彭真同志，教育长是张秀山同志，秘书长是黄火青同志。

这时，从各根据地汇集到延安的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党校共编了六个部。在一部学习的都是地委和师职以上干部，包括区党委的书记同志；二是县团职干部；其他几个部，有的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有的主要是西

北局干部。每个部下面又编若干个支部。

我编在党校一部学习。一部主任是顾大椿，组教科长栗再温，负责总务工作的是牟作云。一部编了九个支部，每个支部有六七十人。我在一部第三支部。支部领导都是学员兼任的。第三支部的支书是陈奇涵同志，副支书戴季英同志，学习委员罗瑞卿同志，生活委员邵式平、曹里怀同志。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两年，这几位同志连选连任。三支部下面又分了四个小组。我们四组的同志有陈锡联、余洪远、王盛荣、帅孟奇、李培之（王若飞同志夫人）、刘英勇、刘澜波、廖华、李伯钊、章衣伯、王凯、张庆孚、何柱成、刘景范，大家推选我担任组长。其他组的同志有邓颖超大姐、宋时轮、谭友林、孔原、徐琛吉、郭洪涛、陈赓、钱瑛、聂鹤亭、李国华等七十多位同志。

我们进入党校以后，就参加了整风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等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参加时，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刚到党校，第一件事，就是参加甄别工作。原来，在我们进入党校之前，中央决定结合整风审查干部，这是必要的，但结果发展为一个抢救失足者（指特务叛徒自首变节者）运动，搞逼、供、信，搞出许多“特务”、“叛徒”，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伤害了一批好同志，幸好毛主席、党中央及时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制止了错误做法。后来我们才清楚抢救运动主要是康生搞的，造成了严重恶果。为了纠正错误，对在“抢救运动”中受到审查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工作。甄别工作要选比较超脱的同志来搞，所以我们刚进入党校的同志，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当时我负责甄别的有两个同志。我们主要是看材料，调查分析研究，鉴别真伪。其中一个人的审查材料有一尺多厚，八斤多重，我都仔细看了，问了，提出了甄别意见。

甄别工作搞一段落之后，我们就投入了以分清两条路

线斗争是非为重点的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的材料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两厚本“六大”以来的重要文献；有毛主席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二月在中央党校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及后来直接听取的毛主席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讲话等；还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二十多个文件。对这么多学习材料，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思考。以自学为主，有时小组讨论，有时支部大会发言。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作报告、讲课，这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

整风学习很强调联系实际，自觉地反省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时，联系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联系到“六大”，同志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六大”基本正确，有的认为基本错误，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后来毛主席、彭真副校长作了一次报告，分析指出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基本是正确的。学习中，大家对“左”、右倾错误进行分析批判，着重是揭露王明的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记得有一次党校一部在

校务部前面的坪子里开会，孔原、王盛荣、朱理治等同志发言，揭露王明一九三一年反立三路线，不仅没有纠正“左”倾，反而越反越左。有一次在杨家岭开大会，许多同志发言揭发王明的宗派主义错误。王明的老婆孟庆树也上台揭发，说着说着哭了。毛主席劝她：莫要难过，好好讲。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分析，我们学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党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更加坚信不疑。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决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对长期争论的问题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这表明全党思想政治上空前的一致，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伟大的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参加整风运动，使我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对我以后的斗争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期间，还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朱德总司令拾粪。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几个人出了党校，在马路上散步，遇见朱总司令在拾粪。警卫员肩头背一个筐，总司令拿个粪耙子，见到马粪、牛粪、狗粪就拾。此情此景，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对我八路军进行经济封锁，给我陕甘宁的中央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做衣服没有布匹，粮食也不够吃。为了战胜困难，一九四三年，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时我们都听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现在亲眼见到朱总司令拾粪，更鼓起了我们的生产劲头。我们党校一部的同志都分了地，自己动手种菜。我和刘澜波、刘英勇三人分了一点地，种了十几棵西红柿、烟叶，利用业余时间掏粪，浇水。我们党校的全体同志还参加了修建延安机场的劳动。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大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当时，生活上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窑洞紧张，住房困难。按规定，结了婚的干部周末可以夫妻团聚。但是，窑洞没有那么多，每到周末，单身干部就主动挤到一块儿住，尽量让出窑洞，帮助解决住房困难。

二是朱德总司令叫我们上汽车。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我和曾保堂等几位同志从延安新市场返回党校。在宝塔山下，见一辆卡车缓缓驶来，我们不假思索地攀了上去。坐在篷车上的警卫战士让我们下去，这才使我们想到大概有首长在上，一看驾驶室才晓得朱总司令坐在里面。我们慌忙跳下车。突然，车停了下来。原来，朱总司令发现有人搭车，就让司机停车，探出头来，笑着对我们说：“没碍事，上来吧，上来吧！”见朱总司令招呼，我们也就不客气地蹦上了车。坐了二、三里地，到党校门口下了车。我们向总司令道谢，总司令仍笑呵呵地说：“没碍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一见面谈起此事。对朱总司令的钦佩之情便油然而生。那时候，延安只有毛主席有一台旧卧车，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外出，都是坐卡车，坐在驾驶室副司机席上。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关系密切，不管是哪一位负责同志坐在汽车上，路旁的同志都可以爬上去搭乘。可见，当时的党群、干群关系是多么的融洽。

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也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代表都住在党校学习，而在党校学习的不全是“七大”代表，但审查代表资格的工作，在党校学习的所有同志都参加了。每个代表先写出个人简历，然后在小组会上自述，小组的同志提问题，再组织专人对问题进行调查。负责对我进行调查的是李伯钊、李培之同志。代表资格审查搞了十多天，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也为“七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七大”开幕之前，所有代表都集中到党校一部，组成了几个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的团委是聂荣臻、彭真、刘澜涛、罗瑞卿同志。分了四个小组，罗瑞卿同志兼一组组长，让我担任副组长。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毛泽东同志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我们的大会今天开幕了，大会的意义，是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运的大

会，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大会，是决定中国命运之大会，是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指出：现在形势是很好的，西方红军快打到柏林，东方的日本快失败了，而中国是有光明和黑暗的两方面，光明之中国是统一的自由独立民主强盛快乐幸福的新中国，或是分裂倒退的旧中国。我们是要争取第一个前途（光明），反对第二个前途（黑暗）。这是我们大会与全党全国人民的任务。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实现的。条件是：（一）有我们强大的党及其丰富的经验；（二）有中国的解放区及其军队；（三）全国人民的援助；（四）全世界人民的援助。这是过去没有或少有的条件。所以我们敢说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是有完全可能的。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力量，打倒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时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接着，朱德同志讲了话。他风趣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特点，是在自己修的房子内，及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这是与已往的六次大会都不同的。我们的党经过二十余年的斗争，才有今天这么多的党员和军队，也才有今天的大会。朱德同志还满怀深情他说，我们无数的先烈在与敌人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我们的历史就是被杀的历史，我们要为死者报仇。

最后，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说明了代表的选举产生“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有严肃性谨慎性，又要照顾到具体性。”“这次审查的结果是：正式代表 547 名，候补代表 208 名，其中增补的为 246 名。他们代表着全党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取消代表资格者 49 名。代表党龄：一九二七年前入党的 210 名，占 27.9%，二八年至三六年入党的 444 名，占 59%，三七年至四一年入党的 98 名，占 13%。代表年龄：平均 36 岁半，最小的是方朗，23 岁；最大的 69 岁，是徐特立同志，代表文化程度：中学以上 422 名，小学 319 名，识字少的 11 名。代表职别：军队 324 名，党务干部 315 名，政民教最少。”

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第二次大会。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形势路线政策几个问题的报告。政治报告是印发的，关于形势等几个问题是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的。

毛主席开头就说，我今天的报告只是讲书面材料没有写上的或需要加以补充的几个问题，书面写了的我就不准备再详细讲了。今天的报告主要说明

下列三个问题：

- 一、形势与路线（即总方针）；
- 二、几个政策问题；
- 三、党内的几个问题。

接着，毛主席围绕这三个问题，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

光明的新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强调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的实现。

在后来的几次大会上，我们听取了朱德同志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明确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逐步地实现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指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是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是党的团结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们还听取了周恩来同志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胜利前进。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大会后半段的任务是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从酝酿候选人到选举，都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充分讨论。我记得，毛泽东同志对选举有几次讲话。在酝酿选举时，各代表团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次讲话，大意是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一个都不选不好，不利于团结；统统都选上也不好。正式选举时，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头一天选中央委员44名。毛主席在投票前说：东北的老同志，关向应同志已去世，只有林枫同志。要照顾到东北，东北将来要首先胜利。毛主席还说，自己可以投自己的票，我就准备在我的名字上投一票，对人民负责嘛。第二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主席又讲了话，主要是提议选王稼祥同志为候补中委。大意说，昨天选举中委，稼祥同志落选了，今天选候补中委，稼祥同志的名字放在名单的第一位。毛主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我记得毛主席还说，稼祥同志是有功劳的：一是转达斯大林意见说王明有野心；二是四次反“围剿”时开广昌会议，没有稼祥赞成我的意见，敌人的“围剿”不可能粉碎；三是遵义会议上稼祥讲王明、博古的错误，站在正确的一边；四是整风文件是稼祥同志起草，经过我审查修改定稿的。因此，把稼祥同志名单放在第一名，希望同志们选他。结果，王稼祥同志全票当选为七届候补中央委员。

选举时的监票员是各代表团的小组推荐产生的，一个小组出一名同志监票，我也被推举为监票员。我们监票时，毛主席在台上随意走走看看，等监

完票再公布选举结果。“七大”选举的民主空气是相当好的，选举产生四十四名中央委员，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七大闭幕了。毛泽东同志致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指出：“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的“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这次大会，为我们党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加党的“七大”，使我深受教育，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象我这样的苦伢子，能够成长为党的“七大”代表，完全是党精心培育的结果。参加革命以来，我身边的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眼下，许多贤才良将因抗战前线的工作繁忙，未能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一切，有力地鞭策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自觉为实现党的“七大”路线而奋斗。

二十九婚 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延安党校学习。组织上告诉我，说我的未婚妻范景明来到了延安，现住在贺龙同志领导的联防司令部招待所里，让我马上去接待她。听了这出人意料的新闻，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们相恋的往事浮现在脑海之中。

我和范景明同志相恋已二年多了，红娘是王平同志和他的爱人范景新同志。那是一九四一年冬，我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王平同志见我二十六岁了，尚未婚配，就对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是个党员，十九岁，人聪敏，长得也好，原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学校学医去了，你们抽空认识认识吧！”后来，学校放假，范景明来到她姐姐家，我们俩就见了面。她，中等个儿，举止端庄，面目俊俏，身段匀称，加上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后经几次接触和交谈，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一九四二年夏，我离开了三分区，调到四分区任副政委。白求恩医科学学校也从唐县葛公村迁到了树沟大台村。两地隔山隔

水，相距远了，见面很不容易，我们只有靠书信往来交流思想感情。那时通信，不象现在这样容易。邮件全靠行踪不定的交通员传递。要捎信，得事先写好，揣在身上，待交通员一来，请他捎走。我们每次通信，主要是询问反“扫荡”中与敌周旋的情况，互相鼓励克服困难。相恋一年多后，我们情投意合，婚事摆到了面前。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临来延安时，已二十七岁了，够成婚条件了，但范景明尚在学习，按规定不能结婚，否则就得中途退学。为了支持她的学业，我们商量将婚期推迟。我到延安后，延安与晋察冀的正常邮路早被敌人切断，传递信件，全靠地下交通在敌人的缝隙中进行。这一年里，我们之间难得的通信也是靠地下交通传递的。她这次到延安来，事先来不及告诉我。

我到了联防司令部招待所，见到了范景明，我们互道了一年多来的分别之情。接着，她向我述说了这次来延安的经历。一九四四年二月，她从学校毕业了。巧遇邓华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西调，王平同志就托教二旅的同志让范景明一同西行。她骑着一匹骡子，两只小包裹搭在骡子背上，跟着教二旅旅部，顺利地经过了五台、崞县、代县，来到了山西省宁武县的一条小河边。对岸就是同蒲铁路，鬼子的巡逻队、装甲车常在铁道上来回游动。这天上午，当教二旅旅部进入河谷时，敌人的两辆铁甲车向正在渡河的部队拼命扫射。范景明刚走进河谷的泥沼地段，一粒子弹打飞了戴在头上的那顶肥大的帽子。她周围的几个战士倒下去了，鲜血洒在河滩上。凭着多次反“扫荡”的经验，她没有直接涉水过河，而是招呼护送她的那名警卫战士同她一块向右前方的小桥奔跑。从桥下过了河、到了对岸，跟着突围分队冲过了铁路。不巧，路那边是个高坡，一时过不去，敌人在身后开枪，队伍又被冲散了。她紧紧拽着山坡上的一棵小树，越过山坡，拼命地向右前方跑去。傍晚，她孤身一人来到一个荒山坡上，不见部队的行踪。于是，她从荒地上拣了一堆干草枯叶，铺在背风的田埂拐角处，又搬来一些石块，利用地形，象燕子筑巢那样码了个窝，度过了寒冷而漫长的夜晚。翌日凌晨，她发现山坡下有条小河，对岸散落着三、五户人家，炊烟袅袅。她悄悄地摸进村子，遇见一位忠厚老实的大伯，一打听，方知道八路军从这儿进山了。大伯听姑娘是外地口音，又是打听八路军去向的，立即让她进门洗脸、喝汤、

吃麦饼。见她双脚都肿了，老汉找来一头毛驴，让她骑着，催促说：“这个村子也常进鬼子，咱们快走吧，路上要是碰上人盘问，你装哑巴。”这位善良的老汉，带着范景明赶了一天路，黄昏时分追上了正在山沟里埋锅做饭的后卫分队。景明谢别大伯后，在战士的引导下，又走了一段山路，终于在岢岚东部找到了教二旅旅部。到了绥德，范景明就住在抗大女生队，一边参加学习和生产劳动，一边等待随去延安的机会。

一个月后，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参谋长萧新槐同志途经绥德赴延安，景明就随同来到了延安联防司令部。司令部的同志一面安顿她住进了招待所，一面通过党校告诉了

我。景明这次西行延安，历时三个多月，真可谓千里迢迢来完婚。此情此景，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当即商量，合写了一份结婚申请报告，交给党校组织上。过了两天，彭真副校长的秘书小李同志通知我：彭真副校长代表党组织，批准你和范景明同志结婚，分配一个窑洞供你们作洞房。小李秘书还说，你这样的师级干部结婚，党校可以免费给办一桌酒席，宴请八个人的名单由你们自定。我考虑到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就谢绝了。

我们的结婚准备十分简单。八、九平方米的窑洞新房里，单人铺板旁加了块尺把宽的木板，铺着我从山上割来的干茅草；盖的是我平常盖的那条粗布旧棉被。至于摆设，那就更简陋了。除了公家的长条板凳和一张旧桌子，就没有其他家什了。

尽管我们穷得叮当响，还是狠狠心，花钱在延安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这是我俩首次合影。

六月二十六日，是我们完婚的日子。三支部的同志们纷纷前来贺喜。通向窑洞的斜坡路，既窄又险。夜幕下，两名战友主动站在危险地段，担任“交通警察”，确保行人安全。道喜的人们，有的夫妻双双，有的三五成群结伴而来。大家都跟我们一样穷，送不起什么礼物，只能将深情厚谊，凝聚在一张张写着贺词的红纸上。

邓颖超、钱瑛、帅孟奇、李伯钊四位大姐一进窑洞就笑嘻嘻地说：“我们四人送你们四句话：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顿时，一阵掌声飞出窑洞外。

接着，郭化若同志打开了他送的贺词：“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又响起了一阵掌声。趁此兴头，陈锡联、栗榕、王盛荣、赵敏珍四位同志，献上了他们的联名赠诗：“清凉山下延河畔，景秀春明槐荫间，生产学习练武艺，亲亲爱爱庆丰年。”由于诗中巧妙地蕴含了新郎新娘的名字，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道喜的人群中，还有赋诗祝贺的。

王近山、鲍先志、韩岫岩、韩志新、廖华同志赠诗曰：“千里西来，百年偕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这时携手入洞房，他时携手上前方，驱逐敌人，共享人间幸福。你俩好象美丽的鲜花，嫩绿的芳草，争妍斗艳；你俩美好的青春，为着山河生色。祝你俩甜蜜恩爱，祝你俩前途远大！”

陈奇涵、卫兵、倪志亮、石玉英、郭洪涛、史秀英、邵式平、胡德兰，这四对夫妇的赠诗点明了我们恋爱和结婚的地点：“相识在抗日疆场，相聚在模范的后方，卿卿我我，话短情长，从此花宿双飞，准备弄瓦弄璋。”

张庆孚、刘澜波、王凯、何柱成、刘英勇五位同志的贺诗曰：

一个是如花似春，一个是不世奇男，
那个家居燕北，这个长在江南。
千里姻缘红线牵，
你俩相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人说三岛有神仙，
我说神仙在人间。
今天恭贺花烛禧。
明年再赴汤饼筵。
螽斯衍庆，亿万斯年！”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富有的。大家很乐观，碰在一起，常开玩笑。延安当时有出怕老婆的戏，叫做《背板凳》。陈赓、陈再道、王树声、谢扶民四位同志，就把这意思揉在这样的贺词里：

“干大事业，背小板凳，
两全其美，乐在其中。”

他们把它端端正正地用钉子钉在窑洞壁的中央，同志们见了，笑得前俯后仰。我还跟景明开玩笑说：“要注意呀，背板凳的事，我可不干！”逗得她直捶我背。

这些贺诗祝词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大大小小，长条条，方块块，挂满了新房，我们实在过意不去，买不起糖块，没有花生瓜子，连碗茶水也没有，好在同志情深，风气也正，谁也不见外，乐得我们俩乐呵呵地站在窑洞门口，把同志们一批批地迎进来，一批批地送出去。幸亏范景明会唱歌儿、被逗得躲不过去了，就唱一首歌儿，表示感激之情。正像电影《刘三姐》里所说的：“我今没有好招待呵，唱支山歌敬亲人。”

夜深人静，前来道喜的人们早已退尽了，我们还在煤油灯下仔细地拜读着大家的赠言。长条条、方块块，真不少呀！数数名字，六十五位领导、战友尽在其中，此情此谊，是世上最可宝贵的，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想把这些都保留下来，可是，在那只能靠马背驮家产的战斗年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就把内容抄在小本本上，迄今留存，永作纪念。现将部分贺词抄录如下：

有情人竟成眷属，
无产者要立家务。
何思敬王艾英恭贺
为革命的事业奋斗到底！
孔原敬贺（另赠列宁像一张）
同心协力
李守轩张子英刘宁一李淑英敬贺
互助互爱，携手前进，
努力不息，快乐无限。
张广才林江刘宁一李淑英敬贺
在马恩列斯的旗帜下携手迈进。
俞屏李枫贺
原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余洪远马英敬贺
同舟共济。
谭友林姜汝芳恭贺
努力学习，努力帮助，
尤其要努力把握中心。
罗瑞卿陈赓蔡树藩宋时轮
聂鹤亭曹里怀同贺

三天新婚假，我们俩一天也没有休，仍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学习。

范景明先在延安中央医院里实习，然后分配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当医生。当时，因为没有房子，不少师以上干部成了家也还是无家的“游击健儿”，只有星期六才夫妻团聚。一到星期六，要找个团聚的窑洞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哩！至于吃的，那就更困难了，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使我们感到春天般的温暖。一九四五年夏，范景明怀孕了。大伙房里常吃刺刺菜，都是大伙儿上山挖来的，正常人见了都发愁，何况孕妇呢。景明想吃点青杏子，没钱买。老战士张秋芳常赶马车下乡办事，见路旁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征得老乡同意，就拣些回来给她吃。有位同志见她营养不良，还特意为她从老远的地方买来一只母鸡，产蛋补养身体。大家都那么苦，她养鸡吃蛋，不怕显眼？没有必要担这个心。这里已有了先例。参加过平江暴动的吴自力同志很会安排生活，菜种得好，还养了几只鸡，窑洞里有时还挂块腊肉呢。也曾有人认为建设小家庭会消磨斗志，建议朱总司令去管一管。朱老总笑着说：“他一没偷，二没贪，好嘛！他把生活搞好了，我们共产党里不就少一个人受苦了吗？”朱老总的这番话，解除了同志们的顾虑，生产自救开展起来了。

说到婚事，还有一套衣服的事也是值得一提的。范景明来延安途中遭鬼子袭击丢失了所带的几件衣物。婚后又无钱添置，终日穿着一套草绿色衣裳，连换洗都倒不过来。一次，中央医院在杨家岭搞了个卫生展览，范景明担任解说员。毛主席、任弼时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陪同下参观展览。毛主席询问了范景明的名字，又问她为什么穿一件与众不同的草绿色衣服，她低头不语，没有说出无衣可换的实情。毛主席的问话，引起了刘景范厅长的注意。事后，他设法让有关部门给她做了一条背带工人裤、一件细布褂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照顾呀。这套衣服，范景明舍不得穿，一直珍藏在箱子里。

俗话说，患难夫妻情真挚。这一点不错。我和范景明结婚五十余年了，虽然难免口角，但她没让我“背板凳”，我也没对她红过脸，一直和睦相处。我的老上级舒同主任因赴华东工作，提前离开了延安，没赶上我们的婚礼，特于一九八三年补赠了一副对联：“东风化春雨，红日照中华”，还抄录一首唐诗为中堂，经裱褙，挂在家中，以作纪念。

三十 一包密电码

党的“七大”胜利结束后，各地的代表和参加延安整风学习的同志，陆续奔赴各根据地，去宣传和贯彻“七大”的路线，夺取新的胜利。

我的去向，前后有点变化。组织上开始对我打招呼说：准备南下，跟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到华中根据地去工作。后来正式通知我：你们的工作分配都要征求原战略区首长的意见。聂荣臻同志的意见是让你回晋察冀根据地，因你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八月的一天，聂司令员把我找到杨家岭他的住处，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了，你带一批干部回晋察冀去。说着，他交给我一只缝得严严实实的黄布小挎包，并叮咛说：“这是密码，军委刚下发的，马上就要启用。你把它带回军区，交给唐（延杰）参谋长。路上要小心，要万无一失。”

我来延安快两年了，现在要回晋察冀根据地，心情很激动。我和范景明赶忙收拾行装。我知道，密电码关系重大，头可断，身可亡，密电码不可落入敌人手里。为了它的安全，我轻装再轻装，私人东西尽量不带，以应付途中之不测。个人用品简陋，弃之并不可惜，只是有口火锅，我对它特别喜爱。这是口铜火锅，精致而实用，是延安医生刘登赢同志送我的。他原是我的老部下，抗战中期转业到延安行医挣薪，小日子过得不错。他见我们生活困难，就送给我这口火锅。清贫之中，受人点滴，终生难忘呀！我很想把它带在身边做个纪念，无奈密电码在身，不能如愿。我就将这口火锅赠给了罗瑞卿同志。后来，罗瑞卿离开了延安，又将这口火锅转赠给了别的同志。全国胜利后，我和罗瑞卿同志碰在一起，还常提起这口火锅的往事哩！

一天下午，我和纪亭榭、严庆堤、杨瑞亭、俞占先、黄光明同志，及各自的家属、警卫员准备出发了。忽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派人通知我去一下。我让纪亭榭等同志先行一步。随即跑步到了彭真同志办公的窑洞。彭真同志亲切地同我谈话。主要问我对“七大”的认识，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想法。我回答说：“过去打仗靠毛主席，将来胜利还是靠毛主席。通过‘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明确了，坚信毛主席的领导，对胜利充满信心”。彭真副校长见我回答得很干脆，符合“七大”精神，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好，坚信这一条，就能胜利”。他还鼓励我回晋察冀后好好工作。我把不容离身的那只密电码小包朝侧后方一移，敬了个军礼，告别了彭真同志，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连走带跑，赶到延安东边的四十里堡，找到了先行的同志们。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继续向东行进。

走了几天，快到绥德县时，忽然，一辆卡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坐在驾驶室的一位首长探出来，兴奋地对我们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啦！延安一片欢腾啊，彻夜火光通明，庆祝胜利，有的同志高兴得连草垫子都烧啦……”我们一眼认出向我们传来特大喜讯的是贺龙同志。贺龙同志还对东北籍的纪亭榭同志开玩笑说：“可以打回老家去喽！”

听到这样的特大喜讯，我们都异常兴奋。漫长而艰难的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了。为了这一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全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牺牲呀！用毛主席的话说，那叫“愚公移山”啊！欣喜之际，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抗战胜利了，新的工作在急切地等着我们去完成。同志们欢快地目送贺老总乘坐的卡车疾驰而去，我们也策马扬鞭，加快了行进速度。

我们来到了佳县（葭县）大会坪渡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黄河之水

奔腾呼啸，一泻千里。由于连日下雨，河水猛涨，风急浪高，发出震耳的吼叫。帮助我们过河的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艄公。第一船，他先把几头牲口运过河去。接着，再来送我们。船到河中心时，风越刮越紧，浪越来越大，船颠得很高，眼看就要翻船了。幸好艄公撑船技术很高，他反复叮嘱：洪水下来了，很危险，大家不要随便动，一切听我的。只见他全神贯注地稳操船舵，累得满头大汗。船总算安全地到了对岸。等我们上了岸，艄公笑着对我们说：“刚才确实很危险，再来两个浪，我也掌握不住了。”我们由衷地谢过这位艄公，踏着黄河岸边的沙土，向晋西北军区司令部走去。

我们在位于兴县与苛岚之间的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住到了苛岚。又走了几天，到了晋西北的忻县、崞县一带，要过同蒲铁路封锁线了。这时，鬼子虽然宣布投降了，但并不是一下子都解除了武装，忻崞一带仍在混乱之中。没有部队护送，如遇顽敌，密电码就很危险。为了确保安全，我找到了八路军忻崞支队。头一次去，支队的同志说昨天气象局（实为情报部）带电台过去，我们派了一个连去护送，眼下家里没有部队了。第二天我又去联系，巧得很，接待我的是这支游击队的副支队长。他原是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五团的一位连长，我们互相认识。久别重逢，分外亲热。我实打实地对他说：“我带有密电码，你要派兵送我过封锁线，要尽量避免与敌人纠缠。”他是个爽快人，一口答应说：“行呀，今晚就走，决不耽误”。当夜，他派了一个连，把我们送过了同蒲路和滹沱河。

过河之后，我们告别了护送的同志，趁着月色加紧赶路，深夜进入了定襄县横山村。这一带我也很熟，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我和舒同主任曾在这一带做过发动民众，扩大抗日武装的工作，许多干部、群众都认识我。他们见我带着十几个人回来了，热情地安排住宿。横山自卫队还为我们站岗放哨，监视寿录方面的日本兵的动向哩！我们在横山村休息了一天，当夜又赶路了。严庆堤带着六个警卫人员走在前边，我们谨慎地跟随前进，一行人团结互助，平安地经过了

一个又一个复杂地段，终于回到了河北根据地。我们经平山、阜平、涞源、西合营、宣化，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一到目的地，我将这包密电码交给了参谋长唐延杰同志。唐参谋长立即将它交给机要处李处长。我这才如释重负。千里行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密电码与我形影不离。行军，我把它背在身上；过河，我把它举在头顶；宿营，我把它抱在怀里。即便这样，还觉得不安全，做了好几次恶梦，梦见密电码丢了，梦见它被鬼子抢去了，我喊呀，追呀，夺呀，直到从梦中惊醒……

回想起来，我们所以能够完成任务，关键的是，我们一路上，得到了沿途党政军民的大力协助；没有这一点，困难会多得多。

三十一 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到达张家口之前，聂荣臻司令员、罗瑞卿副政委等已经到达张家口了。他们是坐飞机离开延安的，飞机飞到了山西灵丘机场，再坐汽车赶到张家口军区司令部。我一到张家口，就直奔位于宣化大道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报到。聂司令员和罗瑞卿副政委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并说：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还没有配部长，你回组织部去当部长，现在大批干部去东北，接待任务很重，你们要马上展开工作。

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首长还有：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耿飏。我们政治部的首长，主任由罗瑞卿副政委兼任，副主任是潘自力、蔡树藩。政治部机关的组成情况是：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民运部副部长王达成，敌工部部长康健生，保卫部部长蔡顺礼，总务处长佟铮。我们组织部的同志有：组织科科长罗亦经，副科长王毅，干事张凤举、罗绍钦；干部科科长林接彪，副科长张学儒，干事王干一、黄树霖、么仲选。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很少，但工作量却很大；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组织部当时的工作，最大量的是接待去东北的干部。

派大批干部去东北，是我们党根据斗争形势发展而采取的重要决策。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人民渴望和平，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就在人民庆祝胜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余音未消的时刻，一场新的暴风雨又来临了。

美帝国主义企图代替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控制中国的广大市场，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猖狂进行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竭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则想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在全国建立黑暗的独裁统治。就这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解决了，而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且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的方针是老早已经定了的，并作了各种准备。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极端狡猾、极端阴险的家伙，他在积极准备和发动内战的同时，又玩弄了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政治上早已高度成熟，对美蒋反动派的无耻阴谋早已看透，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中央适时地作出了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布局的决策，明确规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

中”的战略方针。

早在抗战胜利之前，中央就认准了东北在今后全国战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东北毗邻苏联、朝鲜、蒙古，可以得到国际援助；工业交通发达，是支持战争的大后方；国民党远在西南，在东北的势力十分薄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眼睛首先盯着东北。他在美国帮助下，从空中、海上源源不断地向东北增兵。为了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占领东北、解放东北，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就命令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迅速向辽宁、吉林进发；命令吕正操等，立即率部向察哈尔、热河和辽宁进发；以后又从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抽调

干部率领部队向东北进军。

我到组织部工作时，晋察冀军区的东北籍干部绝大部分都已“打回老家”去了。后来所接待的干部，都是从延安、晋绥等地到东北去工作的干部。我们组织部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李葆华）热情接待这批在张家口中转的干部，解决他们一些实际困难，使他们顺利

利奔赴东北前线。大家的思想很明确，接待好大批中转干部，就是为未来的东北解放贡献力量。

从延安来张家口的干部，千里跋涉，都非常辛苦。我们在张家口东山坡招待所，让他们好好地歇歇脚，逐个征求意见

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延安中央党校的张庆孚教授赶到张家口，浑身衣服破烂不堪，足以说明了一路的艰难。不用他张口，我们就给他从头到脚换了装。东北很冷，去的干部一般都发给一件棉衣、大头棉鞋、大衣。对张庆孚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是倍加照顾的。我批了条子，让供给部特意为他赶制一件毛皮大衣。供给部部长封永顺、政委吴先恩等，非常支持组织部的工作，见了我的条子，均全力办理，从来没有“踢皮球”现象。他俩督促工厂选择最好的毛皮，在两天内将皮大衣做成了。张教授乐呵呵地说：“有了这家伙，再冷也不怕了”。

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第三支部书记陈奇涵同志到了张家口后，马病了，走不了了。这可把我们难住了。鬼子投降后，张家口物资非常丰富，真像有人所形容的是“葡萄酒淹死人，白面糖压死人”，仓库里东西多得很，可就是缺少马匹。原有的一些马，都被先来的干部骑走了。没办法，我将自己骑的那匹骡子送给了他。这匹骡子，是晋察冀三分区十一团政委杜文达一九三九年送给我的战利品。那时还是个骡驹子，后来经过精心喂养，出脱得膘肥体壮了。它驮着我上延安、来张家口，跑起路来又快又稳，实在令人喜爱啊！如今，陈奇涵同志急需，我便忍痛割爱把它送给他了。

干部中转站的工作量很大。组织部办公室里，整天川流不息，迎来送往，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帮助他们解决住宿、吃饭、穿衣等困难。前后计算起来，在这里中转干部少说也在两千人以上。由于很忙，十二月九日，我的大女儿贝贝出生，我都顾不上照料，多亏医生冷冰同志助产、照料，母女俩才安然无恙。

在张家口，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助边区政府做好残废军人的思想工作，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后，从延安荣军学校来了一批荣誉军人。边区政府一时缺钱缺物，没能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惹得他们冲进边区政府民政厅“讲理”去了。民政厅长柯庆施给我打电话求援，让我们部队出面做做工作。我立即派干部干事王干一同志去找柯庆施，把这批荣军同志接到组织部商谈。王干事去到柯庆施办公室时，四十多个伤残荣誉军人正在发火朝他扔拐杖哩！王干事立即进行劝解，并邀请他们到军区机关来，由军区听取批评意见，解决实际问题。王干事当即组织他们乘坐卡车来到军区组织部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摆了烟、茶、糖块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请他们一个一个讲意见、提要求。其实，他们并没有过分的要求，无非就是冬天里伤口痛，要求发件御寒衣；分点儿战利品度度年关等。我们当即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向他们说明日后遇事要尊重地方政府，不准随便动拐杖等道理。他们乐呵呵地接受了。第二天，通过供给部门，拨出了一批缴获的棉被、大衣、大头鞋、白糖、香烟等，由王干一同志送到了他们的住处怀安柴

沟堡，他们很高兴。对这件事的处理，边区政府很满意，昂政厅的同志说：“你们救了我们的急，万分感激！”那时的军政关系如此融洽，令人留恋呀！

无需讳言，抗战胜利后，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个人主义也有所抬头了。从陕北清涧县搬到张家口十三里营房的附中（后改名为陆军中学，简称陆中）的青年学生，一到张家口就闹待遇，闹得连课都不上了。陆中校长李钟奇等同志磨破嘴皮做工作，仍稳不住阵脚；我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藩自力分别去做工作，不顶用；北方分局负责人刘澜涛同志亲自出面，成效也不大。对此，聂荣臻司令员动了感情，很生气，他对我说：“陆中闹得不像样子，要继续做工作，再不听就把他们解散”。正在这时，北平军调部需要工作人员，聂司令员让我从陆中选送十名好学生。我带着王干一同志去陆中挑选，并将这十名同志同车带回了军区机关，给他们换了装，分配他们去北平军调部工作。这十名同志高兴极了。由于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陆中的学生不知底细，以为我们“抓走了十个人”，吓得不敢再闹腾了。

在张家口做干部工作时，还经常有临时性任务。有一件事，我的感触很深。一位同志带着一批抗大的干部去东北，聂司令员让我拿着他的亲笔信和军区的介绍信，去找这位同志，请他留几个干部给晋察冀军区，因为当时军区的干部很缺。我坐着聂司令员的伏特车，赶到怀来县，向这位同志陈述了情由，但是没能要来干部。故然东北很需要干部，但如果从全局考虑，聂司令员开口要几个干部，还是应该答应的。当时，为了有利于团结，我就没有向任何同志谈及这次去要干部的情形。只是内心想，我们军队的同志无论在任

何时候都应有整体观念、全局观念，不能只照顾小团体的利益。

三十二在历史转折关头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战争的乌云又密布中国的上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晋察冀军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布局的决策，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斗争。

在组织体制上，分别编组了野战军和地方军；在思想上，普遍进行了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着重解决长期游击战中形成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在军事技术上，抓紧战斗间隙，进行应用训练，提高打运动战的能力。较快地完成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到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

这时，傅作义部不断对我热、察两省进犯。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发起了绥远战役，给傅作义部以沉重打击，不但保卫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而且配合了控制东北的斗争。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军抢夺战略要点的进攻，打击敌人对边区的蚕食进犯；在配合和平谈判的同时，利用暂时休战的时机，加紧开展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解放区军民提高了斗志，发展了生产，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为边区支援长期作战和击败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战争准备，便撕下面具，公然撕毁《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于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面对穷凶极恶的蒋介石集团的猖狂进攻，我解放区军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奋起自卫还击。这样，全面内战爆发了。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决战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

解放战争初期，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反动派的确是相当强大的。它拥有的陆、海、空军总兵力达四百三十多万人，其中正规军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师）达二百万人，美械装备的就有四十五个师。蒋介石还掌握着国家中央政权，在国际上据有合法地位。全国3/4以上的面积和70%以上的人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大城市、交通要道和现代工业、商业，均被其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力、物力来源相当雄厚，而且在军事上、财政上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

而那时，人民革命力量和敌人相比，则处于劣势。我军总兵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数量不及国民党军的1/3，武器装备只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都远不如

国民党所控制的多，而且在日寇的多年摧残下，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敌我军事、经济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解放区军民能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吗？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紧急关头，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发出了《以

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八月，毛泽东主席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强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在战术上又要重视敌人，善于斗争，善于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军民的必胜信念，起到了极其伟大的战争动员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本区情况，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八月九日，晋察冀中央局向党政军民发出“紧张地动员起来，坚决勇敢地投入到自卫战争中去，彻底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号召，在全区迅速掀起了军民总动员的备战高潮。

当时，晋察冀边区军民面临的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北平行辕及所属第一、第十一、第十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七万九千余人，已向热河、冀东推进，并准备从东西两面向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张家口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边区的进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晋察冀和晋绥军区以半年左右的时间夺取“三路四城”（即平汉路北段、正大路、同蒲路以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的战略部署，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首长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先打大同再取平汉。为此，晋绥和晋察冀两区联合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作战。

确定攻打大同后，军区机关的一批干部下到各部队去帮助工作。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负责支前工作。

一接受任务，我就迅速赶到阳高与大同之间的聚乐堡，同军区兵站部部长刘显谊、雁北地区专员张柱国同志一道，组织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我担任动委会主任，刘显谊、张柱国为副主任。我和张柱国同志是初次相识。他长期在雁北地区工作，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他对动委会的工作很热心，很积极主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去解决。动委会在聚乐堡的一个村子里办公，主要是依靠当地政府和各级动委会，发动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打大同。战地委员会以主任、副主任的名义发出布告。广大群众特别是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非常高，宁可自己不吃不

用，也把粮食、物资拿出来支援部队。动委会统一调配人力和物力，安排物资供应和运输，组织民工担架队，进行野战救护，抢救和转运伤员等，为部队攻打大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从七月十九日始，我军对大同南面的外围据点进行了围攻。七月三十一日，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全面展开。我到了大同城南，随三纵队八旅行动。部队攻击城南外围据点，打得十分勇敢顽强。战至九月二日，大同外围各据点均被我肃清，大同城北我军控制了北关及车站，城南进至南大庙，城东城西亦抵城垣。部队进逼城下，开始了坑道作业，做攻城准备。这时，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傅作义集中蒋军两个军三个师和四个骑兵纵队，分三路驰援大同。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先打援、后攻大同。结果由于战场指挥失误，错失聚歼敌部分援军于集宁城下之机会。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我军于九月十六日断然撤围大同。

历时一个半月的大同、集宁会战，部队英勇作战，歼灭了一万二千余人，经受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但集宁打援受挫，大同未克，傅作义部乘机东援，使我晋察冀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张家口处于东西受敌夹击的不利地位。

对张家口的进攻，是敌人蓄谋已久的战略计划。敌人的部署是：先夺取承德和冀东地区，以巩固平津地区，巩固北宁铁路，截断我华北、东北的联

系，再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会攻张家口。

中央军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从战争全局出发，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准备必要时主动撤离张家口。

我从大同前线回到张家口时，干部家属、小孩都撤到涞源地区去了。刚住了一个晚上，聂司令员、潘自力、蔡树藩副

主任向我交代了新的任务：带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去东线部

队，参加怀来阻击战。第二天，我就带着宣传部的高天辉、组织部组织科长罗亦经等十几位同志，赶往下花园。军区副参谋长耿飏同志开了吉普车来接我们。

我军位于张家口东线的部队，主要是野战军二纵队、一纵队和三纵七旅等，由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

卿、副参谋长耿飏等指挥，阻击由北平袭来的敌第三十四集

团军（李文兵团）。一到怀来前线，我们就在野战军首长的领

导下，深入到二纵四旅等部队，协助动员广大干部战士，做好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这时，晋察冀边区党委派了由马辉

之、何松亭等组成的慰问团，来到怀来前线进行慰问活动。耿飏副参谋长、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和我等，陪同慰问

团去前线慰问二纵部队。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时许，趁敌机盘旋减少的时候，我们坐车出了怀来城北门，刚走了一里多路

翻了车，有的同志受伤较重，我受了脑震荡，转到涞源后方。

虽然人在涞源休养，但心系张家口前线，时刻关注着那里的

战况。七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的十一个师、七万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张家口。我军东线部队在平绥路怀来地区英勇地抗击敌人十三个昼夜，在许多阵地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歼敌七千余人。我军另一支部队出击平汉路北段，歼敌八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怀来阻击战。十月七日，傅作义集中两万余兵力，从集宁出动，偷袭张北，向张家口扑来，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为了保持主动，我领导机关于十一月九日晚上，有秩序地撤出张家口，主力也随之转向察南地区。

十一月下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聂荣臻书记主持下，在涞源县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指出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方针，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主动，才能转变形势。《决定》号召全区指战员尤其是各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学习各兄弟军区作战经验，为争取战局转变而斗争。这体现了我军打一仗进一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优良传统，对统一认识，树立信心，增强团结，明确方向，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作用。

按照涞源会议的精神，全区部队兵力扩充到二十四万余人，并调整了战斗序列，充实和加强了野战军。这是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部队由地方化向野战化转变后，军区决定随军的家属子女都留在后方。这既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行动迅速，又可保证家属子女的安全。在聂司令员的亲切关怀下，军区党委决定，把留在后方的家属、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一所子弟学校，以利于干部集中精力在前方打仗，也利于培养教育第二代。聂司令员指示说：“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接着，罗瑞卿副政委亲自

召集会议，研究创办学校的问题。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赞成以聂司令员的名字命名学校，叫“荣臻小学”；并确定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负责筹建工作。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商量，成立了荣臻小学董事会，由我担任董事长，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余光文、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佟铮担任副董事长。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边振瀛担任校长，另外两位同志任副校长。确定校址在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以北的易家庄村。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设小学部和幼稚园，有教职员工二十四名，小学生三十二名，幼稚生十八名，学生全部实行寄宿制。这所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诞生的荣臻小学，是我军在战争时期办得最早的一所小学校。那时，点线还被敌人占领着，边区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办学条件自然很艰苦。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教学设备一无所有，教材书本笔墨用具也极缺乏。但是，军区首长对学校非常关心。聂司令员和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经常到学校看望，作指示。聂司令员特别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指示学校要搞好生活。他说，使学生身体健康少吃药，就是节约。他还说，要算这个账，培养出一个马列主义者来值多少钱。在首长的关怀下，学生们享受着当时最好的待遇：

每天两餐小米饭，每月一餐细粮。野战军的首长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等来后方，总要到学校看看。首长们对办学如此重视，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劲头都更大了，千方百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借老乡的木板当桌子，石头当椅子，用锅烟子刷黑土墙当黑板，用白土当粉笔，教孩子们识字学知识。后来，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荣臻小学由山区移到平原，从易家庄迁往平山县的古贤村；规模逐渐扩大，有了幼儿园、小学，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多人。北平解放后，学校迁人北平，成为北京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后改成北京市八一学校。这所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一九四七年初，除筹建荣臻小学外，我还参加了几个重要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晋察冀部队先后发起了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南（保定以南的望都、定县、新乐地区）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就整个华北战局而言，尚未完全掌握主动。为了加强军区部队的建设，提高战斗力，争取华北战局的根本好转，中央局和军区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召开了几个重要会议，这就是：研究作战指导思想及后勤建设、兵工生产等问题的各纵队负责同志会议；加强司令部工作的参谋工作会议；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政工会议和中央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其中的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央局扩大会议。

政治工作会议，是三月十八日在安国召开的。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主持了会议，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作了《加强政治工作的报告》。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思想，认真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改进措施。提出了当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是：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激励部队坚决勇敢的杀敌精神；规定了两大中心工作，即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立功运动（颁发了立功条例）；加强团结，改进军内外关系。会议还确定在团以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政工会议刚结束，我们接着参加三月二十九日在安国召开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这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遵照中共中央二月一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

就作战方针对晋察冀军区的历次指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查执行军事斗争、土地改革和生产三大任务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中央局安国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使晋察冀解放区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对贯彻执行运动战、歼灭战的指导方针、夺取战争主动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军内军外团结、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等重要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坚定了夺取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会议的精神在部队和各地传达后，得到了广大指

战员和地方各级干部的热烈拥护。经过学习，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打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深入军心，立功运动普遍展开，军内外团结明显增强，士气更加旺盛。

一九四七年春末夏初，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西北我军三战三捷，华东我军大战孟良崮，基本粉碎了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其他战场，我军趁敌转入守势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敌人，开始了局部反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华东战场的作战。晋察冀我军响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加紧战斗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号召，先后于四月发起了正太（正定到太原）路战役，六月进行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北战役。青沧战役时，我带着军区政治部的文化科长高天辉等同志到第三纵队。先随七旅行动，协助做思想动员工作。战斗打响后，随九旅二十七团行动。我们了解到王三班战斗出色，追击敌人从青县追到沧县，歼灭、俘虏一批敌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便整理了王三班杀敌立功的典型材料。罗瑞卿政委在战役总结讲话时，引用了王三班的材料说明开展立功运动的重大意义。我军南下正太，东取青沧、再战保北，消灭敌人六万余人，控制铁路二百多公里，拖住了准备增援东北的关内敌人，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为了适应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需要，晋察冀军区决定建立野战军领导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飏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边区土地改革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为贯彻九月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于十月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在阜平县史家寨召开了边区土地会议。边区地委以上领导干部和各纵队的政委参加了会议，我们军区机关一些部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聂荣臻、彭真、刘澜涛同志主持，回顾了前一阶段土改情况，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确定军队参加土改，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边区土地会议期间，传来了清风店大捷和石家庄解放的喜讯：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于九月初再次向保北出击。十月中旬，在平汉铁路望都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一万四千余人，俘获敌军长罗历戎等。接着，军区部队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经过六昼夜的激烈攻坚战斗，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于十一月十二日解放了石家庄。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对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大胜仗，使边区军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加紧工作战斗，迎接更大的胜利。

三十三初到四纵队

在边区土地会议圆满结束，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九日，在晋县周家庄召开了有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土地会议精神，总结几次战役经验。

朱德同志、彭真同志及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萧克副司令员、黄敬副政委等都到会讲了话。晋察冀野战军的杨得志司令员作了军事工作总结，杨成武政委作了政治工作总结，罗瑞卿政委传达了边区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作了关于军队参加土改、整党及军地关系问题的报告。我当时还在军区政治部工作，参加这次会议，聆听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晋察冀军区为了适应今后作战任务的需要，着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有地方部队适当集中，将原察哈尔军区与冀晋军区合并为北岳军区；新建第六纵队，隶属晋察冀野战军建制；新建第一、第七两个地方纵队，分属北岳和冀中军区建制。这样，晋察冀军区有了四个野战纵队，两个地方

纵队，一个炮兵旅，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较一年前扩大近一倍，装备也有很大改善。随着部队的整编，不少干部的工作

岗位也有所变动，我从军区组织部调到第四纵队任副政委。

去四纵队前，野战军前委常委找我谈话。罗瑞卿政委、

杨得志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潘自力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首

先鼓励说，党组织是信任你的，可以放手工作。同时又都严

肃地指出我的缺点、弱点。罗政委说，一是工作局面不够展开，今后工作的面更宽些、复杂些，应多学习、多动脑筋，要有创造性，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二是原则性不够，和错误思想斗争的勇气不够，批评人不够严格，有时轻描淡写，今后要把握住原则。首长们还介绍了四纵队领导班子的情况，指出了应注意的问题。罗政委强调说，到了四纵队要协助王昭同志，做好政治工作。杨司令员指出，一个部队建立领导核心非常重要，四纵队的干部应当坚持好的，克服缺点，搞好团结；应在部队强调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指示，培养好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培养十二旅，提高十二旅的战斗力。野战军首长的谈话语重心长，使我对自己的缺点、弱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感到亲切温暖，深受教育，增强了到新的岗位做好工作的信心。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我来到了束鹿县南小城第四纵队司令部驻地。四纵队代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等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当晚，我

向纵队的几位领导转达了野战军前委常委对四纵队今后工作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野战军首长的关心，感到很高兴。大家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四纵队的主要情况和各旅的干部：十旅旅长邱蔚、政委傅崇碧，十一旅旅长李湘、政委陈宜贵，十二旅旅长曾保堂、政委李志明。第二天，我就到北小城政治部驻地，参加政治部机关的小组会，了解情况。晚间，参

加了政治部部务会议，研究李昌主任在全纵队连以上干部会上的政治工作报告。第三天，到范庄参加全纵队连以上干部会，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讲了几分钟话。接着，由李昌主任作政治工作报告，王昭政委作了形势报告。第四天，我到南白滩十旅驻地，参加全旅功巨大会。在我刚抓紧了解情况时，纵队接到了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新的作战命令。

石家庄战役后，蒋介石为挽回败局，在华北易帅，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

绥靖公署主任职务，任命傅作义为“晋察冀热绥五省剿匪总司令”，统一华北地区军事指挥。十二月一日，傅作义走马上任。他竭力吹嘘“将改取主动”，“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部收复，消灭共军武力！”他一面大量扩编保安团队，以代替正规军守备据点；

一面将其嫡系第三十五军等部七个师，自张家口调至平津地区，并将该地区的七个军又一个师编组为三个机动兵团，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方针，对付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确保其对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控制。

为了击破敌平、津、保犄角稳固防守的态势，打击傅作义部，钳制关内敌人，积极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晋察冀军区决定集中五个纵队和军区部队一部，发起新的保北战役。战役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全面破击平汉铁路北段和平绥铁路东段，孤立敌沿线各点；第二步，设法调动和分散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歼敌或围点打援的条件，寻机歼敌主力一部。

受领出击保北的战斗命令后，我们四纵队于十二月十七日召开了党委会，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曾司令员首先传达了军区、野战军的作战命令；唐参谋长讲了破交的注意事项；李昌主任讲了做好部队和参战民兵、民工的思想工作问题；我补充说，行军、破交、待机各阶段都应提出鼓动口号，激发部队的斗志。各旅的同志分别讲了完成此次任务的打算。最后，王昭政委作了总结。这次战前党委会，使领导同志统一了对傅作义上台后的形势的认识，既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又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同时，明确了作战部署和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会后，机关和各旅在一天内就做好了出发准备。

十九日下午四时，部队轻装出发，纵队领导随直属队行军六十里，当晚十时到达深泽东关宿营。随后四天，都是黄昏后秘密行军，夜行五六十里宿营。经过五女店、南王瞳、杨城南营、大栅营，二十四日，到达了中陶沈村。当晚，我们听取了马卫华，曾保堂同志的敌情侦察汇报。二十五日，纵队召集各旅旅长、政委开会，具体部署破交任务。

根据侦察，我纵负责破击的高碑店至徐水段的敌情是：徐水至北河口的守敌为九十四军第五师，其中固城守敌是十三团，徐水是十五团，北河口及大沟村是十四团及师部；敌一二一师师部及三六二团驻守定兴，三六三团守涞水，三六一团守高碑店；沿线守敌兵力两个师以上，另有敌十六军驻守新城。

针对敌之守备情况，我们作了如下部署：十一旅以一个团兵力箝制涞水、定兴、高碑店之敌主力，以两个团附五分区独立团及民兵团，破击固城至北河口铁路；十二旅附工兵营及民兵团破击徐水至固城段铁路，并伺机打掉田村铺据点；十旅为机动部队，以一个团到铁路东，伺机打下南旺东南的九集据点；各部队在破交时，寻机歼灭小股援敌，造成运动战的有利条件。

二十六日，各旅团在作行军小结的同时，展开了破击铁路的准备工作。

二十七日，是个阴雪天气，午后大雾弥漫，三、四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部队乘机展开。下午四时，纵队指挥部从中陶沈村出发，经曹家营到南旺村。下午六时四十分，破击战打响了。将敌据点分割包围后，部队、民兵、民工蜂拥而上，拆铁钉，掀铁轨，扛枕木，掘路基，割电线，炸桥梁，使铁路来个大翻身。经过接连三天的破交，我们四纵队终于将徐水至高碑店段的铁路全部破坏，使徐水、固城、北河口、高碑店等敌据点陷于孤立。

与此同时，二纵队在保定至徐水段，三纵队在高碑店至良乡段，也都展

开了破击战。三个纵队的几天破交战斗，彻底破坏了平汉线保定至涿县段，北岳纵队、冀中军区、冀热察军区部队在平绥路、津浦路上的破击战也马到成功。这样，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近四百公里的路段，被我军破击，平、津、保、张（家口）之间的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敌人发现我晋察冀主力进入平汉线平保段破击后，急忙命令准备增援东北的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新编第三十二师，及原在北宁线的暂编第三军，相继转向平汉线；并将在平、津、保三角地区布防的第十六军，收缩至新城地区。

野战军首长抓住敌已被我调动的时机，决心在易县地区与敌作战。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晚，我们四纵奉命转至易水河南岸，以防御姿态集结待命，并准备在运动中消灭可能出犯之敌。纵队指挥部于二日下午四时，由南旺转移到中陶沈村。

一月三日早饭后，曾司令员和王政委到野司开会去了，纵队领导只有我一人 在指挥所，了解部队掌握情况。十时左右，出现了严重的敌情：从北河口出来的一股敌人，向我三十三团白楼阵地及五分区独立团北辛阵地发动猛攻；固城、徐水之敌亦向我纵袭来；敌十六军约五个团兵力从涑水西南扑来，向我平岗、鱼底、章村、金台、小陈一线部队发动猛烈攻奇，我当即给十一旅旅长李湘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他们坚决顶住敌人的攻击。同时，命令十二旅部队出击，支援三十三团坚守白楼阵地，并令二十九团插到平岗以西，策应三十二团。敌人炮火猛烈，攻势很凶。十一旅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至晚上，我军主动撤出阵地，转移到姚村镇西南地区。纵队指挥部移至孤山村。

一月四日，敌人攻击我姚村镇及东西留村一线阵地，敌步兵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发起冲击。我军避敌锋芒，转向攻击仍龙华、固店、李家庄、马家庄的敌人，敌逃遁而去。

五日，敌又伸至李家庄、龙华一线。我纵队各旅上午作战斗准备，下午三时半从驻地出发，进至预定地域。当晚，以六个团的兵力包围攻击李家庄，并箝制龙华、鲜鱼一线及陈村、陈军营之敌。激战至第二天凌晨四时，我六个营的兵力先后突入庄内，但终因敌兵力过于集中，未能攻占李家庄、歼灭守敌。在这几天的战斗中，部队打得很英勇顽强，也受了一定伤亡。

由于敌狼集于涑鹿至徐水之间，不敢贸然深入，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改变原定的易县地区与敌作战的计划，以围攻保定之势，迫敌南下增援保定，分散敌人主力，创造歼敌机会。

野司于五日二十四时发布作战命令：第六纵队作进攻保定的准备；第二纵队在姚村、大王店、塘湖地区待机；第三纵队位于神石庄地区待机；北岳纵队位于涑（县）西、北地区继续破交，并寻求小的战机打击敌人；第四纵队转至徐水以南地区集结，配合二、三纵队打击向保定增援之敌，并待命挺进大清河北，扫荡王凤岗的河北省保安第七团。

六日下午五时，遵照野战军的作战命令，我纵转移到大王店以南地区。

第六纵队等部队攻击保定的行动，使傅作义急忙调兵遣将，敌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及第三十五军等部，匆匆南下驰援保定。但敌人行动快速，部署集中，仍未出现战机。

野司首长再次改变决心，于一月十日发布新的作战命令，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攻歼平汉线西侧重要据点涑水之敌，以第四纵队经保南挺进大清河北作战，配合涑水战役。

一月十一日，三纵队率先回师北上，打响了扫除涑水外围据点的战斗。敌三十五军急忙驰援涑水。三纵抓住战机，集中兵力，于涑水庄疃村全歼号称“虎头师”的敌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欠两个营）七千余人。接着，第一纵队一部又于北义安袭击了敌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当场击毙敌三十五军少将参谋长田世举以下二千余人，缴获汽车八十辆。敌三十五军遭此惨败，迫使敌军长鲁英麇自杀身亡。

敌第三十五军在涑水庄疃地区遭到歼灭性打击后，傅作义气急败坏，急令第十六军、暂编第三军、第九十四军及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自保定地区北援，再次集结于高碑店、定兴、涑水地区。针对敌情变化，野司决定以第六纵队再攻保定，以第四纵队继续向大清河北进攻，以图再次调动敌人。

一月十七日，我四纵队在独九旅及十分区部队配合下，经清河口进入雄县大云村。当晚九时许，抓住并歼灭了一股保安队，随即攻占雄县城。十八日至二十日，四纵各部队扫荡了咎岗、板家窝、岔河集、牛驼镇和霸县城等敌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土顽王凤岗保安团大部，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三个月所建立的“王凤岗式”的碉堡线，共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我纵在大清河北的攻势作战，迫使敌第九十四军、暂编第三军及第十六军向大清河方向运动。敌人往返调动，疲于奔命，我军胜利结束了破击平汉铁路北段战役，转入休整。

三十四新式整军运动

完成扫荡大清河北的任务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四纵队转移到安国县；一月二十五日，纵队指挥部驻于南王买。

在安国，部队深入地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是在我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开始大举反攻的形势下，在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和整党的重要时刻提出来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军将士提高军事艺术、提高觉悟性、提高纪律性。同一天，人民解放军总部还发布了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随后，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前委的部署，四纵

队在准备保北破击战时，已进行了整军动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平汉北线战役刚结束，晋察冀野战军就决定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军运动。二月十一日，我们接到通知，从南王买赶到定县北自井，参加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二月十二日，杨得志司令员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杨成武政委作了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的报告。接着，进行三天大会讨论。十六日上午，罗瑞卿政委作了总结。这次会议，首先总结了平汉北线战役，指出这是一个胜利的战役，表现在三个方面：抓住了关内敌人，使其不能支援东北，为东北我军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破坏了敌之交通，使敌陷于困境；歼敌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重创一 一师，这更是给刚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接着，讨论了开展新式整军问题，明确提出了部队应遵守执行的十二条纪律（战场纪律；内务纪律；管理教育纪律；革命军人道德纪律；爱护公物武器纪律；遵守军事机密纪律；坚决执行政治机关的命令指示、政府法令、政策；不侵犯群众纪律；严格入城纪律；遵守俘虏纪律），和十项制度（供给制度，民工运输力使用制度，处理俘虏制度，战地救护工作制度，报告与汇报制度，军械工作制度，收旧工作制度，人员调动制度，干部工作制度，点名与点验制度）。在这次会议上，罗政委强调了各级指挥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十大军事原则。罗政委还指出：“土地会议后，我们克服了许多不良现象，但不能估计过高”，“我们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克服一切地富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贪污腐化，贪生怕死，铺张浪费少爷派头，闹宗派地位，作假报告、造假成绩，阳奉阴违，要求恭维、拒绝批评，不能说坏、只能说好，自由主义，互相包庇等）”。罗政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强调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是三查的领导机构，应有领导的发动群众，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既要依靠贫雇农出身的骨干分子（但不搞单独的组织），又要团结其他阶级出身的同志；整军主要是查阶级查思想，不用“搬石头”的口号，这类问题只能采取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不许打人、捆人、关人、杀人；不轻易作组织结论，并保证当事人的申诉权；特务分子应交给专门机关依法处理，要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凡是自动坦白罪恶不大的一律不咎，放在随营学校甄别，不捉不杀，要捉要杀的必须经纵队党委报前委批准。这表明，当时野战军前

委对整军中避免发生“左”的错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深入三查展开三整的决定》。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后，野战军各部队的整军运动就全面展开了。

按照《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我党我军动员群众，打倒蒋介石的基本条件。因此，正确认识、积极支持土改，不仅是我们的部队应有的态度，而且是部队经受阶级斗争锻炼，提高阶级觉悟，增强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

响亮口号，准确地反映了部队与土改的关系。因此，四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也是从土改教育入手的。我们首先在各部队认真地传达全国和边区的土地会议精神，传达晋察冀中央局、军区及野战军前委关于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系统深入地进行了土地法的教育。同时，纵队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土改工作团，旅团组织了土改工作队，连队组织了土改工作组，在当地党委和政权机构的领导下，直接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通过土改教育和部分干部战士直接参加土改，部队受到了一次生动实际的教育，广大指战员加深了对土改重要性的认识，阶级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大家明白了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农村的恶霸、地主以贪官污吏为靠山，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农村封建势力的总后台，而农村封建势力，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根基。要打倒蒋介石反动派，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随着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广大指战员包括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同志，对土改运动的态度越来越端正了。

在进行土改教育的基础上，各部队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诉苦活动。各单位首先选择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进行诉苦，从而激起许多出身贫苦的干部战士争相诉苦。在大大小小的诉苦会上，有的控诉国民党政府实行残酷镇压的罪恶行径；有的脱去衣服，露出伤痕，历数家庭和个人的悲惨经历；有的哭诉父时遭残害，姐妹遭凌辱的血泪家史；有的解放战士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抢掠烧杀、涂炭百姓的累累罪行，有的连队把驻地的贫雇农请来同台诉苦。诉苦会上揭露的桩桩件件血泪仇，激起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极大悲愤。但是，光倒出苦水还不够，还需认清苦根，懂得苦从何来，仇向谁报。为此，各级党委和领导又引导大家算苦账，挖苦根，展开“苦从何来”、“谁养活谁”等问题的讨论，使广大指战员明白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认清统治阶级的享乐是建立在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在于此。从而使指战员们把个人的仇恨上升到阶级仇恨的高度，认清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地主同样狠”。也懂得了“亲不亲，阶级分”，“天下穷人是一家”。阶级觉悟的提高，促使干部战士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认清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诉苦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全纵队又以党员和干部为重点，进行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活动。在“三查”中，领导干部带头作自我检查。纵队领导干部都在党委扩大会议、交心通气会上，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并开展互相批评，作出鉴定。各旅团和直属队也是干部和党员首先作自我检查，尔后发动群众公开评干部、评党员。按照分工，我几次到十二旅三十四团和纵队直属队等单位，参加“三查”民主会，感到会开得很成功。干部、党员诚恳地欢迎战士、群众提意见，虚心听取批评，并公开进行检讨。有的检讨曾对土地改革有抵触情绪，有的检讨厌倦战争、怕苦怕累的享乐思

想；有的检查在胜利的形势下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有的检讨公私不分、缴获归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有的检讨打骂战士、损害群众利益等违反纪律问题。“三查”，使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来了个大曝光，受到了群众性的批评。干部、党员带头进行“三查”，带动了广大战士自觉自愿地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三查”犹如拂面春风，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巩固诉苦、“三查”的成果，又进行了“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纵队各级领导同志重点帮助问题较多的单位，按照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严肃又谨慎地处理了极少数人的问题。解决了存在的某些组织不纯、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使部队更加纯洁巩固。

在整军中，纵队党委还帮助各旅团建立健全一些规章制度。营一级普遍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各连改选了党支部，把党性强、作风好、受群众拥护的党员选为支部成员，并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使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加坚强。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使部队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战术技术。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对我军的巩固发展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三十五出击察南绥东

在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的新式整军运动即将结束时，军区和野战军首长已运筹了新的攻势作战计划。

针对国民党军华北“剿总”“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和重兵集结于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部署，军区和野战军首长决心避开敌之主力，向敌防御相对薄弱的平绥路东段和绥东、察南地区出击。这既可在察南、绥东地区打开局面，开辟新的解放区，还可致敌分兵，造成歼敌之机。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军区首长和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请示发起察南、绥东战役。第二天，中央军委便回电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在战役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朱德副主席多次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应“以主力展开于平绥路大同、北平线，大举破击该路，并准备向路北及冀东机动：以一部在三角地区机动。只有实施宽大机动，迫敌分散而歼灭之，才能克服敌人大量集中而不易割歼的困难”。同时指出：“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军委还指示部队不要怕远出作战、山地作战和人烟稀少没有后方接济的困难。这些指示，为晋察冀野战军出击察南、绥东指明了方向。二月二十八日，野战军首长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飏）颁布了作战命令：除以第七纵队位于保定地区机动迷惑敌人外，以第六纵队、北岳军区第一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分别由易县、曲阳奔袭绥东的天镇、阳高、并破击该段铁路，歼灭沿线守敌；以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组成右翼兵团，分别由定县、唐县、安国地区出击察哈尔省南部，攻歼广灵、蔚县等据点守敌，开辟新的战场，调动北平敌人西援，并寻机歼灭援敌。

三月三日，野战军首长和前委先后发布了《讨伐傅作义紧急动员令》和《致野战军全体同志书》，指出：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是一年多来人民革命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晋察冀野战军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号召全体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勇往直前，大量歼灭敌人，为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针对到敌区作战这一特点，野战军首长以命令形式颁发了十项《入城纪律守则》，野战军政治部颁发了十项《对待俘虏守则》，强调严格执行新区政策。

遵照野战军前委和首长的命令、指示，四纵队认真地进行了战前准备。纵队党委及各旅党委都召开了会议，明确任务，研究各种措施。通过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这次到敌占区作战的意义、有利条件和困难，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懂得了必须严格遵守供应就地取给政策、土地政策、城市政策等新区政策，增强了政策观念；明确了

做好随队民工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问题。部队求战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整装待发。

三月七日，按照作战命令，四纵队和几千名支前民兵、民工，从安国地区出发，沿着太行山东侧，穿越古老的内长城，浩浩荡荡向察南挺进。三月十五日，部队到达涞源以北中庆、黄郊、东西团堡一带集结，利用三、四天时间做战前准备。三月十九日，部队分别经曹沟堡及尹家堡，到达九宫口、北峪口地区。

一过南山隘口，映入眼帘的察南大地真是满目疮痍。察南位于察哈尔省南部，主要指张家口以南、京张铁路以西的广灵，蔚县、暖泉等地区。一九四五年冬，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七旅解放了察南地区。第二年冬，国民党军

队又侵占了这个地区，重新建立起地主恶霸的反动统治。他们猖狂进行反攻倒算。百姓惨遭血腥镇压，奸淫抢掠，有的村镇房屋被烧得荡然无存，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群众缺衣少食，受冻挨饿，生活十分困难。苦难的察南人民，眼望南山老区，时刻盼望解放军打回来。眼下见到解放军来到察南，纷纷前来哭诉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累累罪行。听了百姓的血泪控诉，指战员们义愤填膺，决心为人民报仇雪恨。大家抓紧时间，做好战斗准备。

二十日晚，察南战役打响了。左翼兵团首先向大同、张家口间的周土庄至永嘉堡一线展开攻击。

二十一日拂晓，右翼兵团也全线出击。我纵三十一团一营对已被包围的西河营之敌发起总攻，仅十分钟时间就突破前沿，经短时间战斗，就俘获二百余名敌人，占领了西河营这个军事要地。接着，又歼灭了代王城守敌。同一天，第十旅直逼蔚县，攻占了蔚县城东关、南关和城西南的李家堡，黄昏又夺取西关，歼灭了敌保警七大队大部。把敌补训第六师八个旅、保警七大队残部及其他地主武装共二千多人，紧紧包围在城内。蔚县位于张家口以南，是敌人在察南的主要据点，以它为中心，连接西河营、桃花堡等点，构成敌人防守察南的屏障，也是敌向南蚕食我解放区的前进据点。另外，蔚县的城墙高四丈六尺，宽一至三丈，比较完整坚固。城周围有三丈宽，二至四尺深的护城河。敌人妄图凭坚固守。

二十二日，纵队领导带领各旅首长，绕城侦察地形，选择了攻击方向，下达了任务：以第十旅由城南、城西两面攻击，第十二旅由城东和东北面攻击，第十一旅集结在代王城附近监视化稍营方向，准备打援。发起总攻前，我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各旅的迫击炮全部集中使用，野炮配属给主攻部队。各旅团领导带领营连指挥员进行了更详细、周密的侦察，确定了突破口，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和立功竞赛活动，开展了云梯登城、爆破城门等战前演习。

二十四日六时四十分，总攻开始。第十旅第三十团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由城东南角登上城头，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登城，并进

而向东门、南门方向发展。七时三十分至八时，我军在东、西、南三面城门爆破成功，各部队趁势向纵深发展，最后将敌人压缩在玉皇阁。战斗至九时，蔚县守敌被我全部歼灭。解放蔚县城后，我担任了军管会主任，发布了军管会布告，以安定民心，建立革命秩序。

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攻击也连连得手，捷报频传。左翼兵团攻占了阳高、天镇，右翼兵团的二纵队攻克了广灵、阳原、化稍营。自三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我左、右两兵团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解放五座县城、十一处重要车站据点，收复了察南广大地区。

我军出击察南、绥东，迫使傅作义急忙命令集结在平、津、保地区的敌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4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迅速西援。一时，张家口东、西地区集结了傅作义的大部分主力。为了打乱敌人“以主力对主力”的部署，使敌分散，以便创造战机，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左翼兵团西出绥远，吸引张家口地区之敌西援；右翼兵团在阳原、蔚县、吉家庄地区待机歼敌。我左翼兵团奉命西进，直逼归绥城，直接威胁傅作义部的老巢。敌慌忙将张家口地区主力向西调动。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命令我右翼兵团隐蔽北上，歼灭天镇、怀安地区敌暂编第四军的五个团。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出发。开进途中，天气骤变，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下起瓢泼大雨，浇得人们

睁不开眼睛；到了夜晚，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行动非常困难。指战员们只得手拉手、挪步移动在泥泞的小路上。这样，比原定四月七日零时发起攻击，延误了五个小时。敌人发觉了我军企图，弃城撤退，随即三纵队占领了怀安，我们四纵占领了天镇、谷后堡等地。

我军在天镇地区的行动，迫使敌人不仅急忙将西援归绥的三十五军等部掉头向东，还将在冀东的敌第九十四军主力西调至宣化、下花园一线。这样，敌主力又集结在张家口以西地区。我军在该地区已无好仗可打，遂告察南、绥东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半个月的战斗，我军在察南、绥东共歼敌一万八千余人，使敌后方交通陷于瘫痪，察南一万三千余平方公里地区的人民重获解放，敌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大同置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迫使敌人往返驰援，疲于奔命，无力支援东北敌军。敌人惊呼这是“决定华北命运的一战”。

察南、绥东战役结束以后，左翼兵团东返晋北扫除应县残敌，右翼兵团南调广灵、蔚县地区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并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恢复生产。

三十六挺进热西冀东

我们在察南地区休整时，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由陕北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先期率领中央工委来到华北的刘少奇、朱德会合，从此革命的指挥中心安到了河北省。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八月改称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任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下辖六个军区及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辖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纵队，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第二兵团辖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和炮兵旅，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听了这个消息，大家真高兴啊。党中央和总部来到华北，说明战争形势发展对我十分有利。成立华北党政军机构，是加强华北解放区建设，使其成为支援全国各战场的战略基地的重要决策。

华北军区成立不久，就发起冀热察战役。

向冀东机动，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目的是进一步牵制北宁路敌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

为此，华北军区决定采取及时分散、适时集中、大步进逼、远距离奔袭等手段，大胆深入敌区，袭扰歼灭敌人。并将在北线的第二兵团和第一、第七纵队分成东线和西线两个集团，以第三、第四两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共七个旅的兵力，组成东线集团，由杨得志司令和罗瑞卿政委率领，首先向热河以西地区推进，然后转向冀东，实施宽大机动作战，调动并寻机歼灭敌人；另以第六纵队、第二纵队主力及北岳军区第一纵队、冀中军区第七纵队，组成西线集团，由杨成武政委率领，留置平汉路以西，钳制内线敌人，策应东线集团在热西、冀东方向的作战。

为保证这次战役出击任务的完成，四纵队作了充分的准备。首先认真组织部队学习兵团发出的《为执行新作战方针告全体党员、全体干部、战士、民工同志书》，使全体同志认清到敌占区作战的意义和应作的思想准备，特别强调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强行军，不要怕吃不上饭，睡不了觉，要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去战胜困难，巧妙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通过教育，广大干部战士、随军民工斗志旺盛，信心百倍。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夜晚，四纵队和东线集团的兄弟部队，由蔚县地区出发，向热西、冀东挺进。十六日黄昏，我们在第二纵队第五、第六旅的掩护下，由怀来、康庄间通过平绥路。当晚，第十一旅三十三团与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相配合，一举攻克延庆县城，歼敌人百余人。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第四旅在越过平绥路途中，歼灭了在上店、下店妨碍我军过路行动的敌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两个团。

上、下店战斗和我四纵队的过路行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敌调主力尾随和拦阻我军。二十三日，第三纵队和第四旅机警地由沙城、土木间通过平绥路，于二十九日进到平承路怀柔以西黄花城、四海地区。我四纵队集结在平承路以西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地区，第四旅集结在汤河口以北杨木栅子地区。各部队立即展开战役准备。热西地区本来就地瘠人贫，加上战乱，

百姓生活极为贫困，甚至比我们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见到的群众还要穷，许多姑娘都没有衣服穿。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尽力救济老百姓。从我们纵队领导到每个战士，都拿出一点衣、物、粮食支援群众。这虽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群众非常感动，一再称赞人民子弟兵好，这使部队受到生动的教育。

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二日，我挺进热西各部与东北军区第十一纵队、独立第四、第五师相配合，向平承铁路鞍匠营（今滦平县）至怀柔段破击，斩断了敌人的交通，攻占了隆化、丰宁、鞍匠营、平泉等城镇，对承德形成了包围态势，严重威胁北平敌军侧背。敌人急调主力，由平绥线向平承线增援。这时，杨、罗首长决定将东线集团部队分成东西两翼，以第三纵队为西翼，把傅作义部主力吸引在平承铁路以东地区，第四纵队并指挥二纵四旅为东翼，以秘密迅速的动作，伸进到北宁铁路唐山、滦县以北地区，歼灭分散守备之敌。

第三纵队在平谷地区采取节节抗击的战法，牵住笨牛的鼻子走，与敌扭击七天之久，完成了钳制、消耗、疲惫敌人的任务。在第三纵队的掩护下，我第四纵队和第四旅由鞍匠营、古北口地区秘密向东挺进。

指战员们每人身负四五十斤被装，在烈日当空的炎热天气，经过五天艰苦的山地行军，于六月十日到达遵化东北地区。部队在这里隐蔽集结，严密封锁消息，侦察丰润地区敌情，分配作战任务。十一日夜间，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奔袭，连续行军二十个小时、一百三十余里。十二日夜，突然分割包围了丰润、任各庄、榛子镇、野鸡蛇等十二处敌人据点。十三日上午，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击，第十一旅、第十二旅三十四团攻击榛子镇。榛子镇在丰润城东约二十公里处，守敌系第一五一师的一个营和伪自卫队九百多人，设防坚固。我军以优势炮火和兵力，一举突破村沿工事，继以小战斗群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终于将敌人压缩到地道内，迫使其全部缴械。十四日，我第十二旅和第十一旅三十三团又以突然动作歼灭野鸡蛇的敌人。同一天，第四旅和第十旅三十团歼灭了丰润城、高丽铺等据点的敌人。十五日，第十旅又全歼任各庄守敌一个营。至此，我共攻克敌人据点十二处，歼敌五千三百余名，扫除了北宁铁路唐山至滦县段以北敌据点，直接威胁唐山市及北宁铁路。我在丰润地区的战斗取得胜利，使傅作义急调三河方向的九个师兵力向东驰援，企图与我决战。这时，我迅速撤出战斗，东转卢龙，迁安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我军刚到卢龙，老百姓就来说，范汉杰乘一辆铁甲车刚过去十几分钟，现在差不多到昌黎了，对没有抓住这次歼灭范汉杰的机会，大家都感到很可惜。

敌主力东调后，第三纵队乘敌兵力薄弱，攻克石匣、小营，并乘胜攻击古北口守敌，迫使向东增援之敌又向西调动。敌主力西调后，我四纵队和第四旅，配合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和冀东部队，向北宁铁路滦县、昌黎段出击。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纵行军一百二十余里，突然出现在昌（黎）、滦（县）线上，将各据点包围起来。二十四日拂晓发起攻击，经过一天半时间的战斗，攻克昌黎、安山镇、后丰台、石门镇等大小据点十处，歼敌四千八百余名。

我东线集团在热西、冀东一带实行高度机动作战，使敌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不断被歼。杨成武政委率领的西线集团则趁傅部主力转向东线，发起了第五次保北战役，取得了胜利。

历时两个多月的热西、冀东战役和保北战役，我军不仅取得了腰斩平绥、平承、北宁、平汉铁路，歼敌近三万人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拖住了傅作义集团、钳制了锦州范汉杰兵团，使他们不能增援东北敌军，这为东北我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十七到东北参观

在第四纵队向滦县、昌黎地区出击时，我奉命到了遵化马兰峪兵团指挥部。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罗瑞卿政委找我和三纵队副司令员王道邦谈话。记得大意是，华北军区组织一个参观团，到东北民主联军去参观、学习，王宗槐为参观团团长，王道邦为副团长，等干部到齐就启程。

兵团首长谈完话，我和王道邦商量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参观团编组、行动路线等。

参观团人员名单是兵团机关定的，共有七十多位干部，主要是第二兵团的，大都是营以上干部，部分是旅团军事指挥员，连同工作人员共九十多人。

七月上旬，赴东北参观团准备停当，便告别兵团首长，从遵化地区出发了。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三纵队攻克石匣时缴获的四台大道吉车，每辆车上坐二十多人。我们经喜峰口出长城，再经朝阳、富平、黑城，穿过草原，抵达通辽。这里是解放区。我们换乘火车，经南北城子、嫩江，到达齐齐哈尔；再经三棵树，到了哈尔滨。一到哈尔滨车站，就受到了东北军区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把我们安顿在马迪尔旅馆歇息：

第二天，我和王道邦同志到哈尔滨南岗东北军区司令部汇报，受到了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特种兵司令朱瑞等领导同志的接见。红军时期，他们都是我的首长，行军打仗经常见面；可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不在一个战略区，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久别重逢，彼此感到特别亲切。我们向老首长们汇报了参观团的来意。罗政委说：欢迎华北的同志来，欢迎你们来。你们想看什么，想了解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安排到部队去看。接着，刘亚楼参谋长给参观团的同志介绍了东北部队的情况，东北战场形势，及林彪战术要点等。当晚，军区举行欢迎会，罗荣桓、谭政、陶铸、朱瑞、杜平等首长都到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在哈尔滨参观了二、三天，就到部队去了。

先到了位于九台县的东北野战军一纵队参观。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接待了我们。当时，一纵队正准备参加打长春，我们参观团准备随一纵队参加战斗，以便在实战中学习。后来计划改变，先不打长春了。一纵队就为参观团组织了一次团级战斗演习。参观团旅团以下指挥员都跟着参加演习，实际体会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战术。接着，我们又到了吉林小丰满附近的六纵队司令部。司令员是黄永胜，政委是赖传珠。六纵队也搞了一次团的演习，是在吉林团山进行的。参观团的同志也跟着摸爬滚打。在六纵队，我们还参观了小丰满水电站。这里原先有十台发电机组，苏联人搬走了七台，还剩下三台。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发电站，感到很新鲜。

结束了在六纵队的参观活动，我们准备第二天就去七纵队参观。七纵队的司令员是邓华同志，很久没有见面了，很想去看看他。这天吃晚饭时，译电员给赖传珠政委送来一份电报。赖政委看完后递给我看。原来这是转来的华北军区的电报，大意是第三纵队政委胡耀邦调任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四纵队王宗槐调任三纵队政委。这样，就取消了去第七纵队参观的计划，从小丰满回到了哈尔滨。我们向罗荣桓政委和谭政主任汇报了参观的情况和收获。临行前，东北军区首长举行了欢送会。罗荣桓政委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非常谦虚的讲话。我也讲了话，主要是感谢东北军区首长和部队为参观团提供了方便，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好的作风，受到教育和鼓舞等。

告别东北军区首长，我们乘火车到了通辽。在这里换乘四台道吉车，经

郑家屯、阜新、黑城子、赤峰、隆化、鞍匠营，到达汤河口附近的第二兵团司令部。王道邦同志向兵团首长杨、罗、耿、潘，汇报了参观学习军事战术的情况，我作了补充。后来，潘自力主任主持召集了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干部会，让我讲讲东北的情况。我介绍了在东北的所见所闻，讲了东北工业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东北野战军部队多、装备好、士气高，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等。大家听到东北形势这样好，情绪很高。

过了两天，杨、罗首长找我谈话，说胡耀邦同志已经到一兵团上任去了，你快点去三纵队工作，要把在东北学到的好作风带去，把部队带好。我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首长的希望。

离开兵团机关，我先回到了四纵队，交代了工作就到三纵队去了。

三十八转战察绥

我从第四纵队来到驻在汤河口西北村子的第三纵队司令部。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王道邦、政治部主任陆平、副参谋长张挺等，向我介绍纵队的情况。一连几天，我走了机关，走了直属队，到了各旅，为的是尽快熟悉干部，熟悉部队。没过多久，传来了上级关于发起察绥战役的命令。

发起察绥战役，主要是为了配合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年。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已十分有利，东北战场尤为有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展开战略决战。中央军委赋予华北野战军的任务是：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拖住关内蒋系和傅系军队，使其不出关，以保证东北我军迅速歼灭敌人，解放东北全境。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第二兵团连同三个地方纵队，编组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欠第四旅）和第五纵队，并统一指挥晋绥军区第八纵队、内蒙古军区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北地区的部队，挺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在平绥线上拖住傅作义部主力，调动敌人向绥远转移，使华北之敌不出关、少出关。这是中央军委为配合解放东北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第二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下辖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并统一指挥冀热察的地方部队，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至北平线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另一部在北平至张家口线行动，配合第三兵团入绥作战。华北第一兵团仍在山西围歼闫锡山部。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九月上旬，华北我军发起了察绥战役。

九月五日，第三兵团与北岳军区所属的五个团，从易县、涞源出发，向绥远开进。

为掩护三兵团进军绥远，第二兵团在热西、冀东积极展开攻势。四纵队继攻克香河、武清之后，又在冀东军区十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于九月八日攻克三河。我们三纵队和冀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旅，迅速插向平承路密云、通县段及平北地区，形成了威胁北平的态势。敌急调第十六军、暂编第三军、第三十五军和新编骑兵第四师，分别由密云、昌平、延庆出发，向我三纵、四纵所在的平北地区连续发动进攻。我们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以顽强的作战，与敌扭击达五昼夜之久。二兵团在东线的激战，拖住了傅部主力，为三兵团于九月十三日顺利到达绥远腹地，完成战役展开创造了条件。

在华北我军的有力配合下，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以突然的行动，攻取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掐断了北宁路，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辽沈战役一打响，华北第二、三兵团更是全力引敌西进，迫使华北敌人主力离开北宁路，无力顾及东北战场。二兵团首先以四纵队主力迅速转向平承路，在顺义、怀柔破路断交，摧毁沿线碉堡，将敌第三十五军、骑兵第四师引向北面。我第三纵队则以七旅对付敌暂三军，八旅对付敌十六军，采用积极运动防御的战术，且战且走，诱敌北进。

十六日，敌暂三军分两路向我进犯，我七旅以第十九团第三营依托黑汉岭、第二十团第三营依托珍珠泉，抗击敌人的进攻。这两个营的指战员顶住了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直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杀伤敌八百余人。与此同时，八旅部队在大北湾、七道沟地区阻击敌第十六军的进攻，杀伤二百余名敌人后主动撤出战斗，继续向北引退。

九月二十日，敌暂三军和第十六军被诱至汤河口、宝山寺一线。敌人害怕诱入山中被歼，即于二十日仓皇南撤。

这时，兵团命令第四纵队十一旅尾追敌十六军，迫使其与暂三军脱离。我三纵队并指挥独一旅，以急行军转向敌侧后，埋伏在刘斌堡以东周四沟、九里梁地区，截歼暂三军。二十三日，敌暂三军第十、第二十七师进入伏击圈，我三纵七旅、九旅和独一旅全线出击。但由于山地进攻，动作不够迅猛，敌人迅速逃窜，我仅歼敌一部。

三纵队和四纵队，在平北崇山峻岭之中忍着饥寒困苦，转战半月余，歼敌虽只三千余人，但拖住了敌人三个军十个师，钳制了傅作义集团的主力，这既掩护了三兵团西进绥远，又配合了东北我军的作战。

当我二兵团在平北山区牵制敌主力时，第三兵团于九月下旬勇猛地扑向绥远腹心地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对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形成了包围。这使傅系老巢受到严重威胁，美国通讯社惊呼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傅作义为解归绥之危，慌忙命令被我二兵团牵制的第三十五军、骑兵第四师和张家口地区的暂编第四军等步骑兵十个师西援。这时，中央军委命令第三兵团缓攻归绥，主力返回绥东，进一步诱引西援之敌。

为配合三兵团的作战行动，我二兵团再向平绥铁路东段展开进攻。九月二十七日，第四纵队攻占北平以北的燕郊、白庙。我三纵队从雕鹗堡地区出发，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晚，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将新保安至康庄段的铁路、公路、桥梁完全破坏。然后进至杨家山地区集结。十月一日，敌军一部自沙城北犯。我七旅在杨家山一线阻击后诱敌深入。敌惧怕被歼，于黄昏前窜回沙城。当晚，我三纵部队查明敌暂编第三十一师二个团进驻宣化以东的贾家湾、贾家营地区。纵队立即决定以奔袭手段歼灭这股敌人。部队顾不上吃晚饭，就轻装前进，一夜急行军，赶了八十多里山路。翌日早晨，第七旅包围了贾家营，第九旅包围了贾家湾，第八旅进入东、西深沟一线，阻击宣化方向的援敌。经过短暂的准备，七旅率先向贾家营之敌第三十一师二团发起攻击。经三次突击攻入村中。与敌展开逐屋逐院争夺，歼灭大部分敌人。逃窜之敌，被我军第八旅部队截歼。接着，第九旅及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十团向贾家湾的敌人发起冲击，仅十分钟，就从四面一举攻入村内。各团穿插分割围歼敌人，经四小时激战，全歼敌人，在现场指挥的敌副师长被活捉。

第二兵团在平绥东线的行动，使傅作义害怕张家口失守，急忙将第十六军由平承路西调怀来，并令刚刚西援绥东的第三十五军等部回援张家口、宣化。这时，二兵团再次集中力量破击平绥路东段。我们三纵队的任务是破击怀来至宣化段的交通。十月七日，三纵队由赵川堡地区出发，到预定地域。九日夜，第七旅开始攻击沙城，歼灭敌守护第十一团一个营，随后攻占沙城。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在太平堡歼敌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个营。接着，在随军作战的民兵、民工配合下，连续突击三个夜晚，破击怀来至宣化段的铁路、公路。与此同时，第四纵队攻克了西拨子、岔道、青龙桥、八达岭诸点，破坏了宣化至南口间的交通。我兵团在平绥东线的破击行动，使北平至张家口段的交通陷于瘫痪，迫使敌人再次向该地区增援，以图恢复交通。十三日，三纵队乘机攻占了土木堡、新保安，并在鸡鸣驿、下花园阻击敌暂三军的进攻。十七日，第七旅以奔袭手段攻占涿鹿县城。

这时，傅作义为解除平绥路东线的严重威胁，以暂编第三军于二十日自

宣化向涿鹿方向进犯。二十一日，暂三军占领涿鹿，我纵第七旅主动撤到涿鹿以南的五堡、高堡和孟家窑以北一线山地阻击敌人，引敌深入。二十三日又引敌进至太平堡南山阵地，展开激战。我第八、第九旅乘机集结于矾山堡西南地区，准备围歼敌暂三军。

第二兵团在平绥路东线与敌扭击，将傅作义主力牵制在张家口附近。第三兵团大踏步地向绥西、绥北进军，解放了绥远大部分地区，使归绥陷于孤立。

华北第二、三兵团在察绥东西两线作战，互相呼应，密切协同，频频得手，使华北敌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根本无法抽兵增援东北，这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我军全歼敌人。

三十九保卫石家庄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平绥路南组织部队截击从矾山堡向平绥路回缩的敌暂三军一部。中午时分，郑维山司令员接到了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话。郑司令员接完电话，立即对我说：

“聂司令员电话传达周恩来副主席命令，要我们三纵队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四天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七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聂司令员还说，可走紫荆关，翻山抄近路，昼夜赶，不要怕疲劳。出动后，设法联络，周副主席等待三纵出发的消息。”

军情紧急。我们立即决定：放弃原作战计划，紧急收拢部队，马上准备出发。不一会儿，又接到了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派人送来的军委电报和附信。军委电报写道：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二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四百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五师已抵新城。估计二十七、二十八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二十九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七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罗耿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干明（二十六）日起，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相机过路，到后，或直插平琢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已直电三纵行动，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看了这份电报，我们对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破敌部署及三纵队的任务，更加清楚了。原来，蒋介石眼看在辽沈决战中的败局已定，企图乘我军在冀西、冀南、冀中空虚之机，调集两个军的快速部队偷袭我党中央驻地西柏坡，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以挽回他已经失散了的军心和民心，扭转已经走向失败的整个战局。我党地下情报系统及时获悉敌人的这个险恶阴谋，并报告了党中央。中央首长迅速作出赶调三纵队、紧急动员民兵和人民群众等周密的破敌部署。

纵队领导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军委、周副主席、聂司令员和兵团的指示通知各旅干部，立即收拢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与此同时，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深入各部队传达上级指示，搞好思想动员教育。军党委响亮地提出了“坚决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口号。

指战员们一听敌人妄图偷袭石家庄，突袭我党中央和华北领导机关，感到非常气愤。有的干部说：“蒋介石和傅作义想通过袭击石家庄挽回败局，完全是白日做梦！”许多同志表示：“疲劳牺牲何所惧，坚决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广大指战员群情激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了轻装出发的准备，各级后勤辎重，统统交由后卫跟进。下午三时，我纵从矾山堡出发了。

从矾山堡到满城，有五百多华里的路程，军委要求四天赶到，每天必须赶一百多里路。为了隐蔽，走的都是难行的崎岖山路。加上七个月来部队连续参加热西、冀东、察绥战役，征战七千余里，干部战士相当疲劳。我们

充分估计到这次行军的难度非同寻常。为了及时处置开进中出现的问题，郑维山司令员和我带着几个参谋走在部队前面。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谈笑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回头近看，干部战士个个面部表情严峻，流淌着汗水；远望，整个队伍象一条长龙，在起伏的岭间小道上蠕动和翻腾着。指战员顶着深秋的寒风，在暮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不少战士脚上打了泡，有的甚至化了脓，也不叫痛。大家都不愿掉队一步。一旦有人掉队，前后的战友立即挽扶着他跟上队伍，被扶的人总是不愿消耗战友的体力，自己咬紧牙关继续前进。在行进途中，我们收听到了两则新华社电讯。一则是新华社二十五日电《蒋傅匪军妄图突袭冀西老解放区》，一则是新华社二十七日电《保定线、正太线军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这两则电讯，对敌军的偷袭阴谋作了详尽的揭露，对我军民的歼敌准备给予充分肯定。这使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各级领导和政工干部，不断地在队伍中穿行，轻声鼓动，慰抚着精疲力尽的战士。队伍中没有人叫累，没有人喊苦，只有一个钢铁般的决心：尽快赶到目的地，坚决保卫党中央。

三纵指战员心中想着党中央，最高统帅部更是密切地关注着三纵队的行动。后来得知，在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四时半至七时的两个半小时里，周恩来副主席三次向毛主席书面报告三纵行动的情况。

第一次是四时半，周副主席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三纵连二十六号在内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他说以五天赶到，每天已将近百里，我要他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三纵司令），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四天行程赶到。七纵主力今二十七日夜到达完县、方顺桥、高阳以西之线布防。军区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两线，以待三纵到达。其他一个旅，则尚在来沙河途中。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三纵。三纵今（二十七日），可能赶到紫荆关以北。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

六时，周副主席又向毛主席报告：“主席：三纵昨二十六日上午方得到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总须下午才能出发，俟叫通电话后，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

七时，周副主席再次向毛主席报告：“主席：顷与聂电话，三纵昨天多部分时间，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问题。今天，得催其三天（今天起）赶到满城当更会白天走。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命令，已告，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望都、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九地委在直接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县，则由四地委在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萧克指挥。聂经过他们三处，与各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路要点及纵深的破坏情形与民兵日夜的袭扰。聂总认为如三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临敌三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

部队昼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路程，走了二百七十余里，终于在二十八日下午翻过紫荆关，作第一次休息，准备天黑后继续赶路。

这时，郑司令员电话向聂总报告了部队到达位置，听取了聂总的指示。郑司令员对我们说：“聂总说：周副主席刚来过电话，问你们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你们提前到了，我立即向他报告。部队要恢复下体力。聂总还说：周副主席昨天向毛主席报告了三纵出发的情况，主席很满意。主席指示你们过紫荆关后，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主席的意思是说，白天视度好，要你们尽可能地加快速度。聂总还讲：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

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七纵和九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三十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听了毛主席、周副主席、聂总的指示，感到最高统帅部对三纵的行动十分关注，我们决不能辜负中央的期望，一定要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我们迅速向部队传达上级的指示，作了简短的动员。黄昏时，部队继续赶路。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先头部队到达满城西南的康关，这里到望都不到八十华里，部队作短暂休息。此时又转来军区电话，说周副主席再次问三纵能否如期到达，并告诉我们：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和十六军已出动，今晚可到保定。军委已令二兵团主力南进，要三纵与七纵会合后正面阻击敌人，准备与二兵团主力南北合击打一个大歼灭战。

歼灭进犯之敌，这是最富有诱惑力的动员令。任务传达下去，部队立即活跃起来，几昼夜行军的疲劳为之一扫而尽。有的猜测歼灭战在什么地方打，吃掉哪股敌人；有的计算里程，提议强行军，提前与七纵会合；有的还送来决心书、请战书，要求担任最艰巨的战斗任务。看到群众情绪这样高涨，斗志如此旺盛，我们决定再次轻装，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望都。指战员们听说再次轻装，组织强行军，主动丢下了背包、米袋及各种生活用品，只带着枪支弹药，天一抹黑就飞快上路了。一路几乎是小跑步。终于在三十日拂晓，提前一天到达望都。

在三纵紧急南下同时，二兵团主力也在快速南下。第七纵队和地方部队、民兵，在军区和当地党委领导下，在保定南北，在清风店，在唐河地区，节节抗击，有效地阻滞了偷袭之敌。

我们刚到望都地区，敌九十四军右翼已突破了望都防线，正向唐河南犯，我七纵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唐河到沙河四十五华里，沙河到石家庄只有一百华里，如敌突破七纵在沙河防线，将对石家庄造成严重威胁。我们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沙河一线，会合七纵，坚决把敌人阻在沙河以北，部队不怕疲劳，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向沙河疾进，终于在三十一日凌晨，赶到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地域。先头部队一到，即与七纵联络。我们向聂总报告了情况，聂总在电话里非常高兴地说：

“你们主动赶到了敌人前面，很好！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九十四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韩迪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四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聂总的话，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部队昼夜兼程四天半，跑了六百多里路，为的就是粉碎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现在这个日的完全实现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部队迅速传达着，指战员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第二天上午，部队不顾疲劳，着手准备围歼敌人。这时，传来了突袭之敌已全部回窜北平的消息。新华社又发表了《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电讯，无情地嘲讽“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谋，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已经枯竭了的兵源、财源，又丧失官兵二千七百余。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以及其他大宗的作战物资。尤其不妙的是，本已离散了的军心，更加涣散。”“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场，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听了这则电讯，真是人心大快，士气大振。后来我们才知道，新华社揭露蒋傅军偷袭石家庄的三则电讯，都

是毛主席撰写的，是鼓舞军民，粉碎敌人阴谋的有力武器。

四十激战新保安

粉碎了敌人突袭石家庄的阴谋以后，三纵队随兵团移到曲阳地区休整。没过多久，便接到了准备参加太原战役的命令。

在纵队领导研究准备工作时，郑维山司令员对我说：“王政委，你一年多没回家了，这次部队去打太原，刚好路过平山，你先走几天，回家看看。”这样，我就先走了一步。

我刚到平山住了一天，骑兵通信员就送来了郑司令员的一封信，告诉我部队行动有变，立即赶回纵队。赶到曲阳，就参加了兵团召开的干部会议。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传达了军委十一月十八日的电报：为着不让蒋、傅两系军队从平、津、张、唐逃走，已令三兵团停止攻击归绥，并将其三个纵队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止傅部向绥远逃跑；又令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早日逃跑；二兵团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兵团首长讲话都详细分析了形势，强调各纵队要做好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经过这次会议，我们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认识更清楚了。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展开的形势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运筹着伟大的平津决战。毛泽东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分析了傅作义、蒋介石、美国三方的矛盾，利用傅作义对是守、是逃、是西逃还是南逃举棋不定的心理状态，制定了抑留华北敌军于平、津地区，不使敌人南逃西窜，将敌就地全歼的基本方针。

兵团的会议刚开完，我们纵队党委就立即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布置任务。特别要求各旅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因为连续征战，部队相当疲劳，必须认清形势，克服松劲情绪，方能担负起艰巨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兵团通报杨成武等同志领导的三兵团，已向张家口附近开进，准备围攻张家口，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其向东逃跑。

第二天凌晨，我们接到兵团的电令：“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进至涿县、涑水以西地区待命。”平张线要打响了的消息在部队一传达，指战员们情绪特别高涨，立即整队出发。我们赶了五天路程，刚到涑水集结，兵团就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于十二月一日由易县、紫荆关地区向宣化、下花园开进。

原来，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三兵团先后攻占了张家口外围的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重要据点，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

三兵团的这一突然行动，使时刻不忘西窜的傅作义极为惊慌，他急令驻守丰台的敌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火速西援张家口。三十日下午，郭景云就带着两个师赶到了张家口，并连续向万全、洗马村我军阵地反扑。

在三兵团和敌人反复争夺张家口外围阵地、进行激战时，我们二兵团正昼夜兼程取捷径向涿鹿、下花园前进，但因山路狭窄，崎岖难行，未能按时赶到下花园附近。

十二月四日，傅作义发觉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命令三十五军火速赶回北平。同一天，毛主席在十九个小时内连续给二兵团发来三封电报，一次又一次命令二兵团全速赶到宣化、下花园一线，务必抓住三十五军，使其不能东逃。

六日，敌三十五军突破三兵团阵地，沿平绥线东撤。为了抓住三十五军，中央军委严令二兵团加速前进，务必迅速占领下花园一线。部队顶着寒风，

破冰下水，徒涉大洋河，不顾一切地往前赶。但是，敌军还是越过了下花园。在这紧急时刻，一直在新保安附近执行牵制任务的四纵队十二旅，接到三兵团的急电，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将三十五军阻击在新保安，为兵团主力赶到争取了时间。

我纵以强行军向新保安疾进。各级领导不断地进行鼓动，激励大家拼命赶路。兵团罗瑞卿政委骑着马来到我们面前，大声说：“要快追啊，谁放跑了三十五军谁负责啊！我们要向军委负责，你们也要负责啊！”这使我们更加感到任务紧急，责任重大。大家不顾疲劳，奋力地向前赶，七个小时赶了四十公里路程。八日凌晨，我们终于赶到新保安镇外，四纵队十旅、十一旅和八纵队也赶到了。各部队立即准备对付敌人的突围、果然，天刚蒙蒙亮，镇子东边枪炮声大作，敌人拼力向东突围，四纵部队进行顽强阻击。我们一面组织部队加紧修筑抗击工事，防止敌人从南面突围，一面密切注视周边的动向。

上午，接到了侦察分队的报告，说沙城以西地区有零星的枪声。我们分析，敌三十五军被围在新保安，傅作义必定会派援军接应；如怀来的敌一四军、十六军西出接应，将对我包围新保安的部队构成严重威胁仍因此，要准备对付来自东面的援敌。下午三时许，再次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大股敌军在土木以南沿乡村土路向西运动。这表明，接应之敌正秘密地向新保安东面四纵队的防区靠近。我们立即打电话向四纵队领导通报了敌情，并询问沙城地区有无四纵部队。四纵的同志回答，他们正在阻击三十五军突围，沙城地区没有四纵部队。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必须立即派出部队，阻击向新保安增援之敌。

就在这时，收到了兵团的电报：军委已严令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敌三十五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要我们确实包围着敌三十五军于现在地区，并隔绝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任。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执行兵团命令的问题。如果机械地执行，就按规定坚守南面防区，不管从东面袭来的增援之敌。那样，增援之敌就可畅行无阻，长驱直入，直捣四纵侧后，四纵将腹背受敌，处于危险境地；敌三十五军极可能突围跑掉，整个作战计划将受到严重影响。若将三纵部队调到东面，南面一旦被敌突破，我们的责任就非同小可。但是，我们认为，作为战场指挥员，应该敌变我变，灵活地执行上级命令，把作战的重点放在对全局最有意义的动作上。阻击接应之敌，正是为了确实地围住敌三十五军，实现不让敌跑掉这一目标。因此，我们立即决定向兵团建议，三纵派部队东出阻击援敌，可是兵团的电话一时联络不上，这真急人啊！我们当机立断，一面向兵团报告，一面立即调整部署：九旅两个团加七旅一个团仍留在新保安南面，防备新保安之敌突围；九旅抽一个团，既作为围城二梯队，又作为打援的机动力量；军主力立即向东推进，以七旅（欠一团）迅速占领沙城以东地区，为阻击援敌的第一梯队，八旅为阻击第二梯队，军指挥部预设宋家营。这样，东可阻西援之敌，西可援四纵阻敌三十五军东突；也可对付敌人从南面突围。

任务下达后，打援部队顾不上吃饭，即于下午五时轻装出发了。各营连在行进中以“飞行会”的形式进行动员。虽然连日行军，不少同志脚上打泡

化脓，但为了阻击增援之敌，不让三十五军跑掉，大家咬着牙拼命向前奔跑。

纵队领导始终随先头分队行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应付突然事件。当晚十时许，先头分队刚到达宋家营村西侧，突然遭到敌人的枪击。七旅二十团一营一连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掩护部队展开。我们从敌人用炮火轰击判定，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当即作出部署：七旅担任正面阻击任务，二十团为第一梯队，以第三营抢占碱滩，并在碱滩与马圈之间构筑第一线阵地；第七、第八连以碱滩为依托构筑第二道防线；第一营在掩护第三营展开后，构筑起三道防线；第二营占领马圈村。七旅另一个团为一梯队的预备队，迅速占领吴家堡、王李房、张家房及附近有利地形。八旅抢占沙城，击敌侧后、配合七旅正面阻击。并令九旅旅长带一个团占领马圈与新保安之间的东八里、良田屯、吴家堡、东阳庄等点，作纵深阻击部署。纵队指挥所设在沙城西南一个便于观察沙城、碱滩两处战况的小高地附近。

部署完毕，各部队迅速按预定任务，到达指定位置，连夜抢修工事，准备第二天的一场恶战。

九日七时许，敌一四军一个营向我二十团第三营警戒阵地发起进攻，最前沿的第九连在营教导员亲自指挥下，利用近距离突然开火，打乱敌队形，将敌击溃。接着，又连续击退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的多次猛攻。随后，敌与我反复争夺碱滩阵地，我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多次反复，形成了血与火的拉锯战。下午三时许，敌再集中约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碱滩三线阵地猛烈攻击。新保安敌三十五军也拼全力向东突围。两敌互相呼应，东突西进，再有七、八里路，两敌就可会合在一起向东突围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们给各旅下了死命令：“阵地不能丢，碱滩不能丢！”“各级领导要靠前指挥，坚决打退敌人！”二十团团团长张文萱到了前沿，指挥全团作战。干部战士跃出战壕，端着刺刀，喊着杀声，冲向敌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斗到了白热化程度。这时，我们命令第九旅杜瑜华旅长率两个营，自马圈两侧投入战斗，配合二十团实施反冲击；并令八旅部队由沙城突击敌人侧后。各旅部队勇猛地向日军冲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纷纷溃退至乔家营、宋家营地区。敌三十五军也被四纵部队击退，缩回新保安。当晚，三纵队再次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准备粉碎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后来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已赶到平绥线，在康庄歼灭了准备西援的敌第十六军大部，迫使第一四军慌忙撤退，在逃窜中被东北野战军歼灭。

碱滩阻击战，不过是平津战役中的一个战斗，但它对贯彻抑留华北敌人、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确保将敌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起了积极作用。为此，兵团来电嘉奖三纵队主动阻击敌人取得胜利。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杨罗耿三四两纵昨（九）日击退东西两面之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我军在平张线的作战，歼灭了敌第十六、第一四军五个师，并将敌第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包围在新保安，将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军部和七个师（旅）包围在张家口，控制了南口、八达岭，迫使敌人将天津、塘沽区的一些部队调到北平以西地区。这一仗，打得敌人不能东逃，也不能西窜，抓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为我东北主力入关分割包围平、津、塘地区敌人赢得了时间，取得了战略上的第一个胜利。中央军委特致电嘉勉，指出这“对大局极为有利”，“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

这时，东北四纵队正赶往张家口，加强三兵团对张家口的包围。吴克华、莫文骅同志带部队路过三纵司令部时，兵团罗瑞卿政委专门从新保安北面的东山赶来，表示欢迎。罗政委还请吴克华、莫文骅同志留下一个炮兵团打新保安，他们愉快地答应了。这加强了我们的炮火力量。

敌三十五军突围不成，即转入防御状态。二兵团严密包围了这个敌人，并作好了一切攻击准备。部队的求战情绪极高，一再要求早日打下新保安，消灭三十五军。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毛主席就战役方针和部署致电平津前线指挥部，要求对被围之敌暂缓攻击，两星期内“围而不打”。这主要是怕被围之敌都打掉，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从海上逃跑。到了二十日，东北野战军全部完成了对平、津、塘的战略包围，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华北第二兵团遵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的指示，对新保安之敌发起攻击。

新保安是察哈尔省的一个重镇，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北依平绥铁路，筑有较强固的城堡。敌三十五军一万九千多人，突围不成转为固守，日夜构筑工事，将城墙构成三层火力点，城下构筑了暗堡，城西水温庙、和尚庙和城东南菜园构筑了外围支撑点。

针对敌人的部署，兵团决定四纵由城东、东南面实施攻击；八纵一部由北面攻击；三纵七旅从南面攻击，九旅从城西北面攻击，八旅在城南大黄庄地区为预备队。我们纵队指挥部设在新保安西北的山上，这里可清楚地观察到北面、西面、南面的情形。

二十一日十四时，围城部队开始扫除外围。二十二日七时，六颗信号弹从新保安西北方向骤然升起，围歼三十五军的总攻开始了。兵团炮兵团和二十四队属炮兵营连，集中在东南和西北方向一齐猛轰，新保安淹没在浓烟烈火之中。经一小时炮火准备，围城部队发起冲击，九时许，四纵部队从东南面首先攻入城内，勇猛地向纵深发展。三纵、八纵部队也相继攻入城中，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向西压缩，迅速将敌分割围歼。战至十七时，敌三十五军一万九千余人全部被歼，敌军长郭景云开枪自杀，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军”彻底覆灭了。

固守新保安的敌人被歼后，张家口的敌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仓惶出逃，被三兵团及东北四纵队全部歼灭，张家口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二十四日，中央军委致电华北二、三兵团首长：“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部队受到嘉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时，我们接到了就地休整后西进，夺取大同、归绥等地的命令。休整工作还未部署下去，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大同之敌准备逃跑，二兵团改变休整十天计划，立即西进包围大同之敌。

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纵队从琢鹿出发，沿桑干河北岸，经化稍营、阳原、许家堡、三十里铺向西急进。指战员们冒着风雪严寒，沿着崎岖山路，日夜兼程，三天时间走了四百八十里路。前卫部队于二十八日赶到大同郊外，迅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纵队指挥部到达阳原地区。

这天夜里，我和郑司令员住在一个房子里，正商量着大同前线的作战问题，就接到了兵团的电报，命令二兵团各部队东返北平郊区；参加平津会战。

中央军委决定二、三兵团投入平津方向，是为了以绝对优势兵力，严密包围、彻底歼灭平、津之敌。

部队一听说要参加打北平，情绪更加高涨，迅速将包围大同的任务移交给北岳军区部队。十二月二十九日，部队大踏步地向东开进。经过一周时间的快速行军，我们三纵队各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前后到达昌平地区，纵队指挥部驻在小汤山。

在这里，我们开展了解放北平的动员教育和战斗准备工作。七旅在温泉开了誓师大会，杨得志司令员到会讲了话，部队情绪非常高昂。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不久，纵队指挥部转移到海淀。在清华园看地形。这里地势高，可以看到西直门、德胜门。七旅在新北京（公主坟以西）一带，八旅在门头沟地区，九旅在玉泉山。兵团指挥部在西北郊大有庄（现中央党校附近）地区。二兵团的任务是从西北面攻城。三纵为兵团第一梯队，在德胜门及两侧担任主要突击。明确任务后，部队积极进行攻城准备。反复进行爆破、登城、街巷战斗、步炮协同等演练。派出侦察分队深入平郊侦察敌情，司令部作战科长原星带着一个参谋、化装成菜农，混进德胜门，摸敌情，看地形。同时，部队进行了入城政策纪律教育，强调严守纪律，尽量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进入京郊后，还组织部队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师生进行联欢活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对稳定民心起到良好作用。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解放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

天津、塘沽一解放，就使北平的二十多万蒋傅官兵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他们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历史的潮流，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我党的不断政治争取下，傅作义等认识到，只有接受和谈条件，接受和平改编，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中共和谈代表和傅方代表的谈判磋商，一月二十一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

议》。

从二十二日开始，北平守军以师为单位撤离市区，到达指定驻地接受改编，隶属三纵队建制的是独立第四十六师。我们在海淀接待了该师师长，该师开到石景山磨石口接受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城内的国民党军全部开出城外进行改编。这一天，我军先头部队从西直门进入城区，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古城能在战火纷飞的严重关头完整无损的保存下来，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英明指挥，也归功于北平市人民和地下党组织及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百万官兵的出色斗争。傅作义将军毅然选择和平解放的道路，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进驻北平古都的人城式。这是北平历史上空前隆重热烈的一天。雄壮的入城式再次宣告：古都北平新生了！新中国快要诞生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了！。

四十一会攻太原城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三纵队在海淀、石景山、门头沟一带进行战后总结和休整。

这时，全军遵照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和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整编指示，开始使用新的番号。我华北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分别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直属中央军委；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我们三纵队隶属第十九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我任政委，易耀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龙道权任副政治委员。原所属各旅，依次改为第一八七、第一八八、第一八九师。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委刘光裕，第一八八师代师长张挺、政委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在整编中，我们还根据华北军区命令，分别组建了山炮营和迫击炮营。这标志着六十三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发展。

在休整期间，我们认真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以及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联系实际，解决部队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同时，我们还奉命派出第一八七师五六团，到西柏坡担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卫任务。我们军领导叮嘱带队的第一八七师参谋长杨尚德和五六团团长江文萱、政委刘水，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地完成警卫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全会的绝对安全。这个部队的指战员尽心尽职，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七届二中全会胜利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杨尚昆同志同杨尚德、张文萱、刘水同志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情谈话。总司令高兴地说：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了，你们这个部队的素质很好，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这个团就要归建了。我军要向全国进军了，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全部消灭阎锡山的军队，解放太原；再消灭胡宗南的军队，解放西安；然后再向大西北进军，消灭马步芳的军队，解放兰州。尔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新疆进军，二是进军四川。你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要准备执行这些任务。总司令还希望战士们不要怕离开家乡，要树立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的思想；要准备对付新的困难，靠我们的革命传统去战胜困难。最后总司令还深情地说：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我们的革命斗争不能停，革命传统不能丢，要发扬我们好的传统和作风，把革命进行到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朱总司令的谈话，传到我们军后，指战员们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党中央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彻底埋葬蒋家王朝。

三月十四日，我们奉命开赴太原前线。四月三日，到达山西榆次地区。这时，华北三个野战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几十万大军，汇集在太原城郊，准备“瓮中捉鳖”。

太原，山西省省会，古为晋阳，又名并州，位于晋中平原北部，濒汾河东岸。太原又是重工业城市，拥有数十座钢铁厂、机械厂和兵工厂，能制造山炮和多种兵器。封建军阀阎锡山独霸山西、实行法西斯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对太原更是苦心经营。他们在太原城周围修筑了五千多个碉堡，环以外壕、劈坡和各种障碍物，构成几十处所谓“要塞”据点。大量的碉堡、“要塞”据点和野战工事，构成完整的集团防御体系，号称“百里防线”。他妄

图依托这条所谓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永远做土皇帝的美梦！

四月上旬，各军的主要领导来到榆次以北一座山村里，参加太原前线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在会上，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和周士第、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耿飏、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彭总是三月二十八日由中央驻地返回西北途中来到太原前线指挥总攻太原的，因当时徐向前司令员正在病中。在会上，彭总首先讲话，他宣布了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天焕、陈漫远、胡耀邦等八位同志，组成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徐向前为“前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接着说：我这次来太原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为学习攻坚战的经验。解放太原是我军极其重要的一个攻坚战，祝你们打漂亮仗。二是来带兵的。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同意解放太原后将十八、十九兵团调西北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彭总的讲话振奋人心，大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劲儿。

随后，罗瑞卿同志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情况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二中全会关于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重大决策，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等精辟论断，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在会上，周士第副司令员通报了前一段同阎锡山作战的情况和太原敌情。

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针，确定了总攻部署；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从城南和城西进攻南区和西区守敌；二十兵团和晋绥军区第七军一个师，从城东北和城西北进攻北区守敌；十八兵团和第七军主力，从城东进攻仓库区，并配合十九、二十兵团进攻东南区和东北区守敌；第一、三、四炮兵师支援各军作战。我们第六十三军的任务是：首先集中兵力由南面突破，夺取东南外围要塞双塔寺，尔后从首义门和城东南角突破，直指钟楼街敌伪省政府。

参加总前委扩大会议受领任务后，我们就赶回军部，组织各师师长、政委和炮兵团的同志，登上东山勘察地形。东山高出太原城五百米，可以俯瞰全城。我们着重看了我军的攻击目标双塔寺。双塔寺又名永祚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二公里处，是城东南的屏障。这里是阎锡山防守太原的“生命要塞”之一，是敌东南防区指挥部所在地。在这块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域，守敌布设了三层防御工事，筑有四十八个碉堡和山炮阵地，还有大面积的布雷区，东西南三面环以沟壑，构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区。双塔寺的守敌为四十三军军部、暂编第四十九师及第七十、七十二师各一部。看了地形，我们更明确了，要想顺利攻进太原，必须将敌军主力歼灭在外围。

接着，我们召开了军党委会，认真研究了作战部署和战前准备问题。为了确保外围歼敌成功，我们决定：投入足够的兵力，以第一八九师为主攻，第一八七师助攻。攻城时，以第一八八师为主，一八七师助攻，第一八九师为二梯队。明确任务后，我们提出了“必须争取军政双胜”，“打好华北最后一仗，为人民立新功”的号召，要求各师搞好战前动员，开展立功运动。

军党委会一结束，各部队便展开了紧张有序的战前准备工作。政治部印发了战斗动员令，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动员教育，着重讲清打

好解放华北最后一仗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树立“打下太原城，为民立新功”的决心和信心。全军上下掀起了练兵热潮。各级指挥员深入前沿看地形、摸敌情，选突破点和运动道路，并在沙盘上演练指挥，组织步炮协同动作。各师根据太原敌人炮多、地雷多、碉堡多和城墙又高又厚的特点，特别重视打碉堡群和登城墙的战斗训练。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召开“诸葛亮会”，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想出打碉堡群和攻城的好方法。

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解放太原后，中央军委致电太原前委：“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四月二十日凌晨五时，我军发起了扫荡太原外围的战斗。太原城外炮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我军首先集中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敌炮兵群，有效地压制住敌炮火，随后各路大军实施勇猛穿插，连续突击，横扫敌外围据点。

我们六十三军的一梯队第一八九师，在十九日深夜就悄然出击。该师以第五六五团在左，由许坦向椿树园、狄村方向突击；以第五六七团在右，向千家坟、千佛寺、南什方院方向突击；第五六六团为二梯队。第五六七团二营六连趁黑夜突破了敌前沿阵地，直插十二号主碉后侧。二十日凌晨外围战斗打响后，预先埋伏在敌碉前沿的三连，在六连配合下，向十二号碉发起强攻，经过连续爆破，终于攻克了十二号碉堡，打开了通向纵深的缺口。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后，与第五六六团密切配合，攻占马庄，歼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七时三十分继续向纵深发展，连克“地下城”、千佛寺、闫家坟、南什方院，到达双塔寺以南地区。第五六五团突破敌椿树园阵地后，向千佛寺、狄村攻击前进，配合第六十五军攻占狄村，歼敌第七十三师一部，旋即再占轩岗村，插入双塔寺西南地区。第五六六团也进至双塔寺以西地区。与此同时，我第一八七师五五九团经马庄，连续攻占了王家坟和郭家坟；第五六团攻占了松树村及松树南沟。战斗进行到下午三时许，我军对双塔寺的合围态势已经构成。随后，第一八七师五六团和第一八九师五六七团各一部直插郝庄、安善园一线，切断了敌之退路。第一八九师五六六团从西、西北面，五六五团从南、西南面，第一八七师五五九团从东、东南面，第五六团从东北和北面包围了双塔寺的敌人。

包围双塔寺后，我敌工部门曾给敌四十三军军长兼东南防区总指挥刘效曾写信，劝他放下武器，但被拒绝。这样，我们就下令做好一切攻歼准备，就地歼灭双塔寺守敌。各级指挥员连夜到前沿察看地形，观察敌情，就地明确攻击任务；部队抓紧改造地形，逐段构筑交通壕，并扫除外围一些点碉，打通冲击道路。二十一日夜，我五六六团控制了双塔寺西南面三口饮用水井，并趁敌恐慌之际喊话劝降，使防守西南角外壕的一个连投降，阵地被我占领。第五五九团在攻击双塔寺南面十三号碉堡时，用喊话劝降，争取了一个排长率百余人跑来投诚，向我提供了敌防御弱点。突击部队连夜将四百斤炸药置于敌人外壕内。为我军第二天连续爆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部队的攻歼准备就绪，我们下令于二十二日六时，向双塔寺阵地发起攻击。六时始，六十三军的全部炮火一齐怒射，敌阵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碉堡大部被摧毁了，敌炮兵阵地被打烂了，敌设在双塔寺上的观察所被打掉了，连敌指挥部也挨了炮弹。在炮火的支援下，我步兵四个团从四面发起攻击。第五五九团利用头天晚上放置的炸药，实施连续爆破，仅用了三分钟就从东南角突入敌人阵地，占领了十三号、十四号碉堡，夺取了冲击核心工事

的通道。第五六团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东北角的梅花碉。旋即，这两个团向敌核心阵地发起猛攻。敌人的兵力和火力被吸引过来了。这时，从西南角突入的第五六六团、五六五团趁机迅速向纵深发展。从四面突入的我军四个团，象四把锋利的钢刀，一块块地割歼守敌。敌人鬼哭狼嚎，纷纷沿交通壕逃命。我军指战员怒吼着冲向敌核心工事。五六六团九连连续突破两道外壕后，让俘虏带路，沿着暗道插向敌指挥部所在地——寺院。七连三排突破一道外壕后，也在俘虏的引导下突破第二道外壕，歼灭阻挡之敌九十多人，迅速突入敌指挥部。该连七班占领了敌炮兵阵地。八班在教导员崔凤岐和班长段光喜带领下，由俘虏指路，从暗道直插敌指挥部，活捉了敌中将军长刘效曾等一批指挥官。敌指挥官被俘，群龙无首，更加乱成一团。我军乘胜快速割歼敌人。七时三十分结束了战斗。仅用一个半小时，太原东南要塞双塔寺就被我军攻克，毙敌五百七十五人，俘敌军长以下官兵四千二百多人，缴获火炮一百一十九门，机枪一百八十九挺。

我军第一八九师、一八七师在双塔寺激战时，担任攻城任务的第一八八师已奉命向城垣推进。二十一日夜间，攻占了农业试验场和晋兴实业公司；二十二日夜，歼敌一个营，攻占正太饭店和天主教堂，拔掉了首义门前的碉堡群，扫除了攻城障碍。与此同时，刚刚完成攻占双塔寺任务的第一八七师，也向城垣逼近，攻克了东岗营盘、面粉公司、山西饭店，占领了攻城出发阵地。这时候，各兄弟部队的外围作战也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已将敌主力五个军部、十四个师，即太原守敌80%的兵力，歼灭于外围，从四面逼近城垣。

部队逼近城垣之后，加紧进行攻城的准备。我们军领导带着师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前沿勘察地形，对攻城的方案又作了仔细的推敲。我们确定，第一八八师加强兵团炮兵团、第四野战军炮一师榴弹炮营、军山炮营、工兵营及第一八九师各团属迫击炮连，在大南门（不含）以东至首义门（含）地段，担任主要攻击任务，第一八七师在首义门以东至东南城角间攻击，第一八九师为预备队。同时，强调各部队精心做好攻城准备，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二十三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我军解放南京的喜讯传到太原前线，指战员们一片欢腾，战斗情绪极为高昂，个个磨拳擦掌，等待总攻号令。

四月二十四日拂晓，我军阵地上显得异常寂静，指挥员们带领观察员凝视着天空，战士们在交通壕里手握钢枪，两眼紧盯着前方，炮兵已将炮弹填入炮膛，炮口瞄准了敌人阵地。在军指挥所里，我们静候着攻击命令，只有参谋们忙着用电话了解各部队的准备情况。

五时三十分，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太原前线一千三百门大炮齐声怒吼，炮弹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方向城垣砸去。霎时，地动山摇，太原城头火光浓烟冲天而起，炸起的碎石、水泥块如浊浪排空向四处飞溅。我六十三军集中各种口径的火炮百余门，轰击一八八师下面四百米的突破地段，打塌了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突出部，打开了一个十多米宽的缺口，打掉了城墙上的大部分火力点。左翼的尖刀连——第五六三团一连，于五时五十分发起冲击。战士们高举红旗，端着刺刀，象离弦之箭一样向突破口猛冲过去。六时十分，第一突击组由第十三号突出部的缺口登城成功，战士刘庚武将红旗插上了太原城头。接着，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一连和三连迅速向两翼发展，连续击溃敌人十四次反扑，掩护全团主力登城。第五六三团主力登城

后，以一个连向大南门以北猛攻，配合六十五军作战，主力即跃下城墙，除留一部巩固已得阵地、配合一八七师作战外，主力沿首义门大街、红市街西侧向纵深发展进攻。

我第一梯队突破后，我们军前进指挥所移至十二号突出部城头。为迅速扩大战果，我们命令一八八师二梯队五六四团投入战斗，沿海子边、三圣庵向北进攻。投入纵深战斗的一八八师三个团，象三把利剑，沿鼓楼大街、首义门大街、三圣庵三路向敌人心脏刺去。

然而，一八七师五六 团在城东南角的突破并不顺利。由于炮兵未能打开缺口，所架云梯又被敌打断，爆破未获成功，造成攻击受阻。为了迅速进城，即令五六一团从首义门突破口入城，沿城墙接应五六 团，他们一路冲杀，歼敌千余人。不久，五五九团和五六 团也攻入城内，并向红市街方向攻击前进。随后，第一八九师五六五团也入城作战，向鼓楼和绥靖公署方向发展进攻。

六时十分，右翼尖刀连第五六二团第六连也登上第十二号突出部，连续打退敌人五次反扑，巩固了已得阵地，迅速向东发展，在胜利门附近遭敌火焰喷射器袭击，二十余人被烧伤。在这危急关头，二排长芦万通和一排长王小四脱去着火的棉衣，喊着杀声向敌人冲去，用手榴弹将敌击退，并缴获了火焰喷射器。六连突破后，第四连趁机从第二个突出部登上城头，一部插入纵深，迅速占领了邮政局敌第十五兵团部，并由里向外攻击首义门。六时十五分，担任助攻任务的第五六二团一连登上首义门，并迅速占领了西南角卧虎碉。六时五十分我军完全占领首义门。

尖刀连攻占首义门后，第一八八师五六二团、五六三团主力如决堤的汹涌浪涛涌上城头。

与此同时，各兄弟部队从各个方向相继突入城内，各路大军勇猛穿插分割歼灭敌人，迅速向敌伪首脑机关攻击前进。突然，我们接到报告，第一八八师第五六三团三连缴获了三辆坦克，现乘坐坦克向伪省政府冲击。十时许，我各路大军占领了敌绥靖公署、省政府，攻城战斗完全结束。

十二时，各攻城部队撤到太原城外，城内的警备任务由晋中军区部队负责。

会攻太原一仗，我军全歼敌二个兵团部、一个省保安司令部、六个军部、十六个步兵师、三个特种兵师，共八万余人，活捉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和日寇今村、岩田等战犯，特务头子梁化之畏罪自杀。太原的解放，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的三十八年反动统治彻底结束。

四十二新的征途

打完太原战役，第十九兵团移到太谷、祁县地区进行休整。我们六十三军驻祁县地区，军部驻南社村。

四月底，我们军以上干部参加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五月一日，彭总和与会的同志合影留念。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得知，中央军委已于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命令，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迅速由晋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回到军里，我们首先组织部队进行太原战役总结。在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郑维山军长作了参加太原战役的总结报告。我们军在这一战役中共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及装备物资，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军三百多名指战员鲜血洒在双塔寺下，洒在太原城头，这些英烈中，有五五九团政委孙应前同志。军表彰了“攻克要塞开路先锋连”、“立功太原连”、“猛夺首义门连”、“猛虎连”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接着，我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进军西北的指示。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飏同志代表总前委和兵团参加了总结会并讲话，他对六十三军圆满完成作战任务给予鼓励，勉励部队再接再厉，在进军西北作战中再立新功。会后，全军投入了进军西北前的军政整训工作。

华北全境解放后，在一些同志中，出现了不愿离开华北老家，怕去西北作战、怕过艰苦生活等思想倾向。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进军西北作战。因此，军党委要求各部队在整训中，首先抓好以大进军为中心内容的动员教育工作；并于五月初召开了六十三军首次文艺工作者大会，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做好大进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各部队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围绕大进军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关系，大进军同我军肩负历史使命的关系，大进军同个人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引导大家认清战略决战后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追击的新阶段，树立向全国大进军，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并运用新式整军的经验，发动群众进行回忆、算账的活动。回忆，主要是通过回忆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历史，回忆六十三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史，更加坚定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信赖，做到党中央、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诉苦算账，就是通过算自己的苦情账，算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账，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全部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解放，从而树立起打出华北去、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树立起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思想。针对进军西北路途遥远，敌情地形生疏，新区群众条件较差，作战条件艰苦等特点，我们还教育部队树立必胜的信念，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跑路，不怕翻山越岭，不怕远距离追击迂回包围敌人，不怕连续作战。此外，我们还特别强调进军西北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后，要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坚决服从和听从指挥，搞好与一野兄弟部队的大团结，决不允许发生有碍团结、破坏团结的行为。

经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向西北大进军的动员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部队的革命精神普遍增强，斗志旺盛，集体和个人普遍订了立功计划，开展立功竞赛活动。

关于这次动员工作的情况，我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对健全党委

制、加强纪律性等作过一系列指示和明文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各军党委书记，每逢双月要自己动手给中央写一份综合或专题报告。我到三纵队任政委、党委书记以来，写过几次报告，有的是二千多字的专题报告，有的是三四千字的综合报告，都是反映部队中心工作的。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写起来感到比较吃力，但还是老老实实遵照中央的要求，自己动手写。自己选题目，找材料，动手写。文字上，找宣传部长路扬和秘书辛克顺一顺。这样给中央写报告，不但促使自己调查研究、学习和思考，有利于干部成长，而且督促下级及时真实地向中央汇报情况，有利于中央了解下情、正确作出决策。向中央写报告的制度，我记得在建国初期还坚持了几年，好处很多。

整训期间，我们军奉命撤销原来的供给部和卫生部，编组了后勤部，由萧大荃任后勤部长，旷显阳任政治委员，李继生、宋麴、郭传镜任副部长，李乘风任副政治委员。军后勤部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大进军的物资保障工作，而且标志着军的后勤保障向正规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军还组建了炮兵团，各师的炮兵连扩编为山防炮营。炮兵团、营的组建，标志着军的炮兵部队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我军兵员也得到了补充，部队齐装满员，士气高涨，只待一声令下，即可挺进大西北。

在出发前几天，我忽然接到罗瑞卿政委的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去一趟。到了兵团，罗政委告诉我，中央决定调他到公安部工作，由李志民同志接任兵团政委。我说：同志们都很留恋，真舍不得您走。

罗政委说，你们进军西北任务不轻，一定要把部队带好，打好仗，为西北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贡献力量。

我当即表示：请首长放心，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后来我知道，罗政委在将要离开十九兵团时，同不少领导同志都交谈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良好的领导作风，他对这支部队的深情，和对同志们的关心、爱护；也反映出当时的上下级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的指示，各野战军迅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全国大进军。

遵照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的指示，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先后奉命出晋入陕，执行向大西北进军的任务。

第十九兵团出发前，兵团首长令我和第六十四军副军长唐子安，带领少数同志先期赶到禹门口，组织一个渡河指挥部，具体安排兵团渡河西进。我们立即出发到了禹门口，展开了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六月五日，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和兵团机关先后从驻地出发，陆续来到禹门口，从这里渡过黄河。全兵团渡过黄河后，我就回到六十三军。我们经韩城、澄城、蒲城，于七月五日到达陕西省富平、三原地区。

在出晋入陕的长途进军中，我们受到了晋中、晋南、陕西人民和当地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所经过的城镇、村庄，到处都搭起欢迎的牌楼，张贴欢迎的标语。记得有一个大牌楼的右联写着“解放大西北”、左联写着“活捉胡宗南”，上联写着“向胜利挺进”。

第一野战军对华北部队更是照顾周到。早在太原战役结束时，第一野战军首长专门发布了关于与华北兄弟部队会师的指示，宣布了与兄弟部队团结的八条守则，这就是：

一、虚心学习兄弟部队的各种工作经验。

二、诚恳给兄弟部队以各种可能的帮助。

三、态度和蔼。谦虚真挚，不得骄傲。

四、一同作战时，要密切联络积极主动配合，不争夺俘虏，不争夺缴获。

五、行军相遇，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要主动让房，不争借家具，不争相用品，不争用粮食。

六、倾听兄弟部队的建议和规劝。

七、对兄弟部队个别人员有意见，须经过组织提出，不得背地议论。

八、对兄弟部队的伤病人员、失联络人员，要妥为救护招待，送回原部。

这八项团结守则，一野各部队都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教育，真正做到了尽人皆知。这使我们很受教育。我们也严格要求部队做好团结工作。因此西北部队和华北部队关系融洽，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

到了陕西，部队先作短暂休整，各级领导忙着了解敌情和下一步作战问题。

七月六日，兵团首长赴西安参加第一野战军总前委会，受领了作战任务。

当时西北的军事形势也对我十分有利。在我军胜利渡江、太原解放、开始向全国大进军时，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惧怕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一野首长抓住战机，于五月中旬发起陕中战役，二十日解放省会西安，继而解放了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胡宗南部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这使青宁二马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为挽回败局，两马令马继援率领所谓援陕部队，联合胡宗南部共计二十余万兵力，于六月九日和十日开始向一野部队大举反扑。我军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迟滞胡马反扑，等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聚歼敌军。现在华北两个兵团已经到了，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原来的十五万人增加到三十四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四十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敌强我弱的状况，西北大决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西北敌军的总兵力虽然还有约四十万人，但布防于陕西中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大地区。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连续遭到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减弱；而青宁两马是西北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两马主力，只要青宁两马主力被歼，西北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但是，敌我力量对比，我只占相对优势，不能采取一举聚歼，只能采取分割聚歼。为此，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先解决胡宗南部。根据这一方针，一野总前委决定首先以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撤至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部主力；以第十九兵团进至乾县、礼泉、口头镇及其以北地区，阻击青、宁两马的增援部队。对于钳马，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毛主席发来电报：“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彭总也特别强调：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两马的任务，千万不可有轻敌情绪，要严防他们绕到背后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七日，一野政治部发布了《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接着又发布了《对西北回民及胡马匪军口号》、《切实优待回民战俘各项守则》。

根据总前委和兵团的部署，六十三军各部队展开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着重研究马匪军的战术特点，进行对付骑兵的训练。随后，在兵团编成

内，于七月十日按时进入指定地域，以第一八七师、一八八师在礼泉以北和东北一线，第一八九师在口头镇以西及西北一线，边修筑工事，边制造发起进攻的声势，迷惑两马。

七月十一日，我军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开始向扶眉地区敌胡宗南部发起攻击，两马惧怕被歼，始终未敢南援。至十四日，扶眉战役顺利结束，我军共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八座县城，控制了秦岭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与两马联合作战的企图，更加孤立了青、宁两马。这一胜利使西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决战的主动权。

扶眉战役之后，胡宗南残部退守秦岭一带，青马撤至灵台、崇信、陇县地区，宁马退至长武、泾川地区。为了挽回败局，两马制定了平凉决战计划，妄图凭借龙山、六盘山、华家岭一带天险，背靠兰州，扼守平凉，阻挡我军西进。

敌欲与我决战，这利于我聚歼。第一野战军首长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胜举行打马战役。

七月十九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貌镇南面的文广村召开作战会议，我们军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野的首长、各兵团的首长；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首长、老战友，心情非常高兴。彭总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首先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他说，这是我们同胡、马匪军决战的第一个回合。接着讲，毛主席最近发来电报，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打马战役，是决战的第二个回合。彭总在详细地分析敌情后，提出了钳胡打马的平凉战役作战计划。他指着地图下达了作战命令：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钳制胡宗南军，阻击其可能增援，保障我军后方的安全；同时以三个兵团及第六十二军进攻平凉。各兵团的任务是：以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两侧向长武、泾川地区之敌进击，尔后夺取平凉；以第一、第二兵团为左翼，第一兵团并指挥第六十二军沿千阳、陇县、华亭大道进攻，第二兵团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阻击兰州、固原方向援敌，配合第十九、第一兵团共同完成歼敌于平凉的任务。第十九兵团以第六十四军为前梯队，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并指挥骑兵第二旅沿泾河北岸向镇原西进，六十三军主力随兵团西进。

经过几天紧张的思想动员和民族政策教育及各种准备，我们六十三军于七月二十一日由乾县、淳化地区出发，向平凉挺进。我军的一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沿西兰公路两侧滚滚前进，使百姓振奋，敌人害怕，一传十，十传百，都说华北部队的大炮特厉害，一打就是几十里。我军所向披靡，沿途敌人闻风丧胆，主力纷纷撤退，少数地方土顽不堪一击，不是被歼就是逃路。第一八八师及骑二旅二十四日占领旬邑、世店镇；二十六日冒雨急进，强渡马连河，二十七日攻破正宁县，歼敌四百余人，并解放正宁县城。与此同时，我第十九兵团主力长驱直入，收复彬县，灵台、长武后，进至平凉以东地区。左翼第一、第二兵团也于二十五日攻占陇县。

这时，青、宁两马见我大军压境，更是各怀鬼胎，都想保存实力，宁马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向静宁退却。我一野首长判定敌人已放弃所谓平凉决战计划，改为各保自家，节节抗击，迟滞我军西进。便立即将原定在平凉决战一举歼敌的作战计划改为分路追击、各个歼灭的方针。二十七日，我们接到命令，第二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第一、第二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

左翼第一兵团和第七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歼灭扼守陇山要隘固关镇之敌青马骑兵第十四旅；右翼第二兵团二十九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和化平；陇东地方部队于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庆阳和西峰镇；七月三十日，十九兵团解放平凉、镇原。这时，青马向华家岭西窜，宁马主力向任山河、固原方向撤退。十九兵团首长命令六十四军直奔固原，断敌退路，同时命令我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和骑二旅迅速转向任山河方向，配合六十四军歼敌。三十一日凌晨四时，一八八师冒雨从镇原出发，踏着泥泞山路急行军一百五十里。第二天赶到任山河地区时，第六十四军已将敌第八十一军、第十一军击溃，并歼敌五千余人。八月二日解放固原，十一日进至黑城镇、海原、预旺堡地区。八月六日，第十九兵团主力进至静宁、隆德、固原地区。二兵团解放通渭。

陇东追击战中，我各路大军连续行军七百里，直入甘肃腹地，青、宁两马被分割，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的攻击之下。这对敌人妄图固守西北、西南，保住这一最后的反革命基地的梦想，是又一沉重打击。

四十三兰州决战

我军陇东千里追击，分割青、宁两马，敌人既极为恐慌，又不甘心失败，他们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敌人企图以青马节节抵抗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然后凭借兰州坚固的防御阵地，与我对峙，消耗我军，趁我军久攻不下，粮弹俱缺，兵疲力乏之际，让宁马和胡宗南残部击我侧后，将我军围歼于兰州外围。

第一野战军首长审时度势，判明青马若窜回青海老巢，则不利于我军聚歼，敌扼守兰州对我极为有利。因此，制定了力争同青马在兰州决战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解放兰州。这样，西北问题即可基本解决了。

八月四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第一兵团（欠七军）并六十二军为左路，直取西宁，截断青马退路。第二兵团为中路，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第十九兵团主力为右路，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六十四军控制固原地区，对付宁马对兰州青马的援助行动；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在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八月八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兵团按照八月四日命令执行兰州战役计划。

八月九日，我们六十三军为兵团右梯队，从固原出发，沿西兰公路北侧，向兰州前进。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翻越六盘山。越往上空气越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这时队伍中不时传来宣传队员的鼓动声：“红军能过六盘山，咱们今日有何难！”“一滴血、一滴汗，过山就叫马匪还！”

炎热的夏天，行军在气候干燥的西北高原，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有时见到路旁有一滩泥水，人和马轮着喝，有的同志干渴得实在走不动了，不得不喝自己的尿。宣传队的同志嗓子眼干得冒火，仍站在公路旁，敲着洋瓷碗，嘶哑着嗓子起劲地鼓动：“开展互助不疲劳，争挑担了抢背包，你追我赶快步走，不怕于渴路途遥。叫声同志仔细听，立功计划要记牢。千里行军歼马匪，争当英雄立功劳！”战士们咧着干裂的嘴唇，向他们报以微笑，脚步迈得更快了。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见到了西路军失败后散落在那里的老红军战士。我和郑军长商量，在了解清楚后，给困难特大的老红军战士一点接济，每人给二三个光洋。这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谨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

指战员们克服行军中的种种困难，以旺盛的斗志前进。八月十二日，我军解放了会宁，十三日，占领西吉。

八月十五日，我们接到兵团的命令，以四天行程进至预定集结位置，迅速侦察兰州情况，待命攻击。根据这一指示，八月十六日，我们在会宁对各师下达作战命令。十九日，我军到达兰州东南的定远镇地区。二十日，一八九师到达金家崖、岳家巷道地域。部队一到预定地区，就开始了攻城的工作。

兰州是甘肃省会，是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为国

民党统治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又是扼制青海、河西走廊、宁夏的枢纽。兰州北濒黄河，东、南两面山峦叠嶂，形成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国民党军在这里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国防工事。狗娃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窰家山、十里山等山岭上，筑有大量钢筋水泥碉堡群，朝外有四五米高的人工削壁三道，削壁外又有宽深均为三四米的壕沟，并附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御设施。为此，敌人曾称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马步芳视兰州决战为性命交关的大事，加以周密部署，派其精锐第八十

二军、第一二九军和国民党三个保安团，凭坚固守，以图伺机反扑。胡宗南和宁马则准备配合青马袭击我侧后。

八月二十日，我们接到野司下达的战斗命令，各军于二十日拂晓向兰州发起攻击。我们第六十三军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城东要点十里山和城南要点窦家山，尔后从城东关突破，协同主力攻入城内。军在金家岸设了指挥所，这里可观察到十里山和窦家山的情况。决定以一八七师攻击十里山，一八九师攻击窦家山，一八八师为预备队。当晚，各师按预定方案向指定地域开进。二十一日拂晓，一八七师首先对十里山发起攻击。战至第二天上午九时，五六团才突破了敌第一线阵地。敌集中火力封锁突破口，并以一个营的兵力赤膊上阵，挥着战刀，连续疯狂反扑。我突入的分队终因兵力不足，第二梯队遭敌火力封锁支援受阻，被迫撤出阵地。

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对沈家岭、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等阵地的攻击，亦都受到挫折。

这时，我们接到了兵团转来的彭总的命令，全线停止进攻，迅速进行阵地总结。

这两天的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憋了一肚子气，我们的心情很不好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第一位的工作，是要吸取教训，振奋精神，把士气鼓起来。我们军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和政工干部深入部队，特别是到伤亡较大的部队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二十三日，彭总和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来到我们六十三军前沿阵地视察，并就地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总结了初战受挫的教训。

彭总说：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是仓促了点。部队试攻受阻的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情的目的，对下一步的战斗是有利的。当前大家要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做好充分准备，打有把握之仗。彭总说：兰州决战事关西北解放的全局，一定要不惜代价拿下来。窦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把它打开。

彭总还说：十九兵团六十三军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拿下窦家山。你们这里不是有个红三团吗，在哪里？

我们答道：是一八九师的五六六团，这个团能打山地战。

彭总说：好嘛，就叫他们上！

彭总最后又强调说：马步芳的部队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它要有充分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躁。进攻中，须有强大的预备队，组织对付敌人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以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

杨得志司令员也指示我们：按照彭总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首长的指示，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我们立即组织各部队展开紧张细致的战前准备。

根据野司和兵团的指示，我们军调整了部署，将主攻方向选为窦家山，以第一八九师加强兵团炮兵团、军炮兵团和军工兵营，强攻窦家山；以第一八七师用积极手段佯攻十里山，牵制敌人兵力，保障第一八九师侧翼安全；以第一八八师为第二梯队。

我们军的领导带着一八九师的干部，到前沿仔细地勘察窦家山的地形，

选择突破口，现地研究打法。窦家山，位于兰州东南二十里处，东连十里山，西接古城岭、马架山，海拔两千零八十九米，山势陡峭，成七十五度斜坡，易守难攻。山上筑有以地堡群为核心的坚固工事，还有外壕、交通壕、暗道，纵横交错，绵绵相连，最外面为地雷群和铁丝网，防御体系极为严密。窦家山是兰州东南的重要屏障。防守这一地

区的敌人是马步芳的“王牌师”——第八十二军一百师二团和嫡系警卫部队青海保安第一团。这伙敌人受马匪反共宣传和宗教迷信的影响很深，加上重金收买，是一伙亡命之徒，惯于打近战。我军初攻受挫后，他们的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竟狂妄地叫喊：“十万人也攻不上窦家山！”经过仔细察看、研究，大家的一致意见，把突破口选择在主阵地一号阵地上，这里是守敌两个团的结合部，既是弱点，又是要害部位，一旦攻上去，就可动摇敌防御全局。

确定战斗部署后，一八九师召开了师党委会，传达了彭

总、兵团首长的指示和军的部署。一听彭总亲自点名决定五六六团担任主攻团任务，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纷纷表示：“保证拿下窦家山，砸开兰州东大门”，“坚决消灭马匪军，为解放兰州、解放西北杀敌立功！”他们详细分析了敌情、地形、作战部署，研究确定了战斗方案。接着，各团分别召开党委会，连队召开支委会，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和战前准备，对

突破口、进攻道路都进行了现地察看，反复在沙盘上研讨战

术和战斗动作，做到了想得周到，练得认真。五六六团和五

五六团冒雨挖工事，构筑了几百米的交通沟，把部队冲锋出

发地、各种自动火器，统统推进到敌人阵地前，为突然发起

冲锋创造了条件。担任突击队的五六六团三连，召开了誓师大会和授旗

仪式，进一步激励斗志。

在三天准备中，一八七师、一八八师和炮兵团等部队，也都非常认真地进行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做到了斗志旺盛，准备充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总攻前一天，我们军的几位领导，再次分头到各部队，对各项准备工作又作了一次检查。

八月二十五日，野司规定的总攻时间到了。十时二十分，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强大的炮兵开始向敌人阵地猛烈轰击。兵团炮兵团和军炮兵团，集中炮火射向窦家山上的敌人阵地。仅仅三十分钟的炮火急袭，敌人的前沿阵地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十时五十分，炮火刚一延伸，主攻团突击队——五六六团三连，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前沿。红旗引导炮弹走，战士跟着红旗冲，步炮密切协同。只用了十五分钟，尖刀连就突入一号阵地；一阵猛打猛冲，攻下三个碉堡，打开了突破口。这时，彭总打来电话，热情地鼓励说：你们打得很好，步炮协同好。原来，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突击部队的战斗动作。看到了窦家山上的红旗。

三连突入敌阵地后，敌人疯狂反扑。突击队集中自动火器一阵猛打，击退了敌人。突然敌人上来了督战队，用就地枪决的手段迫使溃退的敌人又冲了上来。突击队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反复争夺阵地。战斗进行到十二时三十分，我突击队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全部占领了一号阵地，红旗手周长顺英勇地把红旗插上了窦家山主阵地。三连刚一突破，一连、二连紧跟着突上了一号阵地。一营的三个连队紧密配合，巩固阵地，并迅速向二号阵地展开攻击。

这时，担任右翼突破的五六五团七连，不顾敌人三面火力封锁，在炮火的支援下爬陡坡、攀削壁、跨外壕，连续攻克敌人明碉暗堡，于十三时攻占了三号阵地。

一号、三号阵地被我突破后，敌人极为恐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冲击，妄图夺回阵地。对此，我们早有准备。我们命令一八九师迅速调整战斗部署，以八个营梯次连续投入战斗的打法，保持强有力的后劲，坚决歼灭敌人的反冲击部队。

午后，敌“王牌师”组织了大刀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向我突击队发起疯狂的反扑。

在一号阵地，约一个团的敌人袒胸露臂，举着大刀，凶神恶煞般地向我阵地扑来。五六六团团团长立即呼唤炮火支援，我军几十门大炮齐声怒吼，以密集的阻拦炮火射向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呜哇乱叫，抱头回窜。不一会儿，大刀敢死队又在督战队的手枪、刺刀逼迫下冲了上来。严阵以待的我一营，所有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血流满山，尸横遍野。但仍有一股亡命之徒象潮水般地冲到了跟前。指战员们端起刺刀，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这关键时刻，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直接给潘永堤团长打电话说：“我看到了，你们打得很好，要给你们请功！你们一定要稳住阵地，打退敌人的反冲击！”“彭总也在看着你们，表扬你们打得好！”我们也及时打去电话，称赞他们打得好，要求他们不仅要打退敌人，还要消灭敌人。这使阵地上的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大家越战越勇，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冲击。

左翼三号阵地，也遭到敌人疯狂反扑；突击队第七连只剩下二十几位同志，仍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当一个营的敌人又向七连反冲击时，五六五团团团长李轩一面急令一营驰援七连，一令呼唤炮火支援。一营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杀得敌人心惊胆颤，狼狈逃窜。

敌人六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几十次反扑，被我打垮后，仍不甘心失败，于下午三时许，倾巢出动，再次组织了一个团兵力的反冲击。这伙匪徒，歃血喝符，赤膊上阵，高举战刀，乱喊乱叫，一窝蜂地拥上来。我军一声令下，炮兵群发出愤怒的吼声，发发炮弹带着仇恨的怒火飞向敌群，炸得敌人溃不成军。与此同时，五六六团和五六五团集中轻重机枪，组织密集火力射向敌群，敌人在惨叫声中成片地倒下去。对于冲上来的敌人，英勇的战士们用刺刀、手榴弹同敌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拚杀，终于彻底打跨了敌人的反冲击。窦家山阵地上到处都是马步芳“王牌师”的死尸，残敌只顾逃命，再也无力反扑了。下午五时许，我军全部攻占窦家山阵地，红旗在硝烟弥漫的山顶高高飘扬。这时，打了七个小时恶仗，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的指战员们，兴奋得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伤痛，在山上欢呼：兰州的东大门被我们打开了，我们胜利了！

我第一八九师攻克窦家山的同时，兄弟部队经过激战，分别攻占了沈家岭、狗娃山和营盘岭，将敌人的防御体系撕开了巨大的裂口。黄昏，我军乘胜发展进攻，敌开始全线溃退，纷纷向兰州城逃窜。我军第一八七师攻占了十里山并连夜翻山追击逃敌，第一八八师也从营盘岭以北紧追逃窜之敌。

二十六日晨七时，第一八七师五六一团占领兰州东郊的东岗镇，歼敌一部。三营乘坐缴获的汽车、战马，迅速向兰州城东关追击。五六三团也猛打猛冲，扑向城内。这时，第二兵团第三军攻占了兰州西关，并控制了黄河铁

桥，完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至此，马匪军已失败如山倒，彻底崩溃，争相逃命，成群地跳入黄河，囚水北逃。我军指战员将大批敌人歼灭于黄河之中。战斗进行到中午，城内残敌全部肃清，兰州宣告解放。

四十四向宁夏进军

兰州战役刚结束，彭总就依照毛主席批准的预案，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八月底的一天，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兰州城里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兰州战役，部署新作战任务。彭总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彭总的这番话，使我们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很兴奋激动，大家一致表示，乘胜前进，彻底解放大西北，向共和国成立献礼。前委确定：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歼灭逃敌，为进军新疆创造条件；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另有三个军又一个师分别在青海、兰州、天水、临夏执行工作队任务。

接着，兵团前委也召开了会议，具体部署进军宁夏问题。

宁夏也有两马，即马鸿宾和马鸿逵。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二是马鸿宾的儿子马郭靖为军长的八十一军。两马之中，马鸿逵势力较大，且长期追随蒋介石，作恶多端，是顽固的反动头目；而马鸿宾势力较小，又受马鸿逵排挤，动摇性较大。宁马当时尚有四个军的兵力，共七八万人，采取分区防守的方针，以骑兵第二十团固守同心，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骑兵第一旅守景泰，为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为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十一军守银川，为第三道防线。

针对宁马的部署，兵团前委决定分三路向宁夏进军：右路，六十四军及西北独立第一、第二师，由固原、海原地区沿平（凉）、宁（夏）公路挺进，夺取同心，中宁；左路，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从兰州沿黄河两岸挺进中卫；

中路，以六十三军（欠一八八师）为第一梯队，六十五军为第二梯队，沿黄河东岸直插中卫。

突破敌人的防线后，三路大军会歼宁马主力于中卫、中宁、金积、灵武地区。

按照这一部署，我们着手准备进军宁夏。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组织部队学习第一野战军颁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宽待回民俘虏手册》等规定，学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新区政策，并针对宁马骑兵的战术技术，进行军事训练。九月一日，我们接到了兵团的作战命令，开始向宁夏进军。

我们以一八七师五六一团和军工兵营附六十五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担负扫荡残匪、修补道路、筹集粮秣等任务。九月二日，先遣队沿兰（州）、靖（远）公路前进，一八七师主力、一八九师和军直属队随后跟进。左路一八八师于九月五日出动。

先遣队五六一团以九连为尖刀连疾进。九月三日，占领了一条城，敌一个连投降；五日，攻占小炉子，歼敌三百余人。七日，攻克靖远，守敌二九四师八八一团先行逃跑，敌自卫队四百余人被俘。十一日，一八七师先头部队攻占打拉池；一八九师向贺家集、仁兴堡之敌八十一军三十五师攻击，敌不战而退，向中卫逃窜。我们当即命令第一八七师改变行军路线，翻越香山，取捷径向中卫追击，并令第一八八师穿越沙漠快速逼近中卫。

第一八七师五六一团顶着风雨，忍着饥寒，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追击逃敌。十六日上午九时追到黄河南岸的枣林子，终于抓住了从靖远逃到这里的敌二九四师八八一团。我五六一团九连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在火力压制下

向敌人喊话，劝敌投降。敌人惧怕被歼，即放下武器，团长孙天才以下一千二百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我五六一团二营和五五九团也歼灭了向高家滩渡口逃窜的敌第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一三团，控制了高家滩渡口，这样，我军中路部队从黄河南岸逼近了中卫。

我左路一八八师，九月五日从兰州北关出发后，挟黄河两岸向北进击，一路杀去，所向披靡，沿途散匪游勇纷纷投降。十四日，先头部队五六三团进逼景泰，守敌新编第一骑兵旅旅长张钦武不敢抵抗，率部投诚。十五日，师主力西渡黄河进占景泰。此时，我们军部给一八八师下了命令，要他们加速向中卫前进，与中路夹击中卫。一八八师立即决定兵分三路直下中卫；

左路，五六三团，隐蔽穿越人迹罕至、水源奇缺的腾格里沙漠，从西面迂回中卫，断敌西窜北逃的后路；

中路，师主力，按原定线路沿黄河北岸快速前进；

右路，五六四团一营，由该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曹步墀带领，乘木船和羊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捣中卫。

一八八师还报告，将师指挥所一分为二，师长张挺、政治委员李真随中路“水军”先行，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实施正确指挥。我们认为他们这样部署正确可行，立即回电同意。他们随即分头行动。

五六三团在团长徐信、政委刘炎田带领下，经过三天极为艰苦的行军，越过了二百里沙漠地带，于十七日攻占沙坡头，逼抵中卫城西；

五六四团主力和师直沿黄河北岸到达下滩；

右路“水军”乘坐七十多只自制的羊皮筏子，劈波斩浪，闯过黄河无数个峡弯急流，礁石险滩。到达中卫城下，在东门外展开。

十七日拂晓，一八八师各部队将中卫团团围住，并占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拉开了强攻的架势。

这时，我们接到一八八师报告说：中卫西门大开，从里面走出一个举白旗的人，随后出来几个穿长袍马褂的名流人物，担酒、牵羊，说是一为犒军，二来和谈。我们当即要求五六三团领导以礼相待，摸清情况，多做和平解放中卫的工作。

在我们向宁夏进军前，毛主席和彭总就确定了对宁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方针。兵团认真分析了宁夏马鸿宾和马鸿逵的历史，认为宁马发生分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工作做得好，争取马鸿宾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此，彭总和兵团首长早已安排郭南浦先生到宁夏做工作。郭南浦先生是兰州的一位老中医，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在六十四军的协助下，郭老先生为和平解放宁夏奔波，但遭到掌握宁夏军政实权的马敦静的拒绝，而马鸿宾及其子马停靖表示了战场起义的愿望。

眼下，我大军兵临中卫城下，给马敦靖强大军事压力，兵团又再次敦促马敦靖尽快起义。十九日下午，六十四军领导受兵团委托，与马敦靖谈判，签订了和平协议，敌八十一军宣布起义，听候整编。中卫的解放，宣告了宁马第二道防线的崩溃。

与马鸿宾、马敦靖的态度相反，马鸿逵、马敦静始终采取负隅顽抗的反动立场。马鸿逵于九月一日逃离银川，九月五日，马敦静召开准备死守宁夏的军事会议。决定：（1）破坏青铜峡公路，加强牛首山制高点的防守；（2）在必要时，执行放水、放火计划；（3）所属三军各守防区，坚决抵抗；（4）

重新调整各军建制，加强主力一二八军。并以主力一二八军据守黄河东岸的金积、吴忠、灵武地区，利用该地区沟渠纵横、湖沼遍野、寨堡林立的自然条件及青铜峡、牛首山等天险，妄图与我军决战。

鉴于马敦静拒绝和谈，我十九兵团首长奉命运用“天津方式”，首先歼灭主力一二八军于金灵地区。

我们六十三军奉命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北岸、西岸攻击宁夏兵团贺兰军，配合六十四军在金灵地区作战，并直取银川。

六十四军于九月十七日十九时攻占了制高点牛首山，十九日分两路猛扑金积。这天早晨，马敦静乘飞机逃离银川，宁马的高级将领马鸿宾、马金良、卢忠良等通电接受和平。但是，金灵地区的敌一二八军军部仍下令顽抗。我第六十四军经过五十六个小时激战，歼灭了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

二十三日上午，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县接见了马鸿宾派遣的全权代表卢忠良等；下午，双方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签字后一个小时，十九兵团首长即得知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的贺兰军和十一军已不击自溃，除剩下一些毫无组织的溃散官兵外，已无任何成建制的正规部队了，根本无力执行《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为了迅速控制几万散兵游勇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兵团首长命令第六十四军连夜进驻银川。九月二十六日，宁夏正式宣告解放。

宁夏解放后，我六十三军奉命在大、小坝地区集结，一面清剿溃敌散匪，收缴枪支弹药；一面抽调干部，参加开辟新区工作，在中卫、中宁、宁朔三县组织革命政权，建立革命秩序。执行工作队任务的同志，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新区政策，谦虚谨慎，为民办事，受到群众的好评。当地群众夸我们的干部“爱民如玉”，赞我们部队是“仁义之师”。

与此同时，我们还命令第一八八师五六四团北进阿拉善旗，执行敦促那里的封建王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夫达理扎雅起义的任务。五六四团翻越贺兰山到达腰坝后，团长徐成功和政委费国柱带领少数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定远营“王爷府”，与达理扎雅面谈，热情地向他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促使其下定起义的决心，交出了国民党驻定远营办事处特工人员和专员卫队。这为宁夏人民政府派员接管阿拉善旗创造了条件。

在第十九兵团解放宁夏之际，向河西走廊进军的第一、第二兵团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了青海、甘肃全境。九月二十六日，又传来新疆全区和解放的喜讯。

西北全境一解放，我们就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这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我们在吴忠县的一个村子里，收

听首都北京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听到这伟大的声音，我们广大指战员真是心花怒放，无比激动，许多同志情不自禁欢呼，跳跃。军直的警卫战士兴奋得跑到黄河岸边，用手榴弹炸了几百斤黄河鲤鱼改善生活。

一连几天，指战员们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用多种方式表达欢庆的心情。那些日子里，我思绪万千，无数英雄浴血奋战的场面和壮烈牺牲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这是千

百万烈士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我想，我们这些幸存者，一定要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继续艰苦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以告慰长眠九泉的英烈。

西北解放后，六十三军奉命进驻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耀县、蒲城等县，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

四十五总政的干部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和全面建设。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军队的编制体制，建立和健全总部领导机关。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决定加强和充实总政治部，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一九五四年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命罗荣桓同志为主任，傅钟、萧华同志为副主任。随后，一批干部陆续从各部队选调到总政机关。

就在这时，我也从十九兵团六十三军调到了总政治部工作。离开十九兵团时，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对我说：北京第一次来电报调你，我们反映了意见，希望留你在兵团工作。后来，罗荣桓主任又来电报说，已经定了，总政缺人，不要变了，赶快报到。总部这样需要，你就到那里去工作吧。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我从西安来到了北京。那时总政治部设在西皮市街原来的银行公会故址，现在建了人民大会堂。到了总政后，罗主任，萧华副主任同我谈了话。我记得两位首长先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和全军面临的任務。接着说，充实加强总政，正是为了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要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总政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军队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现在总政面临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要抓紧时间，一边组建机关，一边开展工作。

打这以后，我就在罗主任和各位副主任的领导下，在总政工作了八年多时间。

总政机关新建，百事待兴。一九五〇年十月，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工作任务更加繁重。罗主任鞠躬尽瘁，抱病工作，善于抓大事，把握方向，全力支持萧华、傅钟等副主任的工作，年仅三十四岁的萧华副主任在罗主任的直接领导和傅钟副主任的协助下，主持总政的日常工作，日夜操劳，竭力协调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关系。正副主任配合默契，威望甚高。他们一面抓机关的组织建设、思想作风建设，一面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总政的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

那时总政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上下之间和部门之间融洽和睦，相处无间，整个机关朝气蓬勃，干劲很足。虽然人手少，任务繁重，工作紧张辛苦，但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团结一致，一心扑在工作上。

我在总政工作期间，曾任青年部部长，兼任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还担任过秘书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等职。一直担任总政机关党委书记。做过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秘书部门工作，主要的是做青年工作和干部工作。这里先说做干部工作的情况。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没有建立统一管理干部的工作部门，一般由政治机关组织部门管理。总政刚组建时，仍由组织部负责管理干部。当时总政组织部部长由萧华副主任兼任，我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一九五〇年九月，朱明同志调到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组织部的工作包括两大块，一是组织工作；二是干部工作，具体业务由干部处承办。

随着我军开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干部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只靠组织部门来管理干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管理干部的工作机构已势在必行。为此，军委于一九五二年九月，成立了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同志兼任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甘渭汉同志先后任副部长。随后，全军建立了各级干部机关。总干部管理部负责管理全军的军事、后勤技术、专业干部。全军的政治干部，仍由各级政治机关管理。

一九五二年三月，为了加强政治干部管理工作，经毛主席批准，将组织部的干部工作分出，成立总政治部干部部。新成立的总政干部部，由萧华副主任兼任部长，我任第一副部长，不久调孔石泉同志任第二副部长。设立了任免一处、任免二处、调配处、福利处、军衔处、组织统计处、办公室等处室。

总政干部部在总政的领导和总干部管理部的统一部署下，按照全军统一的干部工作规章制度。负责管理全军的政治干部。那个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指导建立各级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完善各种规章制度；

——在军委意图下，抽调大批政治干部充实加强志愿军部队，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并为建立各特种兵机关、军委各机关及院校的政治机关调配政治干部。

——为了解决抽调政工干部后各部队政工干部缺乏的问题，择优提拔了大批政工干部，充实部队政工队伍；并开始有计划地通过开办院校培训政工干部。

——协同转业建设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安排了一批政工干部转业和复员，所安排的转业干部大部分安家立业，各得其所，很多人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在“三反”和整党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了干部评级工作。通过评级工作，普遍地了解与考核了干部，从思想上教育了干部，激励了干部的上进心，并消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等级待遇规定不一致的现象。

——通过军衔鉴定、排以上干部写履历书、营以上干部写自传等工作，基本完成了建立干部个人档案材料的任务，从中审查、教育了干部，也使系统地了解与熟悉干部，为今后考核与使用干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做干部工作的同时，我还做了近一年的秘书长工作。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由于秘书长魏传统同志身体不太好，萧华副主任在一次部务会上提名我兼任秘书长。我表示自己文化低，难以胜任这项工作。萧华副主任说：“你担任过军政委，机关的行政事务可以管得了。”罗主任也对我说：“不会可以学嘛！以后再给你调个助手来。”这样，我再也无法推辞了。军委下了命令后，便做起了秘书长工作。那时，秘书长管辖的一些单位统称秘书部门，摊子不大，人数也不多，但行政事务确实不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此外，还负责八一电影制片厂、总政文工团等直属队的筹建工作。从选定地址、搞营建规划，直到在设计图纸上签字，都是我经手办理的。

在多年干部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干部工作的创立和发展，是同罗荣桓同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他为我军的干部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他的出色领导，当时的干部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套很好的作风。我感受最深刻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的原则，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反对“个人干部政策”倾向。记得我刚到总政不久，在一次部务会上听罗荣桓主任说过：我们的干部工作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他说，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到几个方面军；从抗日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都有不同的经验和工作作风，各方面的干部在起工作，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负责组建总政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时，建议由原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任总政副主任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后来，总政机关各部门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和其他干部的配备，也是根据罗主任讲的原则，从各野战军选调来的。“五湖四海”的选配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军的大团结，显示了政治领率机关的高度党性原则，为全军做出了榜样。

在调配全军主要干部乃至日常的干部工作中，我们干部部门始终坚持这条原则，以正派的作风，选拔、配备干部。对此，广大干部的反映是好的。

把关心爱护干部视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干部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和经常性工作。罗荣桓主任常说：“政治机关、干部部门是干部的家，如果干部怕进政治机关，怕进干部部门，那就危险了！”。为了体现对干部的亲切关怀，他在一次部务会上对接待来京或来总政的干部作了这样原则的规定：大军区和军兵种的主要领导干部，总政主任或副主任出面接待；兵团和军的领导干部，由副主任或部长副部长出面接待；对路过北京赴朝作战的干部，要组织他们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陪同他们吃顿便饭。罗主任身体力行，经常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热情接待从外地来的或国外回来的干部，有时还亲自陪着吃顿便饭。记得陈赓、韦国清同志从越南回来，罗主任就亲自热情接待，听取他们的汇报。萧华、傅钟两位副主任认真贯彻罗主任的意见，经常亲自参加接待工作。抗美援朝期间，军以上干部路过首都，许多同志都是由萧华副主任接待谈话，并陪同去谒

见毛主席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由于总政领导同志的表率作用，当时总政机关很重视做好干部的接待工作，这深得全军的好评。广大干部确实把政治机关、干部部门当成温暖的家，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找政治机关、干部部门谈。

关心爱护干部，既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也表现在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和疾苦；对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

格要求，又要热忱关怀。罗主任经常以党的历史经验告诫我

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能重复历史

上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一定要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有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部队，抗战时期才回来。他对组织上对他的使用有意见，曾多次找我谈他的想法，让我向罗主任反映。我向罗主任汇报了他的情况。罗主任说，他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但困难时期离队了，如果一直坚持下来，当然不会象现在这样。罗主任让我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请他正视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好好为党工作。后来，罗主任亲自找这位同志谈了话，严肃地批评他：“井冈山困难时期，你跑到哪里去了？”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使他的思想触动很大。做干部工作，经常遇

到干部的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罗主任更是慎之又慎。一九五一年“三反”运动时，我担任“三反”办公室主任。罗主任总是告诫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随便处理人。他支持我们否定揭发的不实之词。一九五五年“肃反”时，罗主任对全军“肃反”办公室的组成，考虑非常周到。当时参加“肃反”办公室的二级部长是保卫部副部长蔡顺礼同志和我。按“肃反”工作性质来说，办公室主任一般由保卫部长来担任。但是，罗主任却提议让我担任“肃反”办公室主任，蔡顺礼同志任副主任。并且规定，有关“肃反”的文书往来、信件传递，以及需要与干部本人见面的材料等，一律由我签名盖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罗主任说：“你是管干部的，人家见了你的名字，不会感到有压力；如果用保卫部长的名字，那人家就会感到问题严重，甚至害怕起来，不利于澄清问题。”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肃反”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政策性很强，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要认真调查研究，包括向本人作调查，万不可主观武断或粗枝大叶；材料要扎实，证据要确凿，遇有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可擅作主张。对于有些干部的较大的历史问题或过失问题，他指示我们进行慎重讨论；有些人的问题，还向中央军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作了调查或征询意见。我们这样做了，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罗主任对干部关怀备至，感人肺腑，使我深受教育。

把提高部队的科学文化水平，列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罗荣桓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发，决定全军除执行作战和生产任务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这个指示下达后，全军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截止一九五二年七月底，全军开办速成中学五十多所，速成小学二百二十多所，先后约有二百万人投入文化学习。与此同时，积极办好各类院校，通过院校培养大批干部。根据罗主任的指示，干部部门从部队抽调最强的干部去担任学校的领导，挑选水平高的同志去当教员，选送素质好的同志进院校学习，以保证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这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罗荣桓同志认为政治干部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学校，象战争年代的“红大”、“抗大”那样。总政其他领导同志对此也很重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以罗荣桓、傅钟、萧华同志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建议开办政治学院。毛主席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周恩来、朱德同志也表示赞同。十二月四日，这封信即批回总政治部。

罗主任接到毛主席的批复后，立即着手进行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首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罗荣桓、萧华等七人组成，我也是成员之一，当时称“七人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筹备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萧华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我担任副主任。

罗主任对筹备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这一快一多，成了筹备工作的指导原则，萧华副主任也对编造预算提出了九条具体意见。我们参加筹备工作的全体同志，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很快展开了制定筹建方案，编造预算，选择地址等工作。选院址时，罗主任强调不要与民争利。我带着工作人员察看了效区许多地方，最后选定五棵松以西一片荒郊野地。我们请罗主任亲临现场勘验。看到这里是不能耕种的布满沙石的干涸河谷，只有几家农户，搬迁任务不大，他高兴地说：“好啊，革命是白手起家，我们就是

要在这样的地方建设未来。”随之告诉我们，在划定用地上的“阴宅”（坟墓），要通知其亲属迁出；“阳宅”，要帮助安排好新居。这简短的话语，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群众的本色。后来，我们按照罗主任的意见，把几户农民的旧房按质论价买下来，并安排他们住进了我们给盖好的新房。这使他们感叹不已：啊，这真是子弟兵啊。

选定院址、完成实地勘测后，我拿着毛主席的批示，多次找北京市薛子正副市长和总后营房部范子瑜部长，请他们帮助搞营院规划、营房设计，解决材料等。他们和营房部门、设计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规划设计图纸定下来，我代表筹建单位，在图纸上签了字。

政治学院工程建设约四十万平方米，若等校舍全建起来再开学，显然需要几年时间。罗主任说，这不是办法，要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宿舍楼，边建设边开学。这样，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破土动工，最先上马的是东四、东五两幢学员楼。在建校舍的同时，他亲自过问调配干部、抽调教员、制定教学方针、教学规划和教学大纲。一九五四年初，这两幢学员楼还没完全竣工，他就指示先开办一个高级干部文化班，遵照罗主任的意见，我具体落实这个高于文化班的事宜，从各部队抽调几十位高级干部来学习文化。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速成系第一期正式开课。罗主任及总政各位副主任参加了开课式。他看到有的学员上课、吃饭还在席棚子里，便给大家讲起了在保安办“红大”的情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正式成立，经中央军委批准，由罗荣桓主任兼任院长、萧华、莫文骅同志任副院长。与此同时，总政还相继开办了长春、长沙两所政治干校和南京政治师范学校。这几所政治院校的开办，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高级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理论骨干。

实行军衔制，是我军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九五二年，军委就作出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罗主任亲自组织我们研究外国军队军官服役条例和军衔制的有关情况，提出了切合我军实际的军官服役条例（草案）及军衔制方案。同时，组织军衔鉴定工作。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授予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功勋奖章的条例。随后，军委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部署了评定军衔工作。我军首次搞评定军衔，大家都没有经验。加上我军经历的革命战争时间长达几十年，干部情况差别很大，这使评定军衔的工作难度很大。面对这种情况，罗主任反复要求干部部门的同志要公道正派，评定军衔力求公正合理。

评定军衔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罗主任都直接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总理请示。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的军衔，是直接由中央讨论决定的。对拟授少将至上将军衔的干部，罗主任指示我们遵照中央和军委所确定的原则，首先选出各类“标杆”，然后对照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干部部门的同志找了许多人谈话，收集各种意见。罗主任、萧华副主任等领导同志也亲自找人谈话，耐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对情况比较复杂的同志的评衔更是反复比较，慎重对待。总之，对每个同志的军衔评定，都是经过充分酝酿讨论，然后提出拟授军衔等级的意见上报审批。与此同时，干部部门还进行了授勋的准备工作。

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在罗荣桓同志的具体组织、指导下，经过各

方面的艰苦努力，全军的评衔工作终于胜利完成。我记得，一九五五年九月的一天，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总结授衔的准备工作。这是授衔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到了会。会上，罗荣桓同志宣布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的授少将以上军衔的人员名单。与会同志都为授衔准备工作的顺利结束而高兴。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席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定，发布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两项命令。九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衔授勋仪式。

在这次授衔授勋中，我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昔日的穷伢子，而今成了将军，这使我十分激动。我知道，这全是党和人民军队哺育的结果。没有党，没有革命，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做好革命工作，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四十六 建国初期军队青年工作

一九五〇年六月总政新组建不久，就设立了青年部。我担任了青年部第一任部长。除我外，开始时青年部只有六个同志，后来才调来了副部长刘西元等同志，设立了青年教育处、团务处、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青年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红军时期部队中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青年队，曾对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各解放区展开了建立青年团组织的试点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同年四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使中国青年运动有了自己的核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人民解放军对建团工作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明确提出了军队建团的方针，即在野战部队中先重点试办，取得经验再加以推广，在后方部队和军事机关中试行普遍建团。

总政青年部一成立，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部队建立青年团组织。一九五〇年七月，团中央和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在部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指出：“在部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强调按照朱总司令提出的部队建团方针，有准备有计划地开展建团工作。

从这以后，部队中陆续开展准备建团和试办建团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一九五〇年九月，全军共有团员二十九万余人，并训练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青年工作干部，各级政治机关开始设立青年工作部门。但是，由于部队建团是件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加上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指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青年工作干部不足，所以当时绝大多数部队的建团工作还未进行试点。

为了推动全军的建团工作，经过充分准备，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军委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中央和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这次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巩固地向前发展”。朱德总司令题词：“虚心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水平，使自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战士。”朱总司令还亲临会议，作了《加紧建设我们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的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罪恶行径，“我们必须更加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加紧建设我们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他强调：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迅速“大力发展团员，壮大团的力量。”并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在部队中建团的经验，今后我们可以在全军中推行普遍建团的方针。”在会上，傅钟副主任和萧华副主任分别作了关于部队青年学习问题与部队青年团组织工作问题的报告。我作了《关于建团基本总结及今后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由罗荣桓主任作总结。他说：“在我们建军历史中，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部队的青年团是部队中共产党和政治机关的有力助手。今后部队建团的首要任务是以“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去教育青年一代，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罗主任响亮地提出了“为争取发展百万团员而

斗争”的号召。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进一步认清了部队建团的重要意义、任务、方针、方法步骤，增强了做好建团工作的责任感和信心。十月三十一日，军委总政治部又向全军颁发了《关于目前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把建团工作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之一，抓紧抓好。

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和总政的指示在部队传达贯彻以后，普遍建团的工作，在全军范围内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各级党委、首长加强了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给青年工作撑腰，把建团工作当作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经常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并自上而下的建立起各级青年部门，配备一定数量与质量的青年工作干部。同时，在党内和干部中、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对建团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切实做到关心建团，支持建团。

然后，各部队选择学校、机关等青年工作干部较多的单位，进行建团试点，取得经验，再自上而下地普遍推广试点经验。各部队采取军政配合，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的方法，广泛进行建团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团员青年理解了建团的目的、意义，很快出现了一个青年战士要求进步，申请入团的热潮。在此基础上，各部队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展团员。

这期间，总政青年部通过编印《青年工作手册》，介绍一些部队建团工作的经验。总政治部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发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指导建团工作。无论是重点试办还是普遍建团，各部队都注意把建团与当前的中心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建团一开始，就表现出团是党和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是广泛联系群众的有战斗力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经过上上下下两年多的努力，建团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止一九五三年六月，全军共发展团员一百余万人，实现了罗荣桓主任所提出的“为争取发展百万团员而斗争”的号召。在发展团员的基础上，各部队还有步骤地进行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凡团员达到十五人的连队，建立了团的支部。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份统计，全军已建团支部三万个，另有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的团小组三千个。建立团支部，在我军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团支部的建立，有利于加强党对团的领导，使团的工作得到有效的改进。此外，全军大部分军师级单位，按照总政一九五二年七月发出的普遍召开团员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先后召开了团员代表会议，发扬团内民主，使团的干部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改进了团的工作。在建团中，还建立了青年工作机构，配备、训练了一批青年工作干部。根据一九五三年四月统计，全军共有专职青年工作干部四千三百余人。总政在中央团校附设了两期部队训练班，各大军区和各特种兵也陆续开办了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青年工作干部。全军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指导机构的建立和青年工作干部素质的提高，加强了对青年工作的指导。

全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后，部队中青年团员和青年人数增多，达到总人数的60%以上，青年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总政治部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作出了《关于在部队中建立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全军的团一级、舰队一级、独立营、相当于团的直属队以及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团员和青年群众的学校、医院，均设立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作为上述各单位党委、政治机关领导下研究和指导青年团工作的组织，以及党委和政治机关动员和组织团员、青年完成各项任务的助手。同年七月，总政青年

部发出了《建立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对建立团工委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民主选举和团工委的工作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以后，全军各部队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相继顺利成立。实践结果表明，在部队中建立青年团工作委员会，有利于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可以更好地按照青年的特点指导团的活动，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的政治积极性。加强团支部建设，使青年团更好地发挥党和政治机关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历经几年时间的紧张工作，从试办建团、普遍建团、成立团支部到建立团工委，全军建团终于顺利结束。这表明，青年团在部队中，已成为党领导下的具有全军规模的一个强大的先进青年组织，全军青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部队建团不仅是一项组织工作，而且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青年思想教育运动。在建团中，各级青年工作部门和党、团支部，对团员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教育，使广大团员、青年提高了觉悟，加深了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认识，要求进步的情绪高涨。青年团在完成部队各项任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政治工作的突击力量。剿匪部队中的团员青年，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勇敢顽强、机智沉着地同形形色色的土匪作斗争，建立了卓著的功绩。进军西藏部队中的团员和青年，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巨大困难，努力地完成作战、生产、筑路等任务。参加农业生产和国家工程建设部队中的团员和青年，圆满完成了生产建设任务。志愿军中的团员青年，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为祖国争光”、“立国际功”等口号的鼓舞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涌现出黄继光、罗盛教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志愿军中团员的立功人数，占部队总立功人数的30%以上；仅一九五二年一年中，就有三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团员立功，一百五十三个团支部和团小组受到师以上政治机关的奖励。空军、海军等待种兵和军事院校中的团员、青年，勤学苦练，努力掌握军事技术，为建设技术兵种贡献聪明才智。各级军事、政治、后勤机关中的团员青年，在本职岗位上埋头苦干，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效率，不少同志被评为模范工作者。青年团在一九五二年度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部队训练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大力推广“速成识字法”，开展学习互助活动，对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部队的文化娱乐及体育卫生活动方面，青年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九五一年四月，举行了全军篮球、排球竞赛大会，广大团员、青年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结束后，成立了全军男、女篮球队，女篮编在青年部，男篮编在文化部。这两支篮球队成了后来“八一”体工队的基础。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为了迎接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总政青年部向全军青年团组织和全体青年发出了一封信，号召全体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发挥突击队作用，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军开展起来，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各级体育运动选拔赛工作，为全军运动会的圆满成功贡献力量。“八·一”全军运动会隆重举行时，三千三百六十五名代表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团员一千五百二十二名，占代表总数的45%以上。这次大会打破六个田径项目的全国记录，其中四项成绩是团员运动员创造的。文艺比赛获舞蹈一等奖的五个节目的演员，52%是团员。

在执行各项中心任务中，部队青年团也做到了党有号召，团有响应，成

了一支强大的突击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青年团在发挥党的助手作用的同时，成为党的可靠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一批又一批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团员被接收入党。志愿军在两年内发展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三名团员加入共产党，国内部队的青年团员亦成为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据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不完全统计，在新发展的党员中，青年团员占 66%，中南军区高达 80% 以上。青年团员亦成为干部的源泉，数以万计的优秀团员被提拔为基层干部。

全军青年工作的蓬勃发展，受到了青年团中央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青年团在党的教养下，为祖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堪称全国团组织的模范。”

在部队建团取得显著成绩的时候，迎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日在北京举行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七百九十五人，列席代表一百五十三人。代表着全国三十八万个基层组织九百万团员。我带领军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讨论了党在新时期赋予青年团的任务。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大会主席团。接见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主席日理万机，却知道我的名字，这使我十分激动。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向青年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这为新时期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大会选举出新的团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槐、荣高棠、章泽、胡克实、区棠亮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为了贯彻这次全国团代会精神，总结部队普遍建团工作，确定今后部队青年工作任务，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至十一日，总政召开了全军第二届青年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和团中央胡耀邦书记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受到全体与会青年工作干部的热烈欢迎。在会上，我作了《两年来部队青年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傅钟副主任作了《加强部队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的报告，甘泗淇副主任作了题为《遵循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把部队青年工作推向前进》的总结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强调部队青年工作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使广大部队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次会议后，全军各级青年工作部门围绕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指导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发挥突击作用，促进部队正规训练和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同时，结合部队正规训练，加强团支部建设，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团的组织，把部队的青年工作推向前进。

一九五六年二月，总政治部再次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制定了部队两年青年工作规划。萧华副主任在会上讲了话，强调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后部队青年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并对创造大批优秀射手和大力发展团员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彭绍辉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先后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会后，全军开展了创造优秀射手和技术能手的竞赛活动。六月，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创造优秀射手和技术能手问题的指示》，充分肯定了这一活动，强调加强领导，使竞赛活动健康发展。后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联合颁布了《关于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基本标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开展竞赛活动的号召，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学习和提高射击技术及其他一切技术，提高训练质量与工作效率，消灭和减少事故。这项

竞赛活动，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军达到神枪手、神炮手和各种技术能手标准的有八十余万人。

在简要回顾建国初期军队青年工作的时候，有两件与做青年工作有关的事情，也在这里提一下。

一件事情是，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苏联。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青年团组织同友好国家青年组织的交往逐渐开始。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九月，应全国青联邀请，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一行四十五人访华。同年十月，应苏联列宁共青团邀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成中国青年代表团访苏。代表团团长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团长是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李昌和我，成员有项南、吴学谦同志等四十二人。军队代表八人，有战斗英雄郭俊卿、张明、赵兴元等。后来，增加了几十位随团访苏的各界青年，如文艺界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等，总数达到70多人。

青年访苏代表团是分批去苏联的。冯文彬、李昌率代表团的多数同志，于十月二十日，启程赴苏联。我因正在组织召开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晚走了几天。十月二十三日会议结束。二十五日，任弼时同志就把我和新疆自治区团委书记阿斯哈提等找去谈话。他抱病向我们介绍了苏联及列宁共青团的情况，嘱咐我们多看、多听、学习长处和经验，增进了解，传播友谊。听了弼时同志的介绍，我们对访苏心里有底了。告别弼时同志的第二天，我们乘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二十八日早晨，火车驶离哈尔滨不久，列车播音室播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任弼时同志逝世的讣告。我们感到很震惊，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前弼时同志的谈话，竟成了对我们的最后的教诲；那次告别竟成了诀别。任弼时同志是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弼时同志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和中国青年的导师，是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的久经考验的最可信赖的朋友和导师。对他的逝世，我们心情十分悲痛，决心继承他的遗志，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

中国青年代表团到了苏联后，会见了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和各界青年代表，参观了不少工厂、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友好访问活动。我们军队的几位代表，除了参加全团统一的参观访问活动外，还结合军队的特点，参观了苏军的一些单位，如航空俱乐部、列宁格勒政治学校等，会见了苏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青年部长。我在苏军两所政治学校还发表了讲话。

我们在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之后，分两批回国。冯文彬团长和我率代表团二十五人，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晚离苏回国。在莫斯科车站上举行了欢送仪式。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科齐马索夫、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赛米恰斯尼、中国驻苏大使参赞曾涌泉等上千人参加欢送。科齐马索夫致欢送词。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冯文彬致告别词。离苏回国时，我们先坐火车到伊尔库次克。再换乘小型飞机，经蒙古乌兰巴托返回北京，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这次中国青年代表团访苏，是建国后出访的第一个青年友好访问代表团。通过访问，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了解和友谊，也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与做青年工作有关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作为青年工作方面的代表，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举为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四月举行的三届政协会议上仍选为常务委员。在政协会议活动中，编在青年团组里。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我是委员，

因已离开青年工作的岗位，所以不再编入青年团组，而编入了中共组。

四十七红山口岁月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从总政治部调到高等军事学院（现为国防大学）工作。调动前，罗荣桓主任和萧华副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搞过院校工作，恐怕适应不了”。罗主任说：“你去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一是管干部，在总政管干部，那些学员你都熟悉，到那里仍是做干部工作；二是可以多学习。”萧华副主任向我介绍了学院领导情况，并说“到学院协助李志民同志工作。”过了不久，下了调动命令，决定我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六三年后任副政委）、院党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高等军事学院位于北京西北郊红山口，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国防部命令，以原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组建的，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正式开学。开办伊始，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我去高院工作时，叶剑英元帅任院长兼政委。李志民同志任副政委（叶帅不兼政委后，接任政委），陈伯钧、杨至成同志任副院长，唐延杰同志任教育长，解方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长，刘忠任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是林浩同志。

高等军事学院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其任务主要是培养陆、海、空三军的高级指挥员。一九五七年招收的基本系学员，将军占63%，大校占28%，上校占9%，担任军以上职务的占94%，师级职务的占6%。一九六三年三月，招生对象有所调整，扩大到师职以上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高级参谋和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后来还设了一个外训班，培训外国军事人员。

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的工作，是以教学为中心展开的。学院党委成员轮流参加跟班学习，深入教学第一线，经常到教研室、学员班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教学中的问题。院领导带头给学员讲课，讲毛泽东军事思想，讲我军的战略方针和军队政治工作。授课前，大家都认真进行备课，即使是自己十分熟悉的内容，也要精心准备。院党委同志一心扑在教学上，带动机关于部围绕教学想问题、开展工作，这有力地促进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学院认真贯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发扬抗大的优良作风。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处理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根据学员多是高级干部，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度的自觉性等特点，学院提倡学员要以自学为主，坐下来认真读书，研读马列和毛主席的原著，掌握基本理论，为以后回部队继续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高级干部要读点书”。罗瑞卿同志开了三十本马列著作的书单子，经毛泽东同志圈阅后，要高等军事学院办高干读书班，以轮训方式组织全军军以上干部学习。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学院先后办了三期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合作制》等四本书。院领导带头参加轮训学习。大家一丝不苟地认真读书，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参加读书班学习的同志普遍认为效果很好，有很大收获。中央宣传部向全党推广了高等军事学院办读书班的经验。有关辅导材料印发全军，对全军读马列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组织认真读书的同时，学院经常请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作报告。学院还和中央党校建立了密切联系，拉了广播专线，中央党校有重要报告会，学院就组织教职员、学员随听。这些做法，对学员、教职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国内外形势，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

政策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军事理论教学中，也认真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了使学员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经中央军委批准，搜集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指挥革命战争的有关电文，供教学使用，以利于学员在学习中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战略战役理论和军兵种知识的教学，既坚持“以我为主”，又借鉴古今中外的军事经验，专门增设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孙子兵法》等课程。学院还及时请有关军区领导同志和参战部队指挥员来学院作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的报告，组织学员参加全军一些重要的军事演习，参观部队的军事比武表演。这样联系实际搞教学，有效地促进了学员的指挥能力的提高。

叶帅说过，老同志在这里学习，要挖“宝”，要他们总结经验写东西。学院领导积极贯彻叶帅的意见，要求每个学员至少写一篇文章，在学院的刊物上发表。许多同志写出了有分量的军事理论文章和作战经验总结，登在《军学杂志》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教员质量不高，学校就出不了好成绩。因此，学院领导很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在军委总部的关怀下，在李志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学院政治部从全军各部队精心挑选了一批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教学能力的教员。后来，又从学员中选留一些同志任教，使教员队伍进一步得到充实加强。对贤才不仅要广招，还要留得住。这首先要重视教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和教育教员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思想和信念。有的教员由于种种原因想到部队去工作，学院领导总是舍不得放走，尽量加以挽留。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学院的教员队伍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抓思想教育的同时，还采取许多办法，加强对教员的培养和使用。院领导对教员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关心。要求教员在教中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还亲自参加审查教材、听试讲、听授课，召开学员座谈会征求意见，对教学中的经验和问题，及时进行通报。院党委经常教育全院的干部、学员要尊重教员，并规定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教员的具体措施。教员可以阅读高于其级别的文件，听高于其级别的报告，评级评衔与机关干部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等等。在六十年代初，学院政治部曾着手教员评定职称问题，此事后因“左”倾思潮干扰没有办成，但教员从中看到了对他们的关心。领导尊重和关心教员，使教员感到温暖，心情舒畅，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教学积极性，教学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高等军事学院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反复要求入校学习的高级干部要放下架子，当普通党员、普通学员和普通一兵，重新回炉接受锻炼。学院始终坚持学员自己管理自己。当时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学员班的主任都由学员兼任，只配少量在职干部协助。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也是在学员中选举产生。学员不分职位高低，一律以普通党员身份出现，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这种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很适合高级干部在校学习。学院还组织学员，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修十三陵水库、校园绿化植树、修建露天剧场等劳动。实践证明，对高级干部学员这样要求是很有益处的。同时，学院为学员服务的思想很明确，尽量为学员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使学员“学好、吃好、休息好”，保证学员集中精力钻研学问。学院还很注意学员的身体健康，提倡锻炼身体，并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学院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采的，经常放映电影，请剧团来演出，进行歌咏比赛等。

一九五九年，为了活跃群众性文艺活动，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向

建国十周年献礼，高等军事学院组织了由百十位将军参加的将军业余合唱团。大家推举李志民政委担任指挥，唐延杰同志力团长，我为合唱团政委，熊伯涛同志担任朗诵。经过几个月业余时间的排练，六月一日，将军合唱团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开幕式上第一次登台亮相，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接着，又到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连声赞好。演出一结束，周总理就指示把合唱团的节目，作为国家节目，参加国庆十周年晚会演出。这以后，总部、驻京部队和有的大军区的将军也参加了合唱团，队伍扩大到二百三十位将军，并进行了紧张的排练和准备。十月三日晚上，将军合唱团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庆祝晚会。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团长等外宾，观看了演出。将军合唱团的大合唱，以威严的阵容，嘹亮的歌声，气壮山河的声势，震动了雄伟瑰丽的人民大会堂，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威，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我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的那十多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参与领导运动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事情、涉及一些同志；但对待人的处理问题，我一向持慎重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了干部。

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党委成员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发生分歧，有时甚至意见很对立，矛盾很尖锐，统一不起来。在这种时候，我的基本态度是两条：一是与人为善，不要扣帽子、打棍子，不搞无情打击；二是实事求是，不搞无限上纲，党委集体定的集体负责，不应推给个别领导人。我的这种态度虽在当时受到不少非难，但历史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红山口狂风骤起，高等军事学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运动一开始，李志民、李聚奎等同志受到了诬陷，被关押、批斗，惨遭迫害。我对夺权、闹派性、搞打砸抢之类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极为反感，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结果，被戴上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林彪诬蔑“总政是阎王殿”后，我由于长期在总政工作更是罪上加罪，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受到了上百次的所谓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九六九年三月放出来后在院内监督劳动，年底下放到石家庄的三三二工厂去劳动。面对种种迫害，我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必定战胜邪恶，坚信党内的健康力量必定战胜极少数阴谋家、野心家，也坚信自己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所以毫不动摇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三三二工厂劳动的日子里，受到了工人同志的关心照顾。这个工厂的许多工人同志是从六十三军复员转业的，当他们得知我曾在六十三军工作过，对我更是倍加照顾，这使我感到温暖、欣慰。一九七二年五月，两年多劳动改造结束时，工厂党委给我做了一个鉴定，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情形，现抄录于后：

“王宗槐同志到厂蹲点劳动以来，能坚持看书学习，以身作则，带头发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自己要求严格，组织观念强，能按时交纳党费，过组织生活。遵守纪律，有事主动请假。工作中，服从分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生活上不搞特殊，自己虽有严重胃病，但坚持和工人同吃，上下班步行数里，从不乘车。作风上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利用节假日到职工宿舍谈心，受到了干部和工人的好评。”

四十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林彪“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两年之后，又有一些同志获得“解放”。在叶剑英副主席的过问下，总算给我分配了工作，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委员。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没有向我宣布这个命令。后来，别的老同志告诉了我，我直接问了总政当时主管干部的负责人，他才说：有怎么回事儿，你可以去报到。这件事使我想了很久，我感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虽然被粉碎了，但党内的事情仍不简单，政治上的事情可要注意明辨方向，分清是非，坚持原则。

我怀着这种心情，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到了昆明军区。到了军区，得知高等军事学院有些同志也分到这里工作，有的是“文革”中打倒我的。对这些同志，我怕他们有思想顾虑，先去看看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走访，主动做团结工作。我的这种胸怀和态度，使这些同志很感动。

到昆明军区不几天，就传来了江青在北京发动批林批孔的消息。当时虽不知道有个“四人帮”，也不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鬼把戏。但对他们动不动就批老干部十分反感，感到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那年头，北京派往各地的记者很多，昆明军区也进驻了一个记者组。这些记者权力特大，装有直通北京的红机子电话。党委常委开会，记者不到不能开，有一个记者到场才可以开始。这些记者，我们素不相识，也无成见，但感到这种做法不正常，违背了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传统作风，所以对它们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单独找军区领导谈话，曾五次约我谈话，要我一个个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的情况。我说：我刚到这里工作，不了解情况：你们要了解其他同志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本人去谈，要了解我可以找我谈。后来才弄清楚，这些记者是奉“旨”行事，是江青一伙授意他们去摸清每个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

在批林批孔中，还遇到了一件事，就是调查田维扬同志的问题。

一天，我正在部队，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说有急事，要我赶回昆明。回到昆明的当晚，这位领导同志对我说，最近，江青在天津的讲话提到昆明军区有个大干部，在贵州当司令时贪污了一千多箱云烟、一千多瓶茅台酒。虽未点名，但很明显是指田维扬。要成立专案组调查他的问题，要我负责。我当即表示，田维扬是副司令，是中央管的干部。要审查他，中央有没有文件，有没有电话记录？否则军区无权立案审查，我也不能负责这个专案组。后来，打倒田维扬的大字报上了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又对我说，成立一个调查组，弄清大字报所揭发的情况。这我同意了。随后调来几个同志，调查大字报的内容。结果，根本没有江青所说的那些问题，搞清了田维扬是清白的。这使田维扬同志少吃了冤枉。对此，他直到临去世都很感激。

我在昆明军区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情，是到老挝慰问筑路部队。

那时，包括老挝在内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艰苦卓绝。我国人民和军队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一些工程部队在老挝帮助筑路。一九七四年冬天，决定以云南省和昆明军区的名义，组织慰问团，赴老挝慰问筑路部队。我担任慰问团团团长，副团长是省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和军区后勤部孙大坤副部长；十几名团员是省和军区机关的同志。慰问团带了一个一百多人组成的文工团，包括黄虹、关肃霜等著名演员。慰问团在老挝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慰问活动，走遍了我筑路部队的所有班排，送慰问

信、慰问品，演出文艺节目，进行联欢活动，受到了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团内部，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相处得很好。每到宿营地，我都去看地方的同志，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慰问结束回到昆明后，我们还开了座谈会，主动征求地方同志意见，还到省歌舞团、花灯团、杂技团去看望参加慰问活动的文工团员。这样做了，有利于增进军队和地方同志的团结。

历史到了一九七五年。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转机，我的工作单位也有了变动。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兼任总参谋长。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提出了全国各个领域的工作都要整顿的指导思想，并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日渐好转。他和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军队整顿工作。接着，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这时，我奉命调到第二炮兵，任副政委。从这以后，我就一直工作、生活在二炮。二炮是个新的技术兵种，在我国战略核力量中占重要地位。对这支部队，我怀有很深的感情，为她的成长和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二炮工作、生活的十多年中，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许多大事，经历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在这里，我想简要地回顾和审视一下在这些变化中，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以利于晚年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九七五年，对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军队，我是衷心拥护和积极贯彻的。而在一九七六年，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则是十分反感的；对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袖人物的逝世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对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感到欢欣鼓舞。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衷心拥护全会关于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和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进行宣传和贯彻。尔后，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我都表示坚决拥护。

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九八四年担任军委派驻海军整党联络组组长，参加了近一年的海军整党。一九八五年九月，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期间，在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我都明确表示了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对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态度。对于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同自由化斗争不力的状况，我既有意见更有担心。

党的十三大以后，我虽然离职休息了，但党的事业仍时时刻刻在我心中。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个人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现在休息了，仍是一腔热血，希望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读报看书，关心国家大事，仍是每日主要生活。当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动乱，我真忧心如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中央常委多数同志，果断作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定，我由衷地表示坚决拥护；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支持。这场风波，促使我更多地思考，面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和剧烈变幻的国际风云，如何使社会主义中国世世代代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深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伟

大的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四十九毕生高唱秦献歌

最难忘啊，
风雪长城外，
最难忘啊，
黄河古道旁；
战斗的歌声，
伴随着战士的足迹，从雪山草地，
传到太行山上。
最难忘啊，
霜满长江月，
最难忘啊，
春风菜花黄；
嘹亮的歌声，
传播着胜利的消息，从中原大地，
飞向四面八方。
战友们歌唱吧，歌唱吧，
如今战士虽然已经白发苍苍，
依然要把那青春歌唱，
为振兴中华，
继续长征，
永远放射出生命的火光。

这铿锵激越的《老战士之歌》的歌声，无数次激起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们没有华丽的演出服装，青春年华也早已逝去，但他们激情似火的演唱，使数以万计的听众热血沸腾，心潮如涌这一支不寻常的业余演唱队伍，就是十多年来蜚声乐坛的“首都老战士合唱团”（现改为老战士艺术团）。我与老战士合唱团结下不解之缘是在一九八三年担任名誉团长之后，但这个特殊的艺术团体产生于一九七九年建国三十周年前夕。

那是“十年劫难”之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倡导和黄克诚、李一氓等同志的热心支持下，由张凯、孙湘、章洛、何士德等几十位新四军老战士发起组织了新四军歌咏队。

九月十六日上午，歌咏队在北京“二七”剧场举行首次演出。十月一日晚，又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三十周年联欢晚会演出。此后，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同志约见歌咏队的同志，传达聂荣臻元帅的意见：“组织老战士活动很好，以后不要分八路军、新四军，要一起活动。”这样，“新四军歌咏队”改名为“老战士合唱团”，一批当年的老红军、老八路、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工作者中的文艺爱好者，先后参加了进来，合唱团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中国老龄问题委员会正式接纳合唱团为所属文艺团体。尔后经北京市民政局部门批准注册登记，成为北京市一个社会文艺团体。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合唱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正式通过了《首都老战士合唱团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团委会。

在第一次团委会上，团委们推举章洛任团长，聂大朋、胡士平、牛畅任副团长（一九八五年增选马旋为副团长）。与此同时，还特地邀请我担任名

誉团长。我感到很荣幸，但又感到当之有愧，希望他们请更合适的老同志。他们说了好几条理由，其中一条是我担任过将军业余合唱团政委，非要我当名誉团长不可。这样，我推不出去，只好充数了。打这以后，我与首都老战士合唱团紧紧连在一起了。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点困难，参加他们一些联欢、演出活动，支持扶植这个特殊的艺术团体，成了我晚年生活的组成部分。

首都老战士合唱团正式成立后，我在二炮司令部礼堂，向合唱团的同志们介绍过一九五九年在周总理关怀下组织将军合唱团的经过。和我军唱革命歌曲的传统，并放映了《将军大合唱》的新闻记录片。后来，合唱团根据我的提议，聘请李志民、孙毅、魏传统、李伟、曹瑛和张凯、孙湘等七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非常关心合唱团的工作。李志民同志称赞合唱团“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实际是‘将军合唱团’的继续，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都老战士合唱团成立以来，参加过很多重要庆典和重要纪念活动的演出。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参加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大会演出，气氛空前热烈。刚唱完《毕业歌》和《上前线》，李鹏同志在观众席上带头起立鼓掌，息。合唱团参加了北京市一、二、三届合唱节演出。观看过演出的中央领导同志，赞扬老战士们宝刀未老的革命情怀，称赞“老战士们的演唱气质，是战争年代革命英雄气概的再现。”

除了参加重大纪念活动演出外，老战士们深入到许多工厂、学校、军营、农村演出。他们甚至惦记着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还到少年犯管教所演出。

建团十二年来，老战士们共演出了二百八十多场次，观众达到三十多万人次。真可谓“声震华夏气壮山河。”在和老战士合唱团同志们的多年接触中，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老战士合唱团的同志都有一顆火热的心。这个合唱团

的平均年龄六十四岁。四百五十多名成员来自首都党、政、军、群、工、商、学等各个部门，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地下工作者，其中许多同志曾担任过领导职务，不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指挥家、作曲家、歌唱家。现在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退居二三线，但都不甘心“颐养天年”，享享天伦之乐。他们共同的强烈愿望，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能够有所作为，对社会主义四化大业作出微薄的新贡献。正是这种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拳拳之心，使这么多老战士汇集在一起，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用歌声进行革命理想和传统教育，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

老战士合唱团，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没有经费来源，靠团员交少量的团费活动。参加排练和近处的演出，许多同志自己掏钱买公共汽车票，还自己花钱做演出服装。然而他们的演出不索取报酬，不接受招待，非在那里用餐不可时，老战士们都是自己掏腰包付钱和粮票。真正做到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义务演出。老战士合唱团的这种奉献精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许多年轻人说，这种高尚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老共产党员的风采，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老战士合唱团的同志们有高度的自觉性。他们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高度自觉地参加活动，真正做到了主动关心，召之即来。他们分散住在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但每到练唱和演出，便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不论严寒酷暑，

不管刮风下雨、冰天雪地，都无法阻挡。为了每次排练和演出，有的骑车赶二三十里地，有的换乘四、五次公共汽车，赶到指定地点。对合唱团的规定，每个同志都能自觉地遵守，身体力行。就是这种高度自觉的精神，将这个业余的艺术团体，锻造成为一个严密的充满生机和战斗力的革命集体。

老战士合唱团还有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首先，成员不断更新。随着年龄、体质等条件的变化，许多老红军、老八路退出了演唱舞台，成为名誉团员。一批新离退休的解放军、志愿军文艺战士走进了合唱团。这使合唱团显得较为年轻了，提高演唱水平有了条件。

其次，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注意节目创新。老战士合唱团演唱的主要是革命历史歌曲。这些歌曲蕴藏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反映着广大人民的心声，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震聋发聩的力量，因而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由老战士来演唱，就更加动人心魄，引发新的共鸣。所以，每场演出，帷幕一拉开，观众看到老战士神采奕奕地站在台上，刚听到“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的歌声，顿时掌声四起。青年人理解这些老战士在用激情、用心声向人们诉说他们的斗志，他们的奉献，他们战斗的青春，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在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同时，合唱团也演唱青年们喜欢的、健康的现代歌曲。还排练出一批难度较大的合唱曲目、男女音独唱、锯琴、唢呐……近两年又排练了由二十多名老战士表演的《老年健身舞》。这些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九一年国际风云急剧变幻，老战士合唱团适时地创作了一首名为《走自己的路》的歌曲：

不论天下的风云怎样变幻，
我们心中的太阳依然灿烂，
不论世上的道路千条万条，
我们走着自己的路意志更坚，
啊亲爱的党，
我们心中的太阳，
照耀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明天。
不论面前的难关多么艰险，
我们改革的步伐勇往直前，
不论别人的眼光是冷是暖，
我们走着自己的路越走越宽。
啊亲爱的党，
我们心中的太阳，
指引我们开拓未来开拓明天。

这首抒情言志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的歌曲一搬上舞台，立即在各界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今天，首都老战士合唱团已经度过了不寻常的十二个春秋。在这不平凡的十二年中，合唱团的建设和演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总政治部领导同志曾几次听取我和合唱团团委的汇报，对合唱团的精神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并指定总政有关部门具体指导合唱团的活动。同时，先后拨了两万多元经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使合唱团的同志们受到了很

大的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合唱团的工作。

一九八八年合唱团春节座谈会上，我写了一首《让我们放声歌唱》的小诗，现抄录几句，以表对老战士合唱团及所追求的事业的祝愿。

学校工厂机关部队
到处都回荡着老战士的歌声。
这优美动听的乐曲
播送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这激动人心的歌声
推动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的事业
前途无量，
我们的歌声
越唱越响亮。
让我们放声歌唱
歌唱党的十三大谱写的主旋律。
让我们纵情歌唱
歌唱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

五十情洒《壮士行》

在我的晚年生活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组织拍摄了一部反映晋察冀抗日战争和华北解放战争历史的大型的电视文献艺术片——《壮士行》。

搞这样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专题片心愿由来已久。因为从一九三七年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起，我一直战斗、工作、生活在晋察冀地区，对这里的山水和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一九八二年退居二线后，又参加了有关这个地区的党史、军史资料征集工作，接触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史料。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受聂荣臻元帅和彭真同志的委托，我和罗光达同志在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六十一周年之际，组织在该地区战斗过的部分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那天，先是召开了《人民战争必胜》摄影集发行座谈会；尔后聂帅、彭真同志和杨得志、萧克、刘澜涛、程子华、宋邵文、王平、杨成武、耿飏等同志亲切会见了与会的四百多名同志。当时聂帅已年近九十岁高龄，坐着轮椅非常高兴地与大家见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见到此情此景，过去的战斗生活情不自禁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产生了一股以艺术形式反映晋察冀斗争历史的冲动。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冲动越来越强烈。

转眼到了一九八九年秋天，经过那场“政治风波”，全党加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一些老同志对我谈起晋察冀革命斗争史，是我们党史、军史的重要部分，生动地宣传一个根据地的斗争史，可以对党员和群众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我想作为一名亲身经历了这段经历的老共产党员，有责任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十月十日，我把冯征（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胡可（原总政文化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傅铎（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和编剧所国心等同志请到家里，商量搞一部反映晋察冀革命斗争史的电视剧问题。后来，又找周巍峙、魏巍同志交换了意见。结果，“一拍即合”。大家都说：很多老同志都有这种愿望，很赞同拍一部电视片，完整地生动地反映共产党人从一九三七年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至一九四九年平津解放这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当时还考虑，创作拍摄这部系列电视片，可采用故事片和文献艺术片两种形式。十月十二日，我向彭真同志和聂荣臻元帅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拍一部反映晋察冀斗争历史的电视剧的建议。

我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准，十月十四日，聂帅批示同意先拍文献艺术片。十月十六日，彭真同志批示：“同意聂帅批示”。这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立即着手展开筹备工作。

十一月一日，我约请周巍峙、冯征、胡可、魏巍、管桦、傅铎、刘佳、罗光达等同志开会，传达彭、聂首长批示，研究如何拍好这部片子。考虑当时的晋察冀根据地涉及华北地区各省市和北京军区部队，这部片子历史跨度长达十二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拍摄工作难度较大，大家一致意见，要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我们几位同志参加，负责张罗这件事，搞些组织协调工作。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二十分，聂帅召见杨成武、宋劲文、魏巍、冯征和我，非常明确地谈了晋察冀的斗争历史。在谈话过程中，我向聂帅报告：河北省占晋察冀根据地85%以上面积，这次拍电视片可否请河北省主办。聂帅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电视片工作小组的同志开会，传达了聂帅的重要意见，初步议论了电视脚本的框架，研究了拍摄单位。此后，又接连开了两天会议，议论脚本框架和每集的主题、主要内容等。最后确定，为了比较充分地反映这个地区的斗争历史，全剧分十六集，其中抗日战争篇十集，解放战争篇六集，采用编年、纪事相结合的形式来展开。同时确定，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所国心同志作撰稿人，根据框架撰写脚本。

接着，在聂帅办公室周均伦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通报情况、筹措经费、组织协调等工作。

首先，向华北地区的有关省市和北京军区报告了彭真同志和聂帅批准拍摄此片的情况，求得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十二月十二日，我到北京军区向当时的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同志、政委刘振华同志汇报时，两位领导同志都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定大力支持：第一，设法保障采访用车；第二，到军区部队采访拍摄尽量提供方便；第三，帮助解决部分经费。后来的军区司令员王成斌同志，政委张工同志同样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在采访用车，经费等方面给予资助。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和冯征同志赴石家庄，向河北省委作汇报，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及胡开民同志等，听取我们汇报。邢崇智书记等领导同志表示：拍这部片子有重要意义，聂帅批准河北省作为主办单位，我们一定要干好。省里决定承担一定经费，并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高恒同志具体负责，山西省委李立功书记，天津市委谭绍文书记、聂壁初市长等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听取摄制组的汇报，积极为拍片提供经费和物质条件。当拍摄经费出现缺口时，我两次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希望给予帮助。每次都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市长在复信中说：“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来教育人民，激励人民，是今天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我们军队的共同职责。拍摄这一历史文献片，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我本人，向您们表示感谢和支持，所需经费已批示市财政局拨付。”经过联络、协商，原晋察冀地区的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和北京军区，共同集资九十万元摄制经费，先后划归摄制单位。这些为拍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内蒙古自治区、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在提供资料方面给予支持。我们还向曾在晋察冀和华北地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同志汇报情况。老同志们都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同意接受摄制组采访，提供宝贵的史料。

在进行撰写剧本通报情况、筹措资金的同时，我们对拍摄单位作了选择，当时有好几家影视制作单位愿意承担这部片子，而且都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和很强的责任感，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我们经过了解和比较，并同河北省的同志多次磋商，最后选择了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因他们曾拍过反映红二、红四方面军斗争史的《血沃中原》和颂扬烈士献身精神的《国魂》等文献艺术片，对拍这类片子较有经验，质量较有把握。为了确保摄制单位的工作质量，我和冯征同志曾向当时的海军政委李耀文等同志汇报过，李耀文同志要求海政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同志“以党性保证拍好此片”。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领导同志和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同志的积极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拍片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了：这部片子的主办单位为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由海政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蒙古自治

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摄制。

在组织筹备、研讨创作剧本和摄制中，我们始终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一九九一年元月上旬，聂帅接见了杨成武同志、邢崇智书记和我，对拍片工作又作了指示，元月十三日，彭真同志接见了我们，作了指示。后来，聂帅又多次接见我和其他同志，谈晋察冀部队发展史、斗争史和华北解放战争史，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教育，使我们对拍片的方向更加明确。王震同志愉快地接受摄制组采访，并殷切希望此片能够真实再现晋察冀军民的光荣斗争历史，为深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提供一部生动教材。薄一波同志在接受采访时，对摄制组同志详情他讲述了华北解放战争的重大史实，并题词“祝拍摄成功”。刘澜涛、杨得志、萧克、王平、杨成武、耿飏、吕正操等许多在晋察冀和华北战斗过的老革命家、老同志积极给予支持和指导。这为这部大型历史文献艺术片的拍摄成功指明了方向，是这部史诗性的电视片得以问世的决定性条件。

如果说从一九八九年底至一九九一年五月是拍片筹备阶段的话，从一九九一年六月起则进入了紧张的实施阶段。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该片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河北省的有关同志和海政电视中心该片剧组人员，在海军第一招待所集中讨论脚本，一集一集地讨论，一段一段地充实，从史料性、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反复推敲，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和感人。撰稿人根据大家讨论意见形成的该片解说词，经工作小组的胡可、管桦、傅铎、刘佳同志分头修改有关章节，最后由魏巍同志统稿。在这次脚本讨论会上，最终产生了该片的片名——《壮士行》，用以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晋察冀军民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精神。九十二岁高龄的聂帅亲笔写了《壮士行》的片名，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

拍摄总纲确定后，剧组在海政电视制作中心主任周振天、政委蔡福兴和副主任安小良带领下，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三月，投入了紧张艰苦的制片工作。全面展开外景拍摄。两个摄制组顶酷昏冒严寒，不怕艰难困苦深入到河北、山西、内蒙及京津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一些部队，涉足七十八个县市，行程三万多公里，拍摄了二百三十多个景点。大量历史遗迹和革命文物，采访了二百多位当年的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军烈属、遗属、遗孤，以及日寇屠杀华北军民的历史见证人，拍摄素材近六百盘磁带。同时，剧组还采访了几十位老革命家、老同志。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摄制组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老同志、群众特别是老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无私援助。

拍摄采访工作结束后，剧组全力以赴地投入后期编辑、合成工作。六月六日，工作小组、河北的同志共同审查了全片，提了修改意见。

七月二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大型历史文献艺术片《壮士行》首映式。杨得志、萧克、李力安、李耀文、吕传赞、李世田、聂力等领导同志出席了首映式，部分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和华北根据地的老同志及北京军区、河北、山西、天津、内蒙的同志等也参加了首映式。聂荣臻元帅发来了贺信。聂帅说：“《壮士行》是部很好的历史文献艺术片，是对晋察冀和华北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刻总结，使大家重温了当年在艰苦斗争中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问了身边的年青人，他们看了也说好，认为这部历史文献艺术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民族就大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这部片子对青年们起了教育和鼓舞作用，这点尤其重要。聂帅在贺信中还说：我看《壮

《壮士行》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我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设计、编导、制作的单位和同志们。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时四十分，《壮士行》在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抗战篇十集，每日一集播了十日。后来又播出解放篇六集。播出后，许多老同志特别是参加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同志，对《壮士行》表示欢迎和赞扬；在广大人民群众、青少年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党史界、宣传教育界、影视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专家们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许多评论认为：《壮士行》是一曲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正气歌，是一部歌颂党的领导、歌颂人民革命的光辉史诗；在挖掘和运用党史军史资料进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方面做得很成功，对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反腐拒变教育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两年多的组织筹备、研讨创作剧本和摄制中，我们工作小组的全体同志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了十多次研讨，论证，对剧本进行了六次大的修改，对样片进行多次审查，力求使片子的政治方向和艺术质量得到保证。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此片的拍摄工作和质量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壮士行》是在聂帅、彭真同志、王震同志、薄一波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没有老一辈革命家、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壮士行》。《壮士行》的拍摄成功，是华北地区各省市和北京军区等单位团结协作的结晶，离开这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壮士行》是难以拍成功的。

《壮士行》是海军政治部电视制作中心和中央电视台等影视部门高质量工作的成果。现在回想起来。对这些领导和同志们，我都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后 记

八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抢救老同志头脑中“活史料”的任务后，经常有一些党史军史资料征集部门找我核对史料，并约我写一些缅怀故去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每当这种时候，昔日火热的斗争生活总是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一怀情悸，在胸中激荡。我渐渐感到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有责任把我所亲身经历的有点价值的东西整理出来，为进行党史军史研究提供一些史料，也为后人提供一些有所启迪的资料。

为此，从一九八四年始，我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我对往事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回忆和思考，翻阅了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一些资料，有时为想起一个人物、一个情节，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遇有记不清楚的问题，就查对有关资料或询问老同志、老战友，直到把史实搞清楚。经过集中系统的回忆，我列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详细提纲。再根据提纲口述，由执笔的同志记录素材，核对史实，整理成文。后来由于潜心组织《壮士行》的拍摄，写回忆录的事搁了两年多时间。这样，回忆录的写作历时经年，直到一九九二年才脱稿。

作为个人回忆录，我从童年写到晚年生活，回忆了个人的成长过程和亲历的战役战斗，部队的重要活动，及新中国一些事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浩瀚大海中，我是沧海一粟；在伟大的革命队伍中，我是普通一员，我的亲身经历是很有限的，但一滴水也可以折射阳光。我想以个人有限的经历为线索，尽可能形象地记述党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反映为了革命事业而浴血奋战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不朽精神，反映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反映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映从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永难忘怀的同志情。这些可能为整理党史军史提供一些史料，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有所启迪，我就很高兴了。

在这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中共江西万载县委党史办公室，原解放军十九兵团所辖的第六十三、六十四集团军军史资料编写组等单位 and 不少老同志、老战友，提供了历史资料，陶伯胜、李伶、赵伴林、高宝仁、杨开华等同志协助我查找资料，核对史实，进行文字和照片整理，筹划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萧克、杨得志、王平、杨成武同志等老革命家为本书题了词，魏巍同志为本书作了序。在成书过程中，第二炮兵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解放军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王长龙同志给予热情帮助。在此，我一并致以热忱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稿中难免有遗漏、差错和不当之处，恳切的希望各方面的读者提出批评，给予指正。

一九九五年春

